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297 期

目 录

【思想文化】

文化软实力与普世价值/黄卧云

形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导论 /余敏玲(台湾)

【百年国史】

画说我这一生 /刘海鸥

3. 串来串去的小姑娘（1951-1955）

4. 谁跟我玩儿，打火嫌（1951-1955）

【述往】

1973—1977：我的“二外”记忆（2）/李红云

红色时代的历史缩影——五六十年代山西翼城上学记/安希孟

【怀人】

纪念著名翻译家范希衡

115 周年诞辰暨逝世 50 周年/ 范 琅

【书摘】

波兰的审查制度和旧政权的崩溃/程映红

国民党政府对出版品的查禁取缔（节选）

1. 中统局关于昆明当局决定查禁进步报刊的情报（1946 年 1 月 30 日）

2. 内政部等为查禁《时代日报》与行政院往来函件

（1947 年 12 月—1948 年 4 月）

3. 内政部为查禁《黑色的诅咒》、《什么是国民大会》等

书刊致行政院新闻局公函（1947 年 11 月 25 日）

【编读往来】

张晓良纠错指正数则 编者补充说明

【本刊声明】

【思想文化】

文化软实力与普世价值

黄卧云

自 10 年前开始在世界各地兴建孔子学院起,孔子和儒学被赋予一种新的重要性,对外,用来获取国家软实力,对内,用来收拾人心。毛泽东时代的“孔老二”重新成为“孔圣人”。由政治推动的这次儒学复兴能否出现,要回答的问题是,儒学是如何丧失意识形态的主宰地位的,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思想和王朝时代的传统中是否藏着理解现实和引导未来的金钥匙?

中国当前进入了思想战国时代,人们在纷纷寻找能够引导中国的思想和价值观。共产主义于上世纪 90 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全面消退,中国不能独善其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了新的正统。民主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升级版也一度引人关注。毛主义在消停了 30 年之后,如今再度热闹起来,老红卫兵和社会底层民众是其主要推动力量。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自由民主思想,人们把这套思想和制度价值体系打包成普世价值。中国绝对本土的思想——儒家思想也粉墨登场。

.....

“软实力”是西方人发明的概念,但很快就获得了普世认同,而且也很快获得了中国的认同,它是指一个国家在文化、制度和价值观等物质力量以外的优势,这种优势是以它们在世界被认同的程度来衡量的。能够成为“实力”的肯定是现实的、当下的力量,而不是某个历史时期的实力。埃及不可能凭借金字塔增强自己的国际地位,尽管它举世无双的魅力吸引着世界游客。德国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世界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为德国赢得了独特的历史声誉,但我们难以想象,今天德国依靠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诸人,而不是依靠它领先世界的制造业在世界上赢得自己的特殊声誉和地位。试想一下,西方今天要用柏拉图来增强其对世界的影响力将意味着什么?

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当局总是以“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而复兴被理解为物质实力的极大增强。从清末兴办兵工厂、发展现代工业,到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到改革开放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爆炸原子弹、卫星上天,到火箭升空,

都是伟大复兴的努力。原子弹爆炸成功把中国推进世界核大国俱乐部，一时让人感觉到大国的扬眉吐气。特别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百年强国梦似乎已经实现，当年大英帝国统治世界就是凭着它是世界工厂。在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界比赛中，中国经过百年追赶，终于认为自己已经赶到前排就座时，却发现世界工厂没有给中国带来所期待的那种国际地位的提升。自己依然没有功成名就。事实摆在面前，大国地位不是一个经济总量 GDP 就能决定的，也不是在联合国享有否决权就能决定的。大国地位是具体的，表现为制定游戏规则的能力和交结盟友的能力，在国际上没有盟友的国家不具有真实的影响力。大国地位是具体的，具体到它的普通国民都可以感受到，每一个走出国门普通公民能感受到的由于国家强盛而带来的尊重，但大量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也没有体会和享受到这种尊重，相反他们倒是发现了自己的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制度文明的巨大差距，当代持续地向西方国家流动的移民潮就是国人用脚对现行制度投票。

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以制度形态划分国家阵营，相同制度和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结成联盟，价值理念取代了英帝国时期老式外交中所秉持的“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的实用主义信条。虽然苏联解体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价值观念在国际交往中依然起着显著的作用，在中国周边先前形成的美、日、韩同盟和目前正在形成的美、日、印联合，都声称是基于共同的民主制度和相同的价值观而结成密切的关系。

“软实力”的概念让国人豁然开朗，它正在成为中国下一个需要复兴的伟大目标。在一个把制度和价值观作为重要内容进行对话的世界，中国当局极其厌恶把自由和民主当作普世价值，同时也决心树立一种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与“西方那一套”展开竞争。“中国模式”的确有一定的独特性，除了个别国家如朝鲜对中国经验发生兴趣外，没有一个大国和先进国家效仿它。宣传“中国模式”的人把中国经济在近 30 年内的快速发展归功于这一制度模式，而不提这种模式所导致的触目惊心的腐败。“中国模式”完全没有与民主制度一争高低的前景。这时孔子的价值被发现了。与“中国模式”相比，“孔子牌”不会招致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争议和排斥。孔子可能是国际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在近两千年的历史时期里统治了中国人的思想，塑造了一个古老的大国，就凭这一点，足以证明孔子的影响力在中国无人能比。

但是，国际影响力不是由国内影响力决定的。某一价值体系要在世界获得软实力，必须具备两个要件：第一，它对世界要有独特的贡献；第二，它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只有当它具有普世价值的时候，才能称得上对世界做出了独特贡献。我们一般认为英国的宪政制度对世界做出了独特贡献，但一般不会认为，朝鲜伟大的主体思想、先军政治对世界做出了独特贡献。

.....

当下真正值得担忧的不是儒家文化的断裂，而是它根深蒂固的存在。中国传统官本位文化和贪腐文化对社会和国家祸害至深，至巨，目前还看不到撼动它的那一天。动辄就能从一个贪官家里搜出数亿元，甚至多达 10 多亿元现金，这在中国历史上不只是罕见，而是绝无仅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大染缸才能制造出如此奇迹，实在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力。国家权力体系的自我管理几近失控。然而，贪腐只是中国今天需要面对的严重问题之一，更加严重的情况也许是腐朽的价值观念普遍地、持续地、深层次地败坏着社会，人们唯利是图，社会信用崩溃。

对当局来说还有更为深远的忧虑。邓小平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目标代替毛时代结束后出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空缺，并在近 30 年的时间里成为一种不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不是价值观的价值观，起到了凝聚社会的巨大作用。但这种唯物主义观带来的问题不断恶化以及经济形势越来越不乐观，也已经不能继续成为社会共识的基础。思想的多元化已是大势所趋，各种政治观点的分歧和对立加深，加剧，民主和宪政思想在国内获得了广阔市场。这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就成为国家治理的第一要务。

一国人民所持基本价值观的某种程度的一致，是和社会政治保持稳定的重要基础。用一种被社会普遍认同、对权力安全有益、可以对抗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价值体系聚集人心，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将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战略。有人把儒学作为一个选择。从管理和控制的角度看，它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它在很长时间里成功地主宰了古代中国人。必须记住，那是古代中国人，是 1911 年以前的中国人。这个事实太重要了。孔子向后看取得了成功，但今天只有向前看才是唯一出路，才有未来。 📷

选自黄卧云《儒教能否复活？》 11/5/2014

【思想文化】

形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 · 导论

余敏玲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¹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隆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广场上的群众顿时欢声雷动。对台上的党政领导和台下的群众而言，这不但宣告了中国共党政权的正式确立，也意味着一个新民主主义新社会的诞生，开始迈向人类历史发展更进步的社会主义新阶段。在中共官方掌握所有的诠释权之下，1949 年以前的一切都是「旧」的，都是坏的、落后的、或反动的；植根于封建主义、封建阶级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旧」观念及「旧」行为模式等等，都应该铲除。反之，1949 年以后的一切都是「新」的，都是好的、先进的或革命的，都应该扶植。其后中共的各种出版品之中，举目可见「旧中国」和「新中国」的种种「高度落差」的对照。

根据这样的思维逻辑，「新社会」、「新中国」治下人民的言行和人生观必须迥异于「旧社会」；「旧社会」过来的人需要改造，「新社会」生长的人需要塑造。中共宣传的「新人」乃是所有人民应该见「贤」思齐的最高标准。²中共意欲改造的对象，如民族资产阶级、有亲美或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等，应该以新人作为学习和效法的标杆人物。出生或成长在红旗之下者，需要以中共宣传的新人标准来塑造。

¹ 毛泽东，〈七律二首 送瘟神（1958 年 7 月 1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册 7，页 298。

² 本书阐释的「新人」乃是体现共产党意识形态者，而非一般意义的新人。为行文方便起见，以下「新人」均省略引号。

改造旧人或塑造新人的方法很多，性质上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是特别发起的各种政治运动，如镇反、肃反、反右；另一是一般性的劝说、宣传、教育等。就成效而言，两者有相辅相成之处，也有各擅胜场之点。政治运动可以收到杀鸡儆猴之效。³但考量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新人理念的传播主要还是靠宣传，特别是对社会大众的宣传。目前相关的研究，多着重于思想改造、镇反、肃反、反右等政治运动，鲜少从塑造一般百姓正确政治思想的宣传着手；而且即使是思想改造，除了各种强硬的手段外，也包括劝说、宣传与教育。本书的研究正希望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不过，本书重点不在于宣传的组织机构与人员或宣传机制与模式，而在于中共透过不同媒介宣传所要传达的官方讯息，希望从现代国家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角色立论，透过政治、外交、社会和文化的多重视角，检视中共宣传新人的内容与本质，并且说明苏联经验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书的焦点正是阿图舍(Louis Althusser, 1918-1990)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阿图舍认为国家权力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运作：一是强制性和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如政府、行政机构、警察、法庭、监狱，这些均具有暴力功能。一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宗教、教育、家庭、司法、政治、工会、传播、文化等方面的作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貌似温和，实际上是对个体进行体制化规训和合法化「生产」的领地，也是一套社会调控的工具。阿图舍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有「形塑」(constituting)具体个人成为「主体」(subject)的功能，将具体的个人呼叫(hail)或建构(interpellate)成具体的「主体」。这种呼叫或建构就是一种征召(recruit)或改造(transform)个人的方式。如此成就的新人，在心理上可能自觉是历史的行动者，但事实上是在特定的论述下建构出来的非自主性的「主体」。⁴中共塑造新人观的宣传，正好符合阿图舍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将个人形塑成为「主体」；这也是规训个人、调控社会的一种工具。新人的出现亦即「主体」形塑的完成。

毛泽东〈送瘟神〉一诗中「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舜尧」，即指共产党意识

³ 诚如 Carol S. Lilly 对南斯拉夫研究指出，共产党会毫不犹豫地用武力来驯训新人，但是他们也知道共产主义的最后目标，只有建立在志愿地合作和大多数人的参与才能成功。因此，说服变成了党的活动的关键成分。Carol S. Lilly, *Power and Persuasion: Ideology and Rhetoric in Communist Yugoslavia, 1944-1953*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1).

⁴ 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pp. 127-186.

形态下的新人。⁵新人的核心价值以马列主义为基础，崇尚劳动（体力劳动为要），强调阶级斗争，具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全心全意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人类的理想，摒除个人主义，强调集体至上。在实践上则是以党国意志为依归，亦即党性的培养。中共借着营塑新人来巩固其政权的合法性，也只有成为新人的百姓才能是新中国的一员，或是文革前夕、文革时期所谓的「革命的接班人」。

从二十一世纪回头看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对当时所发生的种种狂热的政治活动与人民狂热的参与，常常令局外人感到不可思议。为何在大跃进时期，人们会有违常识地找出自家所有金属制品，用最简陋的方式大炼钢铁，积极地投入所谓社会主义建设？为何文革时期会出现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语言暴力和肢体暴力，用来对待自己的师长和亲友？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答案是，因为当时相信毛主席、相信党的领导。这不免令人需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相信党和毛主席到这种近乎迷信、宗教狂热般的地步？大多数的老百姓，特别是居住在城市的人，对于党的话语和政策如此耳熟能详，他们是如何得知这些讯息？这些问题的答案错综复杂，牵涉的面向极广，本书试图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中共建国以来大力宣传新人的理念与典型。

毛时代新人理念的极端体现是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本书借着梳理中共的宣传，追溯红卫兵言行的来源，探讨这些生长于红旗下的青少年，他们十七年来所受的养成教育的内容是什么？他们的人生观是如何形成的？探讨中共的营塑与宣传新人，虽然不可能解释红卫兵的一切言行，但可以提供一个理解他们激进言行的背后成因，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共冀图建设的新社会面貌，以及毛泽东政权的本质。

集体主义是新人价值的一个关键词。毛泽东时代的宣传深远地影响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文化大革命将中共所鼓吹的唯集体是从的观念推展到极致。许多人在经历了这个浩劫之后，对共产主义理想丧失信仰，并开始反思毛时代以来只重

⁵ 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说到要打掉官风时，突然冒出一句：「过去有句话『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你们难道不愿意当圣人吗？不愿意当圣人当个贤人也好。」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1月2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册7，页44，注4。毛不但自己要当豪杰，也期望中国人民成为新的「圣贤豪杰」。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另一种历史书写（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2），页173-174。

集体、忽略个人所引发的种种弊端。中共在告别革命之后，引入市场经济，特别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大陆开始进入「全民皆商」的新阶段。这些年来甚至有人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缩写 PRC 改写成 People's Republic of Capitalism。⁶大陆百姓普遍地过度重视自我、拜物拜金的思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对毛泽东时代宣传新人价值观的反动。⁷我们不免要问这种走向另一极端的人生价值观的源头是什么？鉴往知来，更有必要探究中共建国以来是如何宣传集体为重的思想，如何塑造新人。

再者，中共自建党伊始，即大量复制苏共的种种经验，甚至一度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因此，苏联经验成为研究中共施政不可忽视的参照对象。中共援用苏联的小说、歌曲、电影、劳动模范和女拖拉机手典型，宣传新人要有党国至上、集体为重、劳动光荣、男女平等的观念。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新人的特质与宣传内容也发生变化。倘若缺乏对苏联经验和中苏关系变迁的了解，很难理解毛时代宣传内容为何不断发生变化。所以中共对苏联经验的引以为师到引以为鉴的转变，亦是本书的一个重点。

一、文献回顾与议题旨要

政治学者 Harold D. Lasswell 开宣传研究风气之先。他认为宣传会成为动员群众的主要工具，乃是因为它比暴力、贿赂和其他手段来得便宜。现代工业社会需要更多的宣传，作为社会控制最基本的手段；极权国家比民主国家更是操纵宣传的能手。⁸不过，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指出：宣传也是民主社会的特色。民主政府不能单靠理性和抽象的自由主义诉求民意，有效运用宣传来说服百姓也很重要。他们认为不论是强调集体的极权国家，或是强调个人的西方民主国家，宣传都成为操纵或塑造舆论的重要手段，并没有那么明显的分野；民主社会的信息和媒体也会被有权有钱的利益团体所误用或滥用。民主和极权国家宣传的不同在

⁶ 美国资深新闻主播 Ted Koppel 制作四集关于当代中国的纪录片，片名就叫做 *People's Republic of Capitalism* (2008)。

⁷ 周志强，〈拜物主义催生的「精神分裂」〉，《人民论坛》，2013年第3期，页30-31；许纪霖，〈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1期，页18-21。

⁸ Harold Lasswell, "Propaganda," in Robert Jackall ed., *Propagand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7.

于一个为商业利益，一个为政权；两者的差别是数量，而非质量。⁹

事实上，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宣传远不如极权国家多，商业广告反而比较像极权国家的政治宣传，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是无孔不入。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宣传还是有差别，主要在于性质、社会环境与后果的不同。极权国家的宣传绝大多数以政治性为主，整个社会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由官方宣传单方面的价值观。而民主国家的宣传则是商业和政治性兼有，社会是开放、多元的，因此不同立场者可以各自宣扬自己认可的价值；宣传没有强制性，多半是提供一个选择的机会。其次，在民主或极权国家宣传都可以铺天盖地，如潮水般地涌向人民，但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不理睬商业或选举宣传，不必担心不良后果。在极权国家则不然，忽略或没有实行政治宣传所传播的讯息与价值观，很可能出现政治不正确的言行而必须面临严重后果。毛泽东时代的宣传就具有极权国家的特点。第一，宣传内容紧贴着时局或政策的变化而转变。。第二，中共的宣传内容所隐含的价值观往往二元对立，黑白分明，必须在几乎完全封闭的环境，阻绝外界信息的情况下，才可能如钟摆一般，由一端摆向另一端，依然奏效。本书将在各章阐释这些现象。

关于共产党塑造新人的著作，最早见于西方人士实地参观访问苏联后所撰写的略带游记性质的考察。Fullop-Miller 于 1920 年代中期在苏联看到了处于原始阶段的「集体人」(collective man)，认为他将会取代个人成为未来的主宰。这种集体人诞生于十月革命，是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党人试图展示，救世的真正道路在于透过外在力量组织起来的集体人，而组织这个外在力量者就是党。Fullop-Miller 也看到了党利用教育等来灌输党的意识形态，宣传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Alt 夫妇在 1956 年夏天第一次前往苏联，他们观察到苏联的教育不限于家庭和学校，教育的方式多种，也包括宣传。书中叙述的形塑新苏联人，聚焦于儿童的教养。理想的苏联公民必须行动积极、有目标，做人要诚实、有勇气，遇到困难不退缩，坚持到底，忠于国家，有纪律地执行所交付的任务。全书中只有论及少先队和共青团时才提到党的角色。这可能是因为书的重点是儿童教育，而且时值苏共二十大之后，比起斯大林时期，党的角色相对地势弱。¹⁰

⁹ Kevin Robins, Frank Webster, Michael Pickering, "Propaganda, Inform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in Jeremy Hawthorn ed., *Propaganda, Persuasion and Polemic*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 1987), pp. 6-7, 15-16.

¹⁰ "collective man" 的另一称谓是 "mass man," 作者常将 collective man 和 mass man 交换使用。Rene

倘若排除苏联的官方论述不计，直到1980年代方见苏联异议人士处理这个议题。如Mikhail Heller主张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新苏联人典型。他们的共同点是均为建造新世界的工具，基本特色为都是国家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集体中的一个成员；个人臣属于集体，反抗当局者必须接受再改造。他详述苏联当局使用行刑队式的强迫与暴力来制造新人，利用秘密警察逮捕与流放等手段，大量杀人，作为震慑且深刻的教育方式。他以史家身份撰述本书，却常带有许多情绪性的评论，对新苏联人持负面看法。¹¹苏联解体之后，更为严谨的著作陆续出现。杰出的先锋之作是Stephen Kotkin的*Magnetic Mountain*。他以居住在钢铁城马可尼托格斯克(Magnitogorsk)的工人及其家庭为个案，说明苏联官方利用各种运动与动员，灌输劳动光荣和阶级观念等，马列主义是整个人生观的基础。党员与非党员对破坏工厂生产者要保持警戒心，对政治、党的活动和生产都要积极，要相信党会领导全国迈向胜利，要崇拜斯大林。工人若能努力工作，提高产额，且有良好的工作伦理，便有机会成为劳动模范，得到许多物质利益；对于阶级出身不好的人，必须实行劳动改造，使他们能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有所贡献。这种学习官方话语，培养人们新的社会认同，就是塑造新苏联人的过程。人们对于官方话语、新社会认同，出于恐惧或自利，或两者皆有，至少在表面上尽可能做到符合官方的要求，但也有可能公开说一套，私下是另一套话语。¹²

后起之秀Jochen Hellbeck和Orlando Figes分别借重日记和口述访问，聚焦于苏联人民如何回应官方利用学校教育、各种宣传活动和政治活动，甚至政治迫害，来灌输党所提倡的苏联价值及塑造新苏联人。两人的歧异在于Hellbeck强调价值的内化，Figes更重视价值的外铄。¹³而Lilya Kaganovsky的书则是利

Fullop-Miller, *The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5), 本书1926年先以德文版问世; Herschel and Edith Alt, *The New Soviet Man: His Upbringing and Character Development*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1964).

¹¹ Mikhail Heller, *Cogs in the Soviet Wheel: The Formation of Soviet Man*, trans. David Floyd (London: Collins Harvill, 1988).

¹² Stephen Kotkin,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chapter 5; Lewis H. Siegelbaum, *Stakhano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USSR, 1935-194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一书，虽然也触及新苏联人的问题，但是范围比较狭窄，集中在劳动模范的工作，不像Kotkin涉及他们的生活来得全面。

¹³ 两人歧异产生的主要与其所倚重的资料有密切关系。Jochen Hellbeck, *Revolution on My Mind: 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Orlando Figes, *The Whisperers:*

用电影和文学，从性别差异和身体的角度分析新苏联人。她认为苏联官方宣传的理想男性形象实际上有两种：第一种是众人熟知的，非常阳光健壮、四肢健全、具有雄赳赳气概的苏联新男性；第二种是为了献身社会主义建设、党国和领袖等理想而导致肢体残障的英雄人物。这两种类型同时存在，残废型新人的重要性绝不亚于阳光健康型的新人。¹⁴就宣传而言，苏联当局对后者的着墨更多，以他们为社会主义的牺牲致残来凸显他们的伟大。

至于近代中国的新人讨论，学者研究主题以晚清梁启超的新民说为最多，¹⁵民国时期以 Robert Culp 的研究最为突出。Culp 详细地叙述百姓如何从清朝的臣民转换成民国的国民 / 公民的过程，强调晚清到中共建国以后在公德、公益的延续性。¹⁶关于 1949 年以后的新人研究，最初见于 Charles Price Ridley, Paul H. B. Godwin, & Dennis J. Doolin 利用小学教科书和逃出大陆人士的口述访问，呈现毛泽东时代的模范公民价值观。不过，该书没有讨论中共政策对价值变化所造成的冲击，读者往往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感。其后更重要的著作是 Donald J. Munro (孟旦) 的 *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¹⁷他从人性理论的角度，探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高层领导对人性的看法，以及自 1940 年代至毛过世后中共对人进行改造的措施。全书内容涉及甚广，强调正反典型人物的对照及其所起的作用。作者认为毛泽东深谙人性，故能改造有成。这个论点固然没有错，不过倘若缺乏有效的组织动员和宣传，也不可能达到目的，而这是 Munro 没有处理的部分。最近的主要新作是程映红的专著，以全球的视野来讨论新人，有其独到之处。全书阐释启蒙运动以来所发展出的新人可塑性和完美性论述，并将古巴的新人作为主要的比较对象。作者认为新人强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7).

¹⁴ Lilya Kaganovsky, *How the Soviet Man Was UnMade: Cultural Fantasy and Male Subjectivity under Stalin*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8).

¹⁵ 如 Chang Hao (张灏),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黄克武, 《一个被放弃的选择: 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6 再版)。

¹⁶ Robert Culp 的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Civic Education and Student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 1912-194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¹⁷ Charles Price Ridley, Paul H. B. Godwin, and Dennis J. Doolin, *The Making of A Model Citizen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1); Donald J. Munro (孟旦), *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调道德完美乃是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质。全书叙述苏联和中国部分偏重于新人观念的历史形成，古巴部分则重视新人的实践。书中没有明确地叙述新人特质，并且将时间主要放在1960年代，以新人当毛主席的好士兵、学雷锋为代表。他虽然提及新人特征是无私的集体人格，但没有讨论这样的新人特质是如何养成的。程映红用了不到两页交代1949年之前、1950年代和1960年代新人的差异，指出1960年代新人的三个特点：（1）在意识形态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很快地凌驾于党之上；（2）透过每天的自我批评和反省，达到自觉地、持续地思想改造；（3）在平常的工作也要强调容忍艰辛困苦，作为锻炼革命决心的方式，且随时准备牺牲生命。¹⁸这三个特点在1950年代均有提倡，真正的差别在于实践程度的多寡；1960年代的新人实际上奠基于1950年代的养成教育。此外，程映红书中呈现的中共塑造新人方法，只是概略性述及教育机构、真人典型、思想改造。其中除了真人典型略微触及工农对象之外，其余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特别是思想改造部分。本书的重点则放在宣传新人观点的内容及特色，对象是全民，不局限于知识分子；但是在讨论宣传成效时，则以城市居民为主。

全书将处理三大议题：中共形塑的新人观内容，中共运用不同媒介来作宣传，苏联经验在中国的适用性。本书试图回答下列问题：中共宣传新人的内容和特色是什么？这些内容如何随着政治环境而有所改变？1950和1960年代所宣传的新人特质，其中是否有延续和断裂之处？老百姓又如何看待新人的宣传？民间的解读和官方的宣传有无差距？如果有的话，表现在什么地方？不同的媒介是否会影响宣传讯息的传递，其中异同为何？「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是否可能全盘移植？两国的文化差异是否导致出现橘逾淮而变枳的现象？「苏联模式」在中国如何被修改，以调适彼此不同的国情和政策？

在共产党认知中，新人观也属于共产主义道德的范畴。共产党严厉地反驳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者没有道德的指控，坚称共产主义者有另一套道德准则，主张共产主义的道德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否定世界上有超人类、超阶级的道德。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集体主义，要发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¹⁹由于共产主义道德包含了集体主义，因此，中共将国

¹⁸ Yinghong Cheng (程映红), *Creating the "New Man": 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pp. 96-97.

¹⁹ 列宁, 〈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 《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第2版),

民党提倡的德、智、体、群四育并重，²⁰改为德、智、体三育，将群育并入德育之中。

中共所欲塑造的新人观内容包含很广，本书不可能面面俱到，无论如何选择都会有所遗漏，选择本身就带有主观性。本书处理的是国际观、爱国观、敌我观、爱情观、劳动观、性别观；上至国际、国家的公领域，下至个人感情的私领域，希望如此的选样能涵盖一些重要面向，并且尝试回答下列问题：到底中共希望新人如何看待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外在的国际世界？毛泽东向来讲求对立立面与阶级斗争，共产革命政权成立后，谁是其主要敌人？如何辨识和因应？劳动光荣和男女平等也是共产党的核心价值，党又如何期望新人在这些方面的实践？

新人国际观的基础是民族主义（共产党称为爱国主义），爱国观则是党国至上。即使有关当局极力宣扬国际主义，其基石仍是中共领导与定义的爱国主义。新人敌我观的判定标准，则是以阶级立场为依归。除了短暂的百花齐放时期，毛泽东时代向来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两条路线斗争或隐或显地一直存在。新人认同及遵循官方所提倡的「无产阶级利益」，也是一种集体主义的表现。不但公领域如此，就是私领域中的个人情感也须以集体为重；大我必须先于小我。这也表现在以劳动模范体现的劳动观，一方面要彰显劳动光荣；另一方面也要求以党所界定的集体为劳动奉献的终极目标。新人的性别观在提倡男女平等，新女性也应该出外劳动，同时也必须遵循集体主义的规范。综而观之，本书列举的各种新人观，归根结底都是以党国及其所定义的「集体主义」为新人的言行准则。因此，集体主义的主旋律会不断地在各章出现，但这不是重复，正因为这是中共要宣传新人观的最关键元素；它浸透到各种领域，并且以不同的面貌出现。

第二个议题处理中共利用多种媒介宣传新人观。Peter Kenz 主张宣传无法作抽象的讨论，必须同时考虑政策、宣传方法和内容。²¹对共产主义国家而言，宣传更是无法单独讨论，必须和政策、组织、动员、教育及其他手段一起考虑。

卷 39，页 303；〈共产主义道德〉，《中国共产党新闻——民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617/173273/10415162.html>（2014年3月8日检索）。

²⁰ 194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修订中小学课程标准，指出应该德、智、体、群四育并重。群育指「利导个体的个性与群性、培养群体意识、陶融社会道德、协和人际关系。」教育大辞书编纂委员会编纂，国立编译馆主编，《教育大辞书》（台北：文景书局，2000），册8，页724-725。

²¹ Peter Ken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19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4.

无论是列宁、斯大林或毛泽东咸认宣传是教育的一部分。列宁认为俄国人民十分落后，所以需要教育；中国更加落后，更需扩及各层面的社会教育。中共接收大陆政权的时候，国内人民识字率依然很低，必须依赖各种非文字媒介，才能将中共所欲灌输的政治讯息传达到社会各个阶层。这也是本书为何选择多种媒体，而非单一媒体来阐述新人宣传观念的主因。相较于国民党宣传只重视文字和学校教育，忽视对文盲或半文盲的下层百姓的教育，中共则非常重视非文字的社会教育。毛泽东在延安就曾说过，文艺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²²这里的文艺还包括非文字的部分。中共建国后掌握了全国的资源，宣传媒介五花八门。从民间熟悉的传统方式，例如大鼓、戏曲、杂耍、秧歌、腰鼓队等，到现代的放映幻灯片、电影和广播节目都有。各地经常举办展览、演讲、座谈会、联欢会、读书会、流动图书馆、板报、黑板报、街头宣传站、流动宣传车、化妆演出，也印制针对不同年龄与阶级的宣传文字与图册。

正如新人观的选择一样，媒介的选择也带有主观性。笔者认为从若干观念和多种媒介入手，至少能够以管窥豹，看出中共全力宣扬的官方意识形态，教育老百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政治正确的言行，什么是错误的。这里所选的媒介又可分为三类，分别是文字、视听艺术、真人典型。文字媒介利用教科书和文学，视听艺术选择歌曲与电影，真人典型则是劳动模范与女拖拉机手。这些也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他们的任务是再生产制造「主体」的条件，呼叫个人。过去处理灌输意识形态或教育等塑造理念的研究，用得最多的是教科书。由于社会教育的影响力远大于学校教育，因此本书除了选用教科书之外，其他媒介均以社会教育为考量。教科书的流动性和普及性，比起非文字的文艺产品或真人典型等媒介要偏低；电影、歌曲、真人典型能够不受识字与否的限制。特别是电影和音乐这些大众媒体的传播，能够无远弗届；宣传对象更为广大，而且可以发挥艺以载道的作用。

视听艺术中人声的传播成本最低，也是很省事的媒介。借着广播、歌咏队、合唱与表演活动传唱爱国歌曲，可以凝聚人民的向心力，灌输爱国情操和正确的党国观。而被列为第八艺术的电影，制作成本高；不过，电影素有生活的百科全

²²竹内实监修，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23日）〉，《毛泽东集》（东京：苍苍社，1983第2版），册8，页112。

书之称，向来注重宣传的共产党视电影为灌输意识形态的利器。电影不但具备了寓教于乐的优势，还能够巨细靡遗地描写落实生活的细节。分辨敌我及正确的爱情观牵涉到更多的是生活层面的问题；透过电影这样的媒介，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之中灌输官方期望的新思维。冷战时期无论国民党或共产党当局，都喜欢宣传敌人就潜伏在你身边。中共更会强调敌人的身份可能是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邻居、亲戚等等，因此必须随时提高警觉；而提高警觉的方法则须从日常生活做起。电影反映生活的面向远比其他媒介丰富，既容易明了，又能具体地模仿。中共认为从电影形象化地呈现日常生活，可以对照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言行的区别，进而站稳阶级立场，以集体为重。劳动模范是共产党意识形态下的产物。中共运用劳动模范的真人典型提供了具体实例，宣扬劳动光荣和党的政策，并作为人民效法的楷模。

这些媒介都可以当作文本来处理，但是文本不是无限开放的。文本并非如文化研究者所言，可以完全重新改写；曾有学者研究俄国人对西方蓝调的理解也有类似的结论。²³文本之外，在文化传播中的翻译问题不容忽略。苏联电影和群众歌曲如果没有译成中文，不可能在中国流传如此广泛。在某种程度上，翻译等于是对文本的重新诠释。然而，这是必须另外处理的问题。本书仅能对与中国文化冲突的改译略做说明。

第三个议题讨论中共运用「苏联模式」（或称斯大林模式）与调整苏联经验的问题。塑造新人并非中共特有的发明，但是其方法确实增添了中国传统未曾有的新元素，亦即从苏联学习而来的马列主义和唯党是从的观念及宣传方法。综观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曾有两次以俄为师的经验。第一次在1920年代初期的国民党改组，意在学习苏联的军事和组织，期能统一全国。更重要的是1921年在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除了意识形态和组织方面深受苏俄影

²³ 我同意 Tamar Liebes & Elihu Katz 的研究结论。他们的研究旨在探讨好莱坞电视连续剧《朱门恩怨》在不同种族与文化之下的观众解读。作者访问以色列人（第二代犹太人、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摩洛哥移民、俄国移民、日本人、在洛杉矶出生的美国人，认为观众对这齣连续剧的解读还是有相同之处，观众的译码也都在文本的范围之内。Tamar Liebes and Elihu Katz, *The Export of Meaning: Cross Cultural Readings of Dalla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3. 由于文化经验的制约，俄国人对西方蓝调的理解会有所修改，但不会完全溢出文本。Michael Urban and Andrei Evdokimov, *Russia Gets the Blues: Music,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Unsettled Times*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响，经济方面也完全仰赖其资助。²⁴第二次是1950年代中共向苏联一边倒，全方位地学习苏联，不只在政治和军事，还包括文化、思想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触及层面最为广泛的向外国学习，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浩大的「全盘西化」。²⁵

1950年代中共宣传学习苏联，利用各种媒介渲染描绘出来的进步富庶的苏联社会、安和乐利的人民生活等种种景象，以及社会主义的绚丽远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面包牛奶」，更激发中国人民对将要踏入的新社会愿景产生无限想象，也是当时许多人民响应中共号召投入各种建设不容忽视的力量。1960年代的中苏分裂之后，自许为「真正马列主义接班人」的中共，认为苏联经验「保守、落后」而大肆批判。无论是以苏为师还是以苏为鉴，苏联始终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和文化中扮演关键性的参照角色。著名的大陆学者如沈志华、杨奎松研究的中苏关系，多是上层的外交和政治，鲜少处理社会文化方面的议题。²⁶究竟苏联在中国留下什么遗产，在中国民间社会扮演什么角色，特别是在文化方面，仿佛是个大黑洞，迄今尚未见到较为全面的处理。本书刻意用苏联文艺作为宣传内容的实例，目的在凸显同为共产党统治的中苏两国，其政治文化之异同。其次，本书除了介绍学习苏联的部分，更重视「苏联模式」在中国的调整或修改。「苏联模式」的修正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因地制宜或现实需要的小调整。即使中国在学习苏联的高峰期，中共对于苏联模式亦非完全照搬。例如，苏联专家在中国协助建立工厂，管理方式有顺应中国国情之处；公安、工厂等部门不推行苏联的「一长制」等。²⁷再如本书将讨论的新人典型本土化，部分原因乃是为了顺应现实需要；中共宣传的劳动模范或女拖拉机手典型最初来自苏联，但是后来均宣传中国人的典

²⁴ 石川祯浩着，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²⁵ 1929年，胡适提出「全盘西化」一词，1935年6月23日在天津《大公报》为文解释全盘西化，其意实为「充分世界化」（或潘光旦所说的全力现代化），并指六年前用字不小心，而陈序经、吴景超又不注意胡适的英文讨论，引起误解。季羨林主编，《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4，页584-587。

²⁶ 两位学者著作丰富，其代表性专著：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

²⁷ Deborah A. Kaple, *Dream of a Red Factory: The Legacy of High Stalinism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页98-100。

型，以利于造成一般百姓的认同。另一对苏联模式修正，源自中苏领袖政治理念不同而产生分歧的治国大方向。这种大方向的歧异对国家发展与政策走向所带来的冲击更大；最后不但造成两国的分道扬镳，也促使毛泽东坚持继续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有不断革命论的产生，结果中国的政治路线日益激进。本书希望透过这个面向的探讨，为了解所谓毛泽东要走「中国式的道路」内涵及其背后的意义，提供另一个思考的角度。

在进入各章正题之前，尚须对中共新人理念起源、宣传运作，以及影响宣传新人的中苏关系变化略做陈述。

二、新人理念的起源与发展

《大学》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按照程朱的解释，「亲当作新」，「新」指革旧更新，就是改造旧人为新人。²⁸从十一世纪以来的宋明理学家，都将「私」当作万恶之源，至善的天理等同于公。他们在个人修养上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要人灭私存公。²⁹此后的新民说多指在儒家思想范围之内的修身改造，一直要到梁启超，方将改造旧人提高到公德的层次，他的〈新民说〉乃是基于民族主义，提倡以公为重的理念，也开启具有现代意义的新人说。

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提出新民说，主要是救亡图存的考量。梁启超认为中国政府功能不彰、外交上主权又备受威胁，追根究底是因为国民的文明程度太低。「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梁的「新民」的条件可归纳为：独立自主、守纪律、常识丰富、身体体壮、个性坚忍、富进取冒险精神、相信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有自尊和毅力、合群、能生利而少分利等。其中如进化论观、权利义务、群己关系的界定等都是来自欧美的概念。³⁰他的新民观中备受议论的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张灏认为梁启超的民主信念是从集体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观点出发，最后以国家的利益为依归。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共的雷锋

²⁸（宋）朱熹集注，杨家骆主编，《四书集注（甲种本）》（台北：世界书局，1957），页1。

²⁹ 翟志成，〈宋明理学的公私之辨及其现代意涵〉，收入黄克武、张哲嘉主编，《公与私：近代中国个体与群体之重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页14-15。

³⁰ 〈新民说〉从1902年开始连载于日本横滨出版的《新民丛报》，至1905年完成最后一文。梁启超，〈新民说〉，收入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册2，页655。

精神所强调的群体利益优先、个人应为集体牺牲，是与梁启超的重视集体利益有其连续性。³¹黄克武则认为梁启超的群己观是以保障个人为终极目的；国家与个人存有互相依赖的密切关系，但这与中共提倡的集体主义和雷锋精神有根本的差异。³²综观梁的新民之议，在群己关系上确实有先公后私之别。然而，他希望新民能够先公后私，乃是鉴诸中国人过去的习性是私重于公，也没有因此要求个人只尽义务而完全放弃自己的自由或权利。他的〈自由书〉即提到放弃一己之自由为天下一大罪恶。³³梁在新民说的〈论权利思想〉一节中结语道：「国民不能得权利于政府也，则争之，政府见国民之争权利也则让之。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若是者国庶有瘳。」亦为明证。³⁴由此可见，梁的新民虽然要求新民时时以群、以国为念，却不是要完全放弃个人的权利，更与中共后来提倡雷锋精神的大公无私，没有个人，根本有别。

新民的讨论，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讨论的重心就转变到「新人」。诚如王汎森所言，五四时期的「国民」已经沉淀为底色，当时对新人讨论虽多，却十分散乱庞杂，内容不一，不曾出现像梁启超那样有系统的讨论。大致而言，理想的新人是「单个的、不受各种规范约束的『人』，而不是一切以『国家』为归宿的『民』」。由「新民」到「新人」的转变，也是由偏重群体到强调个体的过程。不过，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在各种带有无政府主义、富有乌托邦色彩的新村实验失败之后，一些知识分子又转向借由组织和纪律建立的「新社会」，使得「新人」的内容又出现倾向集体的一面。³⁶其后随着日军侵华之心日炽的情势，大公高于一己之私的呼声逐渐升高，知识界经常可见以公为重的呼吁。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有感于中国正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口，向学生演讲《新人生观》。其重点在提倡小我应该为集体大我的奋斗而存在。整个人生的目的在求自我的实现，而

³¹ Chang Hao, *Liang Ch' 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pp. 298, 307.

³²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页84-90。

³³ 梁启超，〈自由书〉，收入《梁启超全集》册4，页2264。

³⁴ 梁启超，〈新民说〉，收入《梁启超全集》，册2，页675。

³⁵ 关于五四时期的新人讨论，参见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收入王汎森等著，《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页177-179、199-200。

³⁶ 新村实验也含有集体主义的色彩，但当时胡适反对新村运动，认为这种实验是种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见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新潮》，卷2号3，转引自季羨林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1，页707-717。

自我的实现必须仰赖整个大我才能完成，「必须小我与大我合而为一，才能领会到生存的意义。」³⁷罗家伦提倡以集体大我为重，对象不只是当场听讲的青年学子，而是全国人民。其次，在当时的对日抗战的大环境，他期望人民以大我为重，完全可以理解。必须注意的是，他坚信人是最后目的，不可把人当手段与工具。³⁸大我和小我有冲突的时候，要牺牲小我，但是不会像后来的中共那样，要求做得那么极端。

距离罗家伦在沙坪坝演讲不到一两年的时间，另一个更重要、影响日后中国人民更深的讲演出现在延安。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窑洞外广场，演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坚持党员的利益要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讲稿后来被整理成文，于8月20日至9月20日在《解放》周刊连载四期。刘少奇的新人观强调个人必须绝对服从于党的观念，一方面固然是受到晚清以来知识界倡论的公/集体应该先于私/个人的思潮影响有关；另一方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受到苏联的影响，而苏联的新人说需要回溯到十九世纪的俄国。

俄国与中国不同的是，最初出现新人说主要不是因为民族主义，不是为了要救国保种；而是出于对农奴制度的反思，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所致。³⁹如何解决农奴制度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变成了十九世纪以来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关怀。著名作家屠格涅夫在小说《父与子》中，描述1840年代的父辈和1860年代的子辈两代之间对待现实社会的态度和行为冲突；子代不满于父代的消极心态、光说不练、毫无作为，视行动为打破现状的唯一出路。屠格涅夫称呼这些新青年为虚无主义者。

屠格涅夫的新人典型在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G. Chernyshevskii,

³⁷ 据王云五说，这本书的销路打破商务印书馆四十多年来，除教科书和字典外，任何书籍的纪录。罗家伦，〈台版自序〉，《新人生观》（台北：台湾华国出版社分社，1951），页1。但是台北版将第一章〈建立新人生观〉增补许多，如加入1948-49年的吃光运动和批评共党等语。这里仍以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本为准。罗家伦，《新人生观》（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页4。

³⁸ 罗家伦说：「我们最不能，也不应，把人当工具，当手段。……康德说，『我们要以人为目的，不以为手段。』这固且是教育里颠扑不破的格言，同时也是现在机诈残酷的政治社会中所一刻不能忘记的真理。」罗家伦，《新人生观》，页82。

³⁹ 俄国对农奴制度的反思和新人的起源，必须溯及十八世纪末的一位重要思想人物拉季雪夫(Александр Радищев)。1789年，他写了一篇关于是否有祖国之子的文章：认为奴隶不能成为祖国之子。详Александр Радищев, “Беседа о том, что есть сын отечества” (谈有关祖国之子), А. Н. Радищев: Избранны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 (阿·尼·拉季雪夫：哲学作品选集) (Москва: Гос. Изда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49), pp. 262-270.

1828-1889)的小说《怎么办?》(Что делать? Из рассказов о новых людях)⁴⁰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怎么办?》的副标题就是:「新人的故事」。这本书塑造了1870年代的民粹主义派学生,成为俄国知识阶层的生命蓝图;启发他们创造新生活,在拥有个人自由的情况下,又能致力于服务人民的新生活;并且毫不妥协地反对专制主义。⁴¹小说中的新人典型拉赫梅托夫(Rakhmetov)自律严谨、禁欲、民胞物与,重视劳动和无私的奉献。他信仰科学、进化论、唯物论,对于工农一视同仁,没有阶级的概念。他将劳动理想化,相信劳动是快乐的泉源。他认为一群人一起工作比一个人工作更有效率。他睡在铺有铁钉的床上,以坚定其斗争的意志。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人是可以利用理性来说服自己为集体着想,询问集体的意见可以避免专制;但是不应当违反一个人的意志去为他人做任何事情;自由高于一切,甚至高于生命。这本小说所描述新人的真诚、保有个人自由、纯粹的道德和信任、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憧憬,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具有无比的吸引力。它为一整代的革命分子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典型,教育和锻炼他们违抗当时的法令和威权,保持信念,能够面对放逐和死亡而无所惧。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对列宁产生很大的影响。1902年,列宁出版同名的书《怎么办?——我们运动中迫切的问题》,提出由于工人无法产生工人阶级意识,必须靠知识分子来教育及灌输,因此必须由马克思主义精英分子组成的职业革命家,以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方式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当时革命运动中燃眉之急的问题。由此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原来没有的党组织与党干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一般视为列宁主义之始。列宁同意新人要有所行动,问题是如何行动?列宁坚信没有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成功地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没有党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在《怎么办?》这本书中,列宁有句经典的革命格言:「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将俄国翻转过来!」⁴²革命

⁴⁰ 小说于1863年出版;其中的第五章19-23节和第六章全部,后来在彼得保罗监狱档案中找到,直到1929才出版。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Что делать?—Из рассказов о новых людях* (怎么办?——新人的故事)(Киев: «ДНІПРО», 1969).

⁴¹ Franco Venturi,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19th Century Russia*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 129, 179.

⁴²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全集》,第2版,卷6,页1-183。

家组织就是党。列宁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信奉唯物论的新人，又向前推了一步，新人必须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且重视组织和职业革命家的角色，以求理想的实现。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写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他在文中更明确地提出对党纪和党员的要求。他认为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因为有极严格的、铁般的党纪，并且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靠什么来维持？靠什么来检验和加强？答案是：第一，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及其对革命的忠诚，靠其坚韧不拔、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第二，靠先锋队擅长联系和接近广大劳动群众。第三，靠先锋队正确的政治领导、政治战略和策略，而广大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一个革命政党能够推翻资产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必须依赖上述条件，才能建立起纪律。另一方面，这些条件也不可能短期内就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践才能造成这些条件。⁴³至此，共产党心目中的新人要素，如信奉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忠诚、坚韧不拔和自我牺牲的精神、重视劳动、不脱离群众、服从党纪等，基本俱全。

列宁所要加强纪律的主要对象是青年，毕竟他们是未来的接班人，是需要积极培育的新人。因此，他在苏联共产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对于新人条件说得更为具体。他认为旧社会已经改变，需要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人需要具备现代知识、新的道德和重视劳动；现代知识也包含共产主义；唯有掌握一切现代知识才能胜任建设工作。资产阶级意识所演绎出来的道德是欺骗，是为了地主资本家利益去蒙蔽工农。青年的新任务就是使一切利益都服从于阶级斗争，共产主义者的道德也服从于阶级斗争；必须「团结劳苦大众去反对一切剥削，去反对一切小私产制度的道德，因为小私产把整个社会的劳动所创造的东西放在单个私人的手里」。新的共产主义道德的目的，「是要帮助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消除劳动的剥削」。每个青年团员都是有知识的，又是能够劳动的，且将个人的劳动和能力贡献于社会，并兼有自觉的纪律。⁴⁴

自封为列宁继承人的斯大林，在他的讲话或著作中经常引用列宁关于党纪、新人的看法。⁴⁵再者，斯大林比列宁更强调集体先于个人的重要性。斯大林的〈无

⁴³ 本文是列宁关于统战策略的重要著作，于7月发给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代表们。中译本最早出版于1927年，新译文收入《列宁全集》，第2版，卷39，页4-5。

⁴⁴ 〈列宁论青年的学习问题（1920年10月2日）〉《列宁全集》，第2版，卷39，页293-312。

⁴⁵ 斯大林的重要著作〈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即引用〈共产主义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及布尔什维

政府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分析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差别之一，就在于集体个人孰轻孰重的问题。他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基石是个人；解放群众的前提是先解放个人，所以口号是「一切为个人」。马克思主义刚好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基石是群众，先有群众解放才有个人解放，所以口号是「一切为群众」。⁴⁶

1921年3月初，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为了强化党纪，党内不准有派系存在；并规定：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对违反党纪或出现派系者，最严重者可开除党籍（当时这条没有对外公布）。虽然党内派系并没有因这个条款的出现而完全消失，却为斯大林在日后的党内斗争中提供重要利器。在他极力打击反对者时，一再重申「党是意志的统一，是和派别组织的存在不兼容的」；并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前后，都需要施行铁的纪律。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⁴⁷斯大林认为党内民主和派别集团的自由没有共同之处：党内民主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并加强党的统一，加强党内自觉的无产阶级纪律」。派别集团的自由是「瓦解党的队伍，把党分裂为各个中心，削弱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⁴⁸他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党必须建立铁的无产阶级的纪律」。这种纪律应当建筑在党员的思想一致上，清楚明了运动的目标，并付诸行动。⁴⁹

相较于列宁的新人观，斯大林更强调党性，绝对不允许党内派别存在，而且是以他为代表的党来解释一切。他的新人理想是绝对服从党的纪律和指挥，为党、为革命献身。代表人物可以是小说里的主角，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主角保尔·柯察金；也可以是现实中的劳动生产模范如斯塔汉诺夫，或是飞行英雄、北极探险家等等。这些新人同时也是他定义下的「个人」。诚如 Oleg Kharkhordin 的研究指出，斯大林社会的个人不是平常百姓，而是能够成就非凡事业的英雄，如斯塔汉诺夫式的劳动模范或农民出身而成为生物学家的李森科。平常百姓只有在为了服务社会，发挥天赋、成就非凡的时候，才能被视为个人。有创造力的个

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作为强化党纪的指导原则。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1月25日）〉，收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卷8，页44。

⁴⁶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卷1，页273。

⁴⁷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卷6，页158-160。

⁴⁸ 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1926年4月13日）〉，《斯大林全集》，卷8，页131-132。

⁴⁹ 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及关于布尔塞维克化〉，《真理报》，1925年2月3日，转引自「整顿三风讨论资料特辑（一）」，〈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解放日报》，1942年4月10日，第4版。

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异化的结果，无法发挥他们的天赋。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和集体的发展存在着辩证关系。一方面，突出的个人相对于(versus)没有面貌的群众；另一方面，苏联的个人总是为复数(individuals，不是个性的复数，而是个人的集体总和)，他们是群众督促下而产生的杰出个人(mass promotion of talented people from the masses)。⁵⁰所谓「群众」经常以党的化身出现，这「个人」是被党所组织起来的，因此这样的「个人」也必须以党的意志为意志。

自十九世纪下半叶新人特质先后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视劳动和阶级斗争、列宁和斯大林的强调服从组织纪律，能忍人所不能忍地为革命、为党献身。这些新观念陆续传入中国，主要始于五四时期。十月革命在中国带动了一波译介俄苏思想文学著作的热潮。《新青年》是介绍俄国文学的重要刊物，但多为简介或短篇的翻译作品。当时较为罕见地是田汉发表在《民铎》约五万字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这是首篇较为深入地叙述十一世纪以来的俄国文学及其和社会、思想的关系；其中不但提及屠格涅夫《父与子》和虚无主义的关系，并且重点分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⁵¹

1920年代中期，中共在中央宣传部下设立编译委员会；致力于编译党内党外小册子，尤其是关于列宁主义、国际政策、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工人常识的材料之编译。编译的内容包括理论的译著，以及为普及党员教育而发行的《革命常识》、《党务常识》之类的教本。⁵²1929年，中共中央将编译委员会独立出来，设置翻译科，「翻译各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国际上关于政治经济革命运动苏联状况及各兄弟党的材料。」⁵³这个时期及其后从事翻译工作者，许多是归国的留苏学生。1930年代又掀起另一波翻译热潮，主要介绍关于苏联政治和思想等作品，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⁵⁴1938年5月，延安成立马列学院，其下设立马列著作编

⁵⁰ Oleg Kharkhordin, *The Collective and the Individual in Russia: A Study of Practices*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192, 197-199.

⁵¹ 田汉译为周尔尼塞勿斯奇，以及《要如何做》。田汉，〈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田汉全集》（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卷14，页56-57。

⁵² 〈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1925年2月）〉、〈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1926年7月）〉，收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卷1，页620、733-734。

⁵³ 〈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年6月25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卷1，页896。

⁵⁴ 例如，（苏）拉皮杜斯着，张仲实译，《政治经济学教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苏）米丁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西门宗华，《苏联》、《苏联建国史》和吴清友《苏联地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2），转引自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大

译部，由留学过苏联的张闻天担任该院院长，并兼编译部主任。其后四年之间，中共先后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延安整风规定的许多必读刊物，也多半是这些留苏学生翻译，或参考马列、斯大林的作品综合撰写而成。⁵⁵

曾经留学苏联的刘少奇，对于党与党员关系、党纪、党性的理论并不陌生。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虽然承继中国晚清以来的集体为重观念，更加入了马列主义改造社会的革命因素。刘少奇主张共产党员要进行修养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和社会，为了无产阶级世界的胜利，民族的和人类的解放。正确的共产党员态度是视自己为马克思、列宁的学生，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掌握其精神和实质；并且必须具备崇高的无产阶级的立场。⁵⁶全文一再重申「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考验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度，就是看他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绝对的、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利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党员的最高原则；也就是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当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忠诚的共产党员应该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生命都感觉愉快。党员的个人利益基本上已经包含在党一般利益之中。党允许党员在不违背党的利益之范围内，去建立他个人的以致家庭的生活，去发展他个人的个性和特长。但是两者发生冲突时，就必须「要求党员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而不能牺牲党的利益（不论在任何形式的掩盖和借口之下）来服从个人。」党员的思想意识中「只有党的共产主义利益和目的，没有自己离党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和私人打算」。为了党与革命利益的前提之下，也必须能宽大、容忍与委曲求全，以至在必要时忍受各种屈辱与虐待而无怨恨之心。刘少奇除了正面的描述一个忠坚的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各种美德之外，还详细列举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及其来源，以及如何对待处理这些错误。这些具体的负面典型，可以使人在思想改造过程中，逐一自我检视，俾能达到符合党的要求。至于可能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英雄主义、风头主义、本

事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⁵⁵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第2版），页207-208、297。

⁵⁶ 1949年以后，中共出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各种版本，虽然经过刘少奇的同意而修订出版，但是其内容和最初刊登在《解放》周刊的版本，相异之处甚多。顾及当时的情境，这里采用的是《解放》周刊的版本。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解放》周刊，期81（1939年8月20日），页12-17。

位主义等不同方式出现的不良思想，则是被极力打击的对象。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是要将人类改造成为大公无私的共产社会的公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不断地进行党内外的斗争。⁵⁷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体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和统一的纪律之下，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整体；将个人利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⁵⁸这个决定是延安整风的先声，后来也成为整风必读文件之一。整风期间，《解放日报》以特辑的方式，转载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的精华部分。⁵⁹那么党员是否能允许个性存在？个性和党性的关系应如何看待？中共的答复是：「共产党员党性是党的一切优美个性的统一——集合体。作为共产党员的个性，只能以党性为基础。……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必须要在革命的磨炼中，废弃自己与党性不合的、反动的旧个性，创造与党性相合的、革命的新个性。……党性容许一定的个性（不违反共产主义利益的个性），却绝不是容许党内有个人主义的存在。」⁶⁰

换言之，凡是违反党的利益者，个性就会被解释成「个人主义」。归根究底就是要求党员，也就是新人的一切言行要以党的利益为一切考量的基础。在中共建国后，这个原则成了全国人民应该依循的最高准则。

三、宣传运作与中苏关系

由共产国际扶植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深受苏联影响，宣传也不例外。对共产党而言，宣传不只是单纯的散播观念、政治教育或争取政治同盟，还必须重视组织。列宁曾经以报纸为例，指出报纸不仅是宣传者和鼓动者，同时也是组织者；透过报纸的发行网络，将会自然形成永久性的组织。借由报纸的营销系统可以建立党在地方的代理人网络；这些代理人会保持经常性的联络，知晓现状总

⁵⁷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解放日报》，1942年4月14日，第4版。

⁵⁸〈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收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卷11，页698-700。

⁵⁹〈整顿三风讨论资料特辑（四）：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解放日报》，1942年4月13-14日，第4版。摘取各节是：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利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之举例、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对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态度及党内斗争。

⁶⁰陈伯达，〈人性、党性、个性〉，《解放日报》，1943年3月27日，第4版；后收入陈伯达等着，《人性、党性、个性》（香港：潮汐社，1947），页6-7。

况,可以试验他们在各种革命活动中的组织力量。这种代理人的网络将会形成革命所需要的组织骨架:大到可以涵盖整个国家,又拥有足够的广度。透过这样的方式和工作,不但可以训练出最熟练的宣传者,他同时也会是最能干的组织者、最有天分的党领导,能够在适当时刻为决定性的战斗提出贴切的口号并领导这个战斗。⁶¹

1920年9月,俄共在中央委员会之下正式成立了宣传鼓动部,由党务机关、教育人民委员部、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等方面的代表和党的宣传鼓动专家组成,同时各层级党委都设立了相应的宣传鼓动部门,负责各区的工作。该部负责各种宣传鼓动和文化教育工作(包括出版和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工作),并直接领导农村工作部、妇女部和少数民族局的工作。⁶²由此可知,苏联的宣传工作从一开始就面向全民,甚至包括少数民族。

俄共的宣传与组织相结合的观念,以及宣传面对全民的做法,迥异于近代中国的立宪和革命团体。⁶³国民党在历经二次革命的挫败之后,亟思重振革命雄风,因此欲仿效苏联模式进行改组。当时和孙逸仙接触频繁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Maring,原名Hendricus Sneevliet,1883-1942)和后来的苏联顾问鲍罗廷(Mikhail M. Borodin,1884-1951),咸认国民党没有体认到群众工作的重要性,轻忽政治和宣传工作。⁶⁴改组后的国民党新添了组织部,且强化了宣传部,但是掌管和活跃于这两个部门的多半是跨党的共产党员,资深且有分量的国民党员对这些部门的工作兴趣缺缺。反观中共本身从建党开始就设有专职的宣传机构,各地的党支部也设有组织和宣传部门。同时,中共也重视宣传和组织人员的培训。⁶⁵对党内部分不识字的宣传人员,会依个别训练或组织平民学校性质的小组帮助

⁶¹ 列宁,〈从何着手?(1901年5月)〉《列宁全集》,第2版,卷5,页6-10。

⁶² 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16-17。宣传鼓动部于1924年改隶书记处。

⁶³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页188-189、197-199;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页207-212。

⁶⁴ Док. 102 “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М. М. Бородин с Цюй Цюбо (16 декабря 1923 г.)” (文件 102: 鲍罗廷与瞿秋白的谈话纪录),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1920-1925 гг.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卷1,1920-1925年)(Москва: АО «Буклет», 1994), с. 346。

⁶⁵ 1925年中共中央局与鲍罗廷议决:在开封办一民党宣传学校,训练人才;由李大钊、韩麟符、于树德(永滋)三人主持。〈中共中央局决议——关于国民党二次大会、广东政治问题,建立本党北京、广州临时委

他们，以便提高宣传分子的素质，并且经常对其考核。⁶⁶延安整风时期党确立了意识形态与领导的一元化，能将其贯穿到宣传组织与人员之中；整风的必读文件之中也包括宣传方面。⁶⁷

除了重视组织与人员培训之外，中共的宣传方法十分机动与灵活。宣传工作不仅限于宣传人员。如一般士兵也可透过军纪严明的方式当作宣传。中共要求官兵为百姓上门板、捆烟草、扫地、谈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要求即使只做到一半，也会给群众留下深刻印象。又如优待俘虏，医治敌方伤兵。⁶⁸因此，一支军队亦可成为具有流动性的宣传队伍。

其次，中共宣传会区分对象，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宣传媒介和内容。相异于国民党的宣传多局限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共更重视对下层阶级的宣传，甚至还有针对流氓的宣传。⁶⁹例如，对农民宣传能投其所好。将时事预编成较长的小说、歌曲、弹词、剧本；搜集有趣味的琐事，引起听众兴趣；利用新剧表演，讽刺旧习俗与迷信；运用一些简单的标语、画图和讲演，使农民像进过政治学校一样。⁷⁰洪长泰的研究清楚地阐释延安时期的中共利用说书、漫画、歌曲、节日等作为媒介，来宣达党的意识形态。⁷¹

同时，中共长于利用各种事件进行宣传，且要求事先有周密计划，能够未雨绸缪。最明显的例子是，当中共从医生处得知孙逸仙已无药可救，只是拖延时日之际，即开始筹谋如何利用孙的过世来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和三民主义，并且明确三民主义的内容，较有争议的部分如民生主义则不可多做解释，严禁将三民主义

员会及训练人才等问题（1925年5月7-8日决议）》，《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卷1，页640-642。

⁶⁶ 〈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1928年7月10日）〉、〈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1925年2月）〉、〈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十二号——纪念日与大的宣传运动过后应报告宣传工作情况及效果（1925年4月）〉，收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卷1，页825、618-621、635。

⁶⁷ 〈宣传指南〉的内容有四个重点：1. 撷取联共党史片段，谈列宁是怎样进行宣传；2. 季米特洛夫论宣传的群众化；3. 鲁迅论创作要怎样才会好；4. 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香港：文风出版社，1946），页167-173。

⁶⁸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节选）（1929年12月闽西古田会议）〉，收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卷1，页949、952-953。

⁶⁹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节选）（1929年12月闽西古田会议）〉，收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卷1，页947。

⁷⁰ 恽代英，〈农民中的宣传组织工作（1925年12月29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卷1，页675-678；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收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卷1，页787。

⁷¹ 洪长泰，《新文化史与中国政治》（台北：一方出版社，2003）。

和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相比较。⁷²中共心知肚明，三民主义和社会 / 共产主义内容相异之处远大于相同之处；一旦两相比较，容易引出更多的质疑。相较于国民党，中共能够明确指出什么可以宣传，什么不宜多宣传，可以让宣传人员有所依循，多少知道底线在那里，这是中共宣传高明之处。类似的例子在日后的中共宣传中屡屡出现。

口号在宣传之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中共十分重视口号内容要具体化；一再告诫口号必须简洁有力，内容不能太抽象，必须反复向人民解释，避免发生误解。刘少奇甚至特别指示如何注意口号的提出和改变。1923-24年间，列强对华进攻日急，「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共鸣；而口号从提出到流行，有个十分重要的过程。⁷³中共在动员群众土改时，对此有清楚的说明：

「口号是指导群众行动的武器，根据工作的要求，提出通俗鲜明的口号，可以直接鼓舞群众情绪，口号愈明确愈通俗，就愈适合群众的口味，群众接受就愈快。用群众自己的语汇，解决群众自己的思想问题，作用非常之大，启发其斗争勇气，提高其思想觉悟，指导群众行动，使群众运动成为自觉自愿。因之口号在群运中是有重要的地位的。」⁷⁴从现实的当务之急构思出有力易懂的口号、明确的宣传内容，到宣传细节的注意，均在显示中共对宣传之用心与重视。中共的许多响亮口号，即使实践上有落差，也能达到宣传效果。

中共的宣传理念与运作方式，从建党开始到延安时期，逐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共内战在三大战役之后，陆续掌握了全国的资源，宣传工作有更进一步的发挥。194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由河北西柏坡迁入北平时，部内干部仅二十余人，由部长直接领导。10月建政之后，为加强对文教宣传的管理，中宣部

⁷² 《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号——关于孙中山逝世后之宣传问题（1925年2月5日）》，收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卷1，页624-626。页625提到「宣传中山的三民主义，应以1924年1月民党大会的宣言、党纲、政纲为根据。民族主义即根本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一切对外条约，要求中华民族独立为原则。民权主义以根本打倒障碍民权之军阀，建设民主政府，要求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之绝对自由为原则。民生主义以铲除目前妨碍民生之帝国主义与军阀，再以真正人民的国家力量发展农业厚利民生为原则。总之，宣传中山的主义切不可蹈于空空理论，须举出具体的事实，尤其须切戒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作比较。对于民主主义亦不可多作解释。」

⁷³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页67-69；刘少奇，《论口号的转变（1928年10月5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卷1，页844-846；《中央局报告（1924年5月14日）》，收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卷1，页581。

⁷⁴ 冀南四地委宣传部，《土地改革中的口号汇集》（1947），河北省档案馆藏，档号36-1-26-2。转引自李里峰，《群众运动与乡村治理——1945-1976年中国基层政治的一个解释框架》，《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页223。

不论人员编制和组织机构均快速扩充，人员的数量增加近10倍。⁷⁵同时，将原来在根据地由宣传部掌管所有的文化、教育、出版和新闻等工作转换到政府部门。表面上是为了顾及政治形象，实际上是使党中央和各级宣传部「摆脱行政事务，集中注意于党内外的思想斗争，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和党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⁷⁶就在中央政府成立一个月多，党中央即决定在政府部门设立党组，「以便统一并贯彻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执行」。⁷⁷同时，中共为了营造出由下而上、全民拥护的现象，因此除了有上层建筑的党政机构，还必须要有下层组织的「群众团体」与之呼应。⁷⁸各个重要的外围组织均设有党组，负责宣传的领导单位仍是党中央宣传部。

中共建国后的宣传及其他重大决策，深受中苏关系变化的影响。两国关系的急剧变化直接冲击到中共宣传新人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在此简单交代1949年到文革前中苏关系由蜜月到反目的过程。

向苏联一边倒是中共在内战后期方才确立的政策。1948年发生柏林危机，美苏对立日益尖锐，中共认为若要打倒蒋介石，除了暗中应尽力争取苏联的援助之外，亦须继续讨好美国，但是必须选择一个公开的外交立场。⁷⁹1949年3月，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已经确定向苏联一边倒方针的基本轮廓。当时毛泽东指出，无须急于争取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共政权的承认，拖到全国胜利以后再解决也不迟。⁸⁰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明示：「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

⁷⁵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卷5，页62-63、104-105。

⁷⁶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党的文化教育工作问题的指示（1949年12月5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册1，页66。

⁷⁷ 〈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1949年11月）〉，收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卷9，页9。

⁷⁸ 工会和青年团虽然也被中共归类为「群众团体」，但是与党的关系特别密切。中共如何利用其他群众达到其政治目的，是个值得研究却未收到应有重视的领域。苏区时期中共直接主导成立或控制的「群众团体」，除了具有政治性的贫农团、反帝拥苏总同盟、中央苏区革命互济总会之外，还成立了不少文艺「群众团体」。苏区的群众组织详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页618-660；文艺团体参见刘云主编，《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

⁷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卷5，页131-133。关于战后中美关系的变化，参见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⁸⁰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

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现在对非党人士也要说明这一点，也要做这种宣传。」⁸¹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正式对外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此后又陆续发表文章加以阐发。⁸²所谓一边倒政策并非单纯的外交方针，另外还有意识形态与经济建设等考量。中共在掌权之前，只有治理中国部分农村经验，建国之后如何经营城市，管理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如何重建中国因战争而衰败不堪的经济，都是中共领导人所面临的严重考验。

事实上，早在中共正式对外宣布一边倒政策之前，就开始寻求苏联的援助。例如，请求苏联专家到东北协助修复铁路运输与经济建设，并要求苏联给予中国新政权低息贷款等。⁸³当时的中国大陆，除了与苏联及其东欧附庸国交好之外，在国际外交上实处于孤立地位。不管是基于意识形态或是现实环境的考虑，全面地以俄为师成了唯一出路。苏联不但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而且在1950年2月与中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大陆，不同于东欧诸国在二战后外力强加而来的共党统治。因此其同盟关系更显重要，两国成为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分占欧亚大陆的重要伙伴。

在中共夺取政权前后，除了少数亲苏人士之外，许多知识分子因为种种历史情结或教育背景的关系而有反苏情绪。至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对苏联毫无认识与了解。如何改变这种情势，成为中共执政之后的重要工作。中共必须在全国推动「宣传苏联、学习苏联」，宣扬「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致力于铲除知识分子亲美反苏的观念、灌输无知百姓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其实，宣传苏联也等于是宣传中共所要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中共的自我宣传。

建国初期，中共为了配合党的政策，宣传向苏联一边倒的公家机构、机关学校必须执行上令下达外，还有关键的外围组织如共青团、工会、妇女联合会、中

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卷4，页1435-36。

⁸¹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949年3月13日）〉，收入《毛泽东文集》，卷5，页262。

⁸²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收入《毛泽东集》，册10，页296-307、317-324、325-332。

⁸³ 关于苏联专家在东北的情况，详见沈志华，《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2000）；关于苏联对中国贷款，见沈志华，〈关于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页83-93。

苏友好协会的配合宣传。借由这些宣传机制及组织动员，中共成功地扭转全国由先前的反苏变成亲苏的舆论。⁸⁴最好的例子就是人民对斯大林逝世的反应。1953年3月初，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国。虽然有少数人对斯大林的死幸灾乐祸，在饭馆大吃大喝，表示庆祝，⁸⁵大多数中国民众则深感哀痛，仿佛天塌下来一般。有人因此哭晕过去，或悲伤到影响工作，或无法进食、入眠。甚至如南京大学副校长孙叔平也当众大哭失声，悲痛不已。⁸⁶更有人担心斯大林的死会影响苏联对中国的友好关系与建设，或降低对中国的援助，进而使得中国无法顺利到达社会主义社会。⁸⁷

斯大林过世后，赫鲁晓夫积极调整对华政策，扩大对华援建项目，提高贷款额度，增派专家来华，提前归还旅顺基地，转让四个中苏合营公司的苏联股份等。中苏蜜月关系逐渐走向顶峰，但中苏关系的破裂也在赫鲁晓夫任内。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当晚，对斯大林的错误与个人迷信问题展开批判。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此举是「揭了盖子，捅了娄子」。「揭了盖子」指苏联、苏共、斯大林并非一切都正确，破除了对苏联的迷信。「捅了娄子」指赫氏的「秘密报告」内容没有事先通知兄弟党；而且不该全面否定斯大林，应该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些都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最初较强调「揭了盖子」部分，即揭露了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一面；在某种程度，也是宣泄了他过去与斯大林交涉所受的怨气，同时破除了中共长期以来对苏联的迷信与教条主义。因此毛泽东在4月25日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开始陆续讲述〈论十大关系〉，正式提出要以苏为鉴。⁸⁸

1956夏天和秋天，先后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反苏事件，毛认为批判斯大林是将社会主义矛盾暴露于外，是造成波匈「动乱」的主因，中国必须有所警惕，不

⁸⁴ 详见余敏玲，〈学习苏联：中共宣传与民间回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40（2003年6月），页105-107。

⁸⁵ 〈天津部分资本家对斯大林的死幸灾乐祸〉，《内部参考》，号54（1953年3月10日），页262-263。

⁸⁶ 王觉非，《逝者如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页283-284。

⁸⁷ 〈我国各地人民对斯大林同志逝世的反应〉，《内部参考》，号53（1953年3月9日），页202-207；〈北京青年对斯大林同志逝世的反应〉，《内部参考》，号54（1953年3月10日），页259；〈天津部分干部对斯大林逝世在群众中引起的混乱情况表现束手无策〉、〈天津工程技术人员对斯大林逝世的反应〉，《内部参考》，号56（1953年3月12日），页296-297、300；〈斯大林同志逝世后天津部分工人学生过度哀痛〉，《内部参考》，号57（1953年3月13日），页343-344。

⁸⁸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册6，页82、101-105。

能重蹈覆辙。毛泽东也难免会联想到，自己身后是否也有类似斯大林的遭遇？此后毛泽东更重视「捅了娄子」部分，因此对苏共二十大的批评也日趋负面。⁸⁹尽管如此，中苏友好关系并没有立即受到影响。苏联在1956-1957年间，进一步援助中国发展原子能的研究和技术，包括原子弹和飞弹的技术。

1958年，中共推动的大跃进，使得全中国开始走向极左狂热的「国家建设」；相较之下，苏联经验便显得落后保守。赫鲁晓夫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制度疑虑重重，迟迟没有答应中国所提出的新援助要求。⁹⁰同时，中国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在华共同建设长波发射电台及核潜艇共同舰队，偏偏中共砲击金门又没有事先通知苏联，双方关系益趋紧张。⁹¹

1959年，苏共的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出现了批评中共人民公社、大跃进等路线政策的言论，加上苏联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并未偏袒中共，甚至指斥中共不值得为边界的不毛之地妄动干戈，更激怒了中共。

1960年，中苏双方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生激烈争吵。⁹²同年7月赫鲁晓夫突然决定召回所有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中苏关系的恶化全然公开浮上台面。1962年，中苏上层关系虽稍趋缓和，但到1963年7月莫斯科会议时中苏两党关系又告破裂。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叙述中苏矛盾的分歧由来。从9月开始至1964年7月，中共也陆续发表9封公开信，批评苏共，展开中苏大论战，出现了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从而开启了两国两党持续三十年的冷战。由于中苏关系从高峰跌到谷底，使得中共的政策也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而更动。❏

⁸⁹ 详见吴冷西，《忆毛主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页4-5；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收入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页357-358；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册6，页82、101-105。

⁹⁰ Roy Medvedev, *Khrushchev, the Years in Pow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87.

⁹¹ 中苏从蜜月到反目的详情，见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第5-6、8-10章。

⁹²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页333。

【百年国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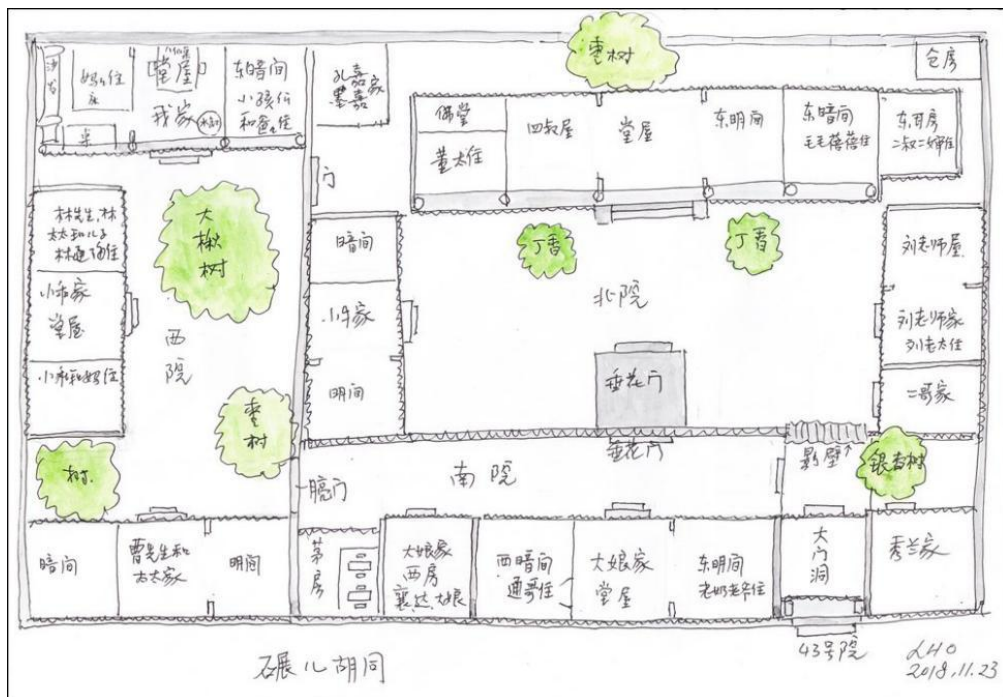
画说我这一生

刘海鸥

三、串来串去的小姑娘（1951-1955）

五十年代初我家搬进了景山后街碾儿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爸爸妈妈上班，无暇管我，任我恣意放纵。我最喜欢的事情是走门串户，走街串巷，说得诗意些像个自由飞翔的小鸟，说得通俗些就是一个胡同串子“野孩子”。邻人们大概会觉得我是一个讨嫌的孩子，其实我还不能表达出来的是在我的眼睛里那院那胡同如同一个合目养神，不再开口说话的老人，沧桑而且神秘，我渴望探究其中的秘密，这种渴望延伸了很久，我上小学后，放了学爱在不同的胡同里游逛，遇到大宅门，便贸然而入，前后穿行，浮想联翩。

我的儿童时代最早最愉快的记忆全部藏在这个院子里，这个胡同里，这条街上。1952年我家搬进了碾儿胡同43号，这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大门在院落的东南角，坐北朝南，门前两步石阶，左右两个石兽护门。红漆大门上刻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门联。迈过高门槛，大门洞的右手有一间小房，过去应该是听差住的房间，用现在的话说是传达室，那里住着秀兰一家。



左手是一溜四间南房，住着王大娘一家。房前一道墙将四合院隔出一个南院和北院。

通往北院的二道门里还有一道垂花门——一座正方门廊。院内北房五间，住着房东董太太和她的儿孙们。

东西厢房各三间，东屋刘老太和她的儿子住了两间，还有单独一小间住着我的堂哥玉海（我称其二哥）。西屋是小牛一家。

北屋的后面还有一个狭长的后院，有一棵枣树，也许还有一些花草，也许是光秃秃的。靠西的角落有一个小屋子还住着墨嘉一家人。东边的角落是一个小仓房。后来读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以及《风筝》，我脑子里出现的就是这个后院和那个小仓房。

院子的西边还有一个西院，东边以小牛家的后墙为界。南北西各有三间屋子。南屋住的是曹老先生和太太，西屋住着林先生一家人，北屋就是我们家了。



我家西边的走廊下有一个下水沟，每天早上我们家人站在石阶上一边对着下水沟刷牙，一边听着收音机。西院里就我们一家有台无线电收音机，北京人叫“话匣子”。买话匣子不简单，是爸爸到派出所开了证明才能

买到（怕美蒋特务用收音机接受台湾信号或改装成发报机）。

每天一大早话匣子打开，传出来的声音全院共享。先是听新闻，不是朝鲜战场上的战事，就是三反五反的报道。

新闻之后是天气预报记录，报告员用催眠的记录速度慢慢地重复着“二百米上空有一个低压槽……”预报的时间特别长，极端的乏味。想象得出此时全国各地的大小气象员大概都在忙碌地记录，以作为本地气象预报的参考。

然后是歌曲，最常播的是《王大妈要和平》：“王大妈要和平，要呀么要和平，她每天动员妇女们来呀么来签名……”1949年和1950年连着召开了两届世

界保卫和平大会，全世界的和平呼声响彻云霄。这支歌曲的创作大概与1950年在波兰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有关。

1950年开始了全国性的土地改革，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分给了农民。于是就有了歌颂土改的歌：“三头黄牛一呀么一匹马，不由得我赶车的人儿笑呀么笑哈哈……大轱辘车呀咕噜咕噜转呀，转呀，转呀，转呀，嘿，转到了咱们的家。”唱的是农民在土改中分到了牲口和大车的高兴心情。多少年后，再想起这支歌，心里着实为那个“赶车人”惋惜——1953年一俟土改基本完成，就开始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国家收回了农民刚分到手的土地牲口和其他生产资料，那些大牲口怕是还没暖了圈就又归了公。

每早必播的另一首歌是花腔女高音周小燕的《燕子》，这是一首歌颂新生活的歌曲，在我听来其内容总是含混不清的，一开头就是长长的一声“眼珠啊——（实际上是“燕子啊”）”，我觉得恐怖，眼珠怎么了，为什么要如此高歌，百思不得其解，加上跳跃的花腔，能不恐惧吗？问了几次爸爸，为什么她要唱眼珠，始终不得要领。

最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一个小盒子能吹吹打打这么热闹，邻居王大娘说，因为匣子里有小人。这太吸引人了，幼年时我总是认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小人国，话匣子证实了小人国的存在。我常想象如果抓到了这些小人，我会怎样摆布他们，当然想象力超不过玩过家家的内容。一天我费尽气力挪开话匣子，扯开挡布，探头到后面，真是令人失望，只看见落满灰尘的一堆电器零件和电线。

我家住在西院的北屋。三间屋子，两明一暗。

进门是堂屋，一个水缸摆在右侧，缸沿上挂着一个铜水舀子。五十年代初期的北京还没有自来水管道系统，北京市民吃的用的是井水，家家进门摆着一个大水缸。每隔一两天有个驼背的老头推着一辆木头水车送水。水车停在门口，取掉水箱上的木塞让水流进水桶里，然后驼背老头挑着水桶给各家的水缸灌满。我觉得，老头背上的大鼓包，一定是挑水压出来的。



井水冰凉，夏天买了西瓜直接放到水缸里“拔”（冰镇的意思）。那时候的西瓜是墨绿色的皮，绷紧，黄瓤。切西瓜的刀是一把尺半长的日本尖刀，从大连日本人回国前摆的地摊上买的，上面刻着日本字，大约是哪个日本家族的荣耀标记。文革中妈妈悄悄把刀扔进了护城河。

景山东街有一个胡同叫三眼井，我以为老头是从那里挑的水，专门跑去看井，没有找到。据说以前胡同里确有三个井眼的古井，后来因为阻碍交通，给毁掉了，一点痕迹都没了。



这张照片是三十年代照的。照片上的人是我爸爸，当时正在北京上大学，住在后泥洼一个四合院里。他所依的缸就是我家后来盛水的缸。抗战期间爸爸的大学西迁，缸就留在了后泥洼。爸爸1949年回到北平后，缸又物归原主。这缸跟着我家到八十年代末，搬到楼房后，就不知其下落了。

东边的房间是睡房，除了床，就是书，家里书多，唯一的一个小书柜已经摆满了，更多的书放在白茬毛刺的木包装箱里，靠墙摞着，顶到了天花板。我们就在木箱的包围中睡觉。书都是爸爸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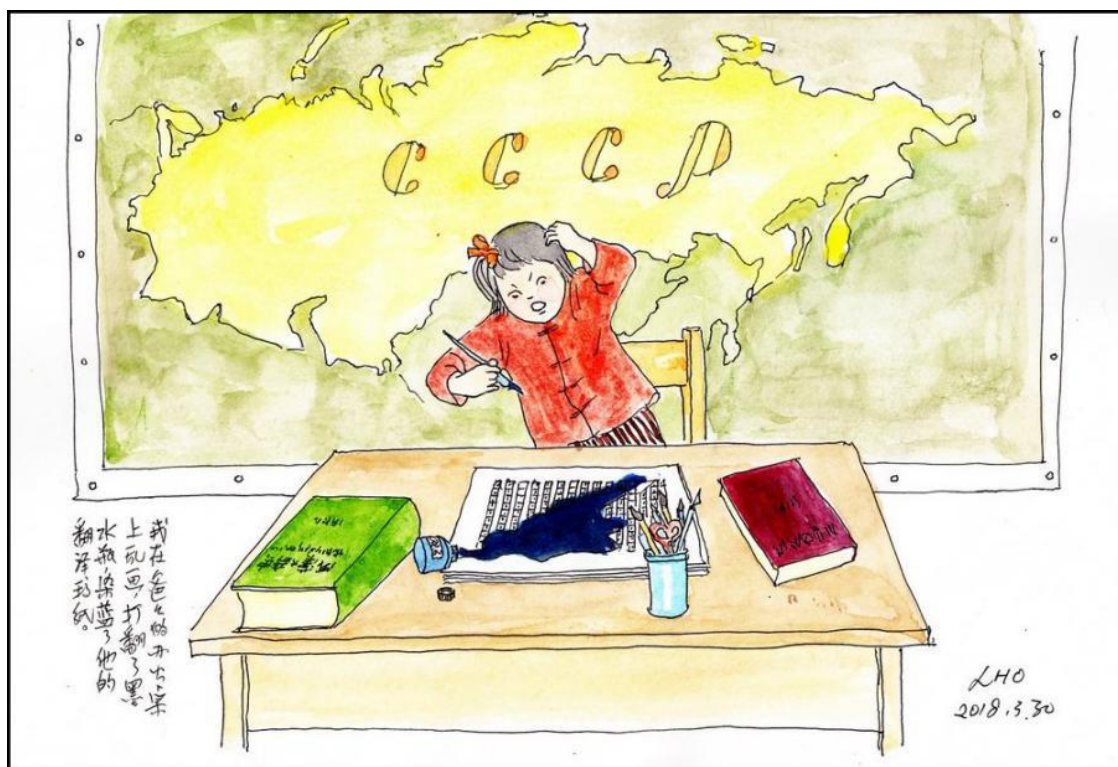
收集起来的，四十年代初他在新疆工作时买了一大批。他说，有一个时期新疆的主席盛世才还是很开明的，亲苏亲共，在新疆可以买到任何红色苏维埃的书籍。后来他到了桂林，日本人打来，大部分书在桂林大火中被焚毁，还有一小部分逃难时带在身边，在途中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扔掉。这些书多是苏俄时期第一版的珍本，有老托尔斯泰的，普希金的，高尔基的，还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俄文第一版。

爸爸对书的珍爱，到了为书与人翻脸的程度。有一本三十年代俄文版的《普希金选集》，他珍藏了几十年，视如自己的老朋友，后来被他的一个高中同学借走，长期不还，多次索要未果。1999年，一向宽容大度的爸爸终于不能再忍耐，写了一封“最后通牒”痛斥这位同学，要回了那本书，也结束了两位老人七十多年的友谊。妈妈特重视我们的文化教育，她在全国妇联保卫儿童委员会工作，可以收到全国各地新出版的儿童书籍，每隔一两天她就借回一批书给我们看。还给我们订了《小朋友》、《儿童时代》好几种杂志。

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最多的家具是书柜。在这个环境中长大，我誓言将来我挣钱了，全拿来买书。我后来的确买了很多很多的书，但是现在我一本书也不买了。

西间是爸妈办公的地方，西墙上挂着苏联的地图，几大张拼接起来的，从上到下，从左至右，占了整整一面墙。南窗下是一张书桌，正中永远摆放着一叠写满译文的稿纸，旁边是俄文原著和几本俄文大词典，一支蘸水钢笔插在墨水瓶里。爸爸是个俄文翻译兼编辑，白天做编辑工作，晚上搞翻译，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

我不明白翻译是做什么的，喜欢趴在爸爸的桌子上学着他的样子，拿着笔在稿纸上写写画画。有一天我照猫画虎，把字典上的外国字母写了长长一大串，兴奋得不得了，发现翻译原来竟如此简单。等爸爸一下班，我就迫不及待地拿给他看，让他念念我写的是什么意思。爸爸说不是词，念不出来。我非常失望，不懂为什么有了字母，他还不认识是什么字。



一次趁他上班，我爬上桌子拿起蘸水钢笔，还没等下笔，却一下子扳倒了墨水瓶，一整张写满字的稿纸顿时被染得墨蓝，还洇透了好几张。我知道闯了大祸，立即逃出房屋，到大娘家避难。爸爸回来后并没有对我发脾气，只叹息道白白地浪费了他一晚上的工作。这些被墨水洇蓝的稿纸，是爸爸正在翻译的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也是我对这本书做的“贡献”。《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是一本影响了整个中国青年一代的苏联文学作品，爸爸的名字也随着这部书响亮起来。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爸爸的两套画册——特列嘉阔夫画廊和俄罗斯博物馆的藏画集，五十年代初在国际书店订购的。画册尽收俄罗斯及苏联画家们的杰作，印刷质量也是一流，象牙色的硬纸衬托着精致的画片。爸爸对画册十分珍爱，不许我们碰。我好奇想看，一次趁大人不在家偷偷打开画册。翻过几张怡人的风景画，一幅恐怖的画面赫然跳入我的眼帘——一个老头两眼惊恐绝望，抱着一个满头是血的人跪在地上。我吓得尖叫一声，窜出房间，跑到大娘家躲起来，直到爸爸妈妈下班才敢回家，以后很多年我不敢再看这套画册。当我的年龄足以克服这种幼稚的恐惧后，我才知道那幅画是列宾的名作《伊凡雷帝弑子》（也叫《1581年11月16日恐怖的伊凡和他的儿子》）。

六七岁的我，欣赏能力刚刚停留在这种肤浅的感官水平，我对苏俄绘画的喜爱和感受只是在长大以后经过反复观摩，并大量阅读了苏俄文学作品才产生的，但是当时画面中宏大壮烈的历史场面，静谧辽远的自然风光开始静静地潜伏在我的意识深处。

与苏联有关的，还有一个在旧货市场买的手摇留声机，唱片是从国际书店买来的，是原版的苏俄歌曲。听着唱片，爸爸会抱起我划着舞步在屋里转圈，用不太准确的声调唱着“大列国大列国……”（歌曲《遥远遥远》）。最打动我的歌

曲是《茫茫大草原》，我虽然听不懂歌中唱的是什么，但是心已经被那忧郁苍凉和辽远的感觉所攫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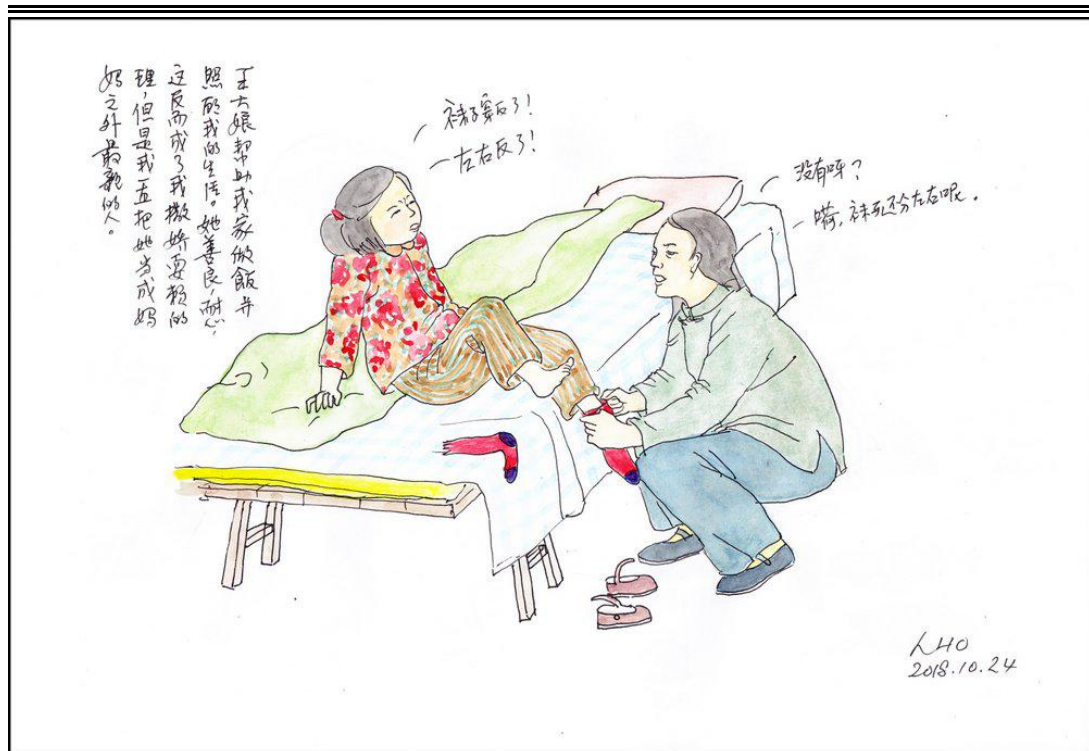
后来我喜欢画画，喜欢苏俄歌曲，喜欢苏俄文学，盖始于那时。当我能够阅读苏俄文学作品时，那画，那乐曲便与文字浑然一体地构成了我的理解。

五十年代初期，精神层面的中国属于苏联。我们这一代人在苏俄文化的熏陶下成长。

这些珍贵的书籍和画册在2001年爸爸去世不久，由姐姐作主让北京图书馆的人来挑走了一些有价值的书（爸爸的高中同学任继愈是北图的馆长），其余的包括爸爸后五十年的藏书全部卖给了书贩子，至此爸爸一生的精神积累连同他的肉体全部灰飞烟灭散落红尘。对，就是从这以后，我再也不买书了。



爸爸妈妈喜欢玩照相机，尤其是妈妈。家里有一个德国造的120莱卡相机，还有基辅牌苏联135相机。我们小时候照了无数的相片，家里相册高高的一摞。一天妈妈从单位借来几套少数民族的儿童服装，给我们打扮起来照相。海燕是彝族，克阳是朝鲜族，元元是蒙古族（实际上元元还小，放在托儿所没接回来，穿蒙古族衣服的是别人家的小孩）。我穿得最漂亮，但是谁也说不出来是哪一族的服装。至少我们知道了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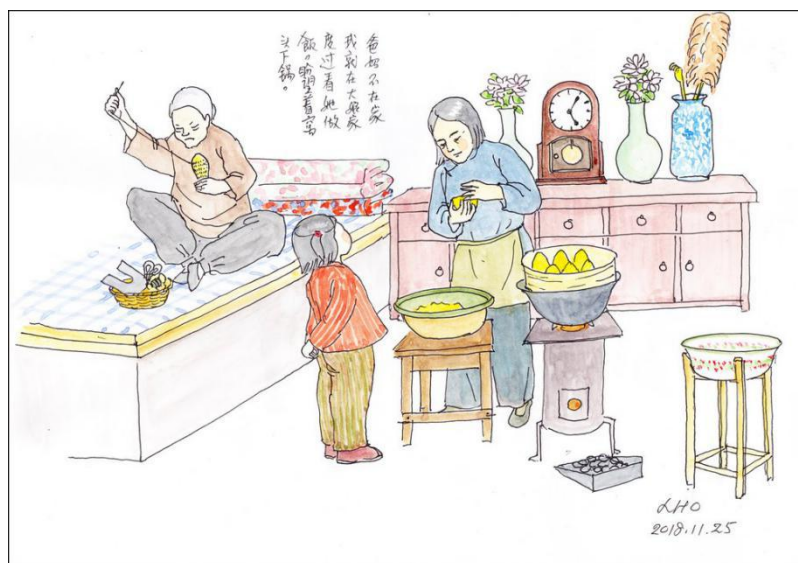


起初我们姐妹都放在寄宿的托儿所。后来我上了小学，走读，家里就是我一个人的天下了，不过放学后我绝不会老老实实在家里，直奔南院的王大娘家，一直泡到爸爸妈妈下班。

王大娘帮助我家做饭和打扫卫生。妈妈需要大娘时，就站在台阶上，拉开嗓门一喊：“大——嫂——”声音拐着弯，谱上曲子就是“6——5——”大娘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急急从南院赶来。她私下里跟我说：“瞧你妈妈那个大嗓门，大——嫂——”。

大娘是河北白洋淀人，瘦瘦高高的，也就刚刚四十岁，已经守寡好几年了。据说大娘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婚后的家境原来也还不错，丈夫在海关做检疫工作，因为高血压病，壮年早逝。家里没了收入，大娘要养四个孩子还有公公婆婆。一家人就靠大女儿在西郊农村当助产士，加上给我家帮工挣的一点钱糊口。日子过得很是艰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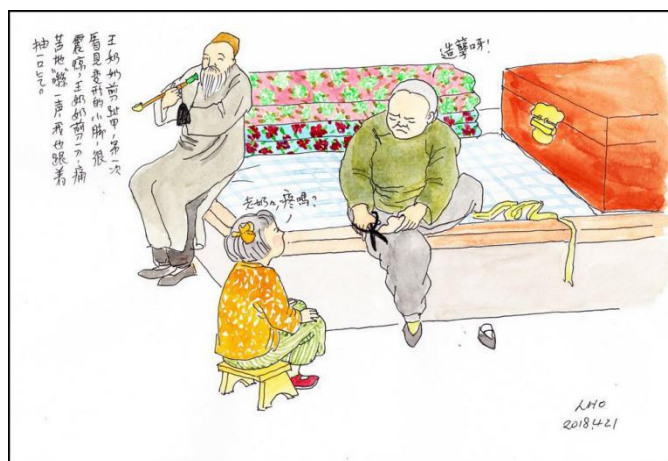
大娘永远带着慈祥宽厚的微笑，她的笑容就成了我撒娇耍赖的通行证。星期一早上大娘帮我穿衣服鞋袜，因为要上托儿所，我心气不顺，蹬着腿嚷嚷：“袜子穿反了。”大娘查查：“没有反啊。”我说：“是左右反了。”大娘笑了：“嗨，袜子还分左右呢。”便给我脱下来重新穿过。



虽然我任性调皮，会发点小脾气，但是已经把大娘当成了妈妈以外最亲近的人，像跟屁虫一样追着她。家里没人时，大娘是我唯一的依靠，我把她的家当做我的另一个家。大娘家是中国千百万

寻常百姓家庭中一个最普通的家庭，在那里我觉得无比温馨适意，看她和面做窝头，一个大绿瓦盆盛棒子面，兑上热水，抓起一团面，左手的大拇指插进面团，两手一边颠一边转，一个大窝头就出来了。等到下屉时，满屋是玉米香味的蒸汽。大娘必定掰给我一块，加上几根酱疙瘩丝或者雪里蕻，别提多香了，可这是大娘家日复一日的饭食。

其他时候，我聚精会神地看大娘熬浆糊、打褶裙、剪鞋样、搓麻线、纳鞋底。



大娘的公公我们叫老爷。老爷有一把长长的白胡子，一年四季穿一件长袍。老爷给我的恒常印象是终日坐在炕上，依着大红大绿的被垛，吧哒着一管旱烟袋，不多说话。偶然地老爷会给我们变一个戏法，他用食指背的第二节沾点唾沫，背转过身去在地上蹭几下，似乎他在地上捡起了什么，然后他攥着拳头，用其他几个指头把食指包围起来，只露出黑黑的第二节指背：“看，我捡了一个煤球。”然后张开五指向空中一撒：“去！”大家忙着寻找煤球的下落，他又伸手

沫，背转过身去在地上蹭几下，似乎他在地上捡起了什么，然后他攥着拳头，用其他几个指头把食指包围起来，只露出黑黑的第二节指背：“看，我捡了一个煤球。”然后张开五指向空中一撒：“去！”大家忙着寻找煤球的下落，他又伸手

在空中一抓：“来！”又把攥紧的拳头给我们看，“煤球”还在他手心。孩子们兴奋不已，去掰老爷的手指，很快地发现了秘密所在，可是下次老爷再变同样的戏法，我们仍是百看不厌。

大娘的婆婆我叫老奶。老奶多数时间盘腿坐在炕上，除了有时扭下炕来，沏个壶，烧个水。她的手从来不空闲，总是有做不完的缝补连缀的活，要不就是不紧不慢地絮棉衣，左手拿一块棉花，用右手指背一小块一小块地扯下，一层压一层，像鸟的羽毛，絮完的棉活只可顺捋，不可倒摸。我奇怪，问为什么不整块棉花铺上去，老奶说，那不暖和。我二十多岁时，北京就剩了我一个，需要自己做棉袄棉裤，老奶做棉活的记忆突然在我脑中活跃起来，变成手下熟练的技术，无师自通。

一个晚上父母出去看电影，把我放在大娘家，我看见了老奶小脚的秘密。她揭开一层层的裹脚布，把我吓得目瞪口呆——脚面鼓起一个大包，没有一个脚趾看得出形状，没有一个脚趾头在应有的位置上，你挤我挨凑成一个尖状物。趾甲都是厚厚的，现在知道那是因为从来不见天日变成的灰趾甲。我心里恐惧，眼睛却紧盯着看。老奶咧着嘴剪趾甲，她“哟”一声，我跟着抽一口气，问：“疼吗？”老奶说：“遭罪呀。”

我家搬走以后，我每个星期六都要去大娘家看望大娘。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从澳洲回来，最后一次去看了她，大娘九十五岁高龄去世。

正院东屋两间住着刘老太太和她的儿子刘老师。刘老太和我爸爸拐了十八道弯后有点沾亲带故。应该是：刘老太前任女婿的母亲和我父亲的三婶是亲姐妹。刘老太早年守寡，与儿子相依为命。可能是因



为守寡，脾气相当古怪，在我眼里刘老太太简直是个疯子，每次我到她家，她总是瞪起眼睛恶狠狠地喝道：“你个小兔崽子，干什么来了？滚！”我觉得亲戚不应该这样待我，又觉得没准刘老太是逗我玩，还赖着不走。刘老太就扭着小脚跑下炕，抄起菜刀挥动着：“我劈了你这个小兔崽子！”一直把我追赶到院子里还在骂骂咧咧。我一口气跑到大娘屋里，仍是惊魂未定。大娘笑说：“别去惹她，她就是这么疯疯癫癫的。”

刘老太并不是疯子，但是院里的大人孩子都不去她家，我是唯一——一个经常闯入她家的孩子。我冒死闯入她家是有原因的——为了见她的儿子刘老师。刘老师是个小学老师，大约二十来岁，身材匀称，穿一袭长大褂，围一条围巾，很像画中和电影中看到的五四青年。他的面孔白俊，双目清朗，即使是和小孩子说话时也认真地注视着对方，流露着慈蔼、善解人意的目光。这种目光时常让我怦然心动（才六岁左右啊，还是那话，谁要以为小孩子不懂事，那就错了）。每当他出现在院子里，便有一片光明和温暖激活了我的每一个细胞，我愚蠢地跳跃喊叫，希望引起他的注意。我渴望多见他一次，多受他一次注目。但是这种机会并不多，他总是不在家。

我们搬家后，每次去“旧家”总要打听刘老师的情况，大娘说刘老师一直不交女朋友，说是要给母亲送终之后才考虑婚姻问题。刘老太很长寿，总是听说刘老太还健在，刘老师还在伺候他妈。

后来我也成了刘老师的同行。有一次我终于见到刘老师，那时早已不再“心跳”。他已经五十多岁，在他脸上我幼时所思慕的俊朗飘逸的神态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我常见到的周围男同事们常有的为五斗米折腰的寒酸之气及囿于狭小环境塑就的迂腐之气。那时刘老太仍健在，刘老师的单身仍誓与母亲共存亡。

九十年代中期，我从另一个拐了十八道弯的亲戚口中听说，刘老师已经退休，母亲早已过世，但刘老师早已失去了结婚的兴趣，仍然孑身一人。

刘老师是二十四孝子吗？

还是……对女人根本不感兴趣？



东屋还有一间单独的小房，住着我的二堂哥玉海。他是爸爸堂兄刘长蔚的儿子，行二，我们叫他二哥。二哥比我大十几岁，参加过志愿军，1952年因为受伤从朝鲜战场回来，投奔了我家，爸爸给他租下了那间房子。

二哥经常给我讲朝鲜战场上的事情，他说他是志愿军的参谋长，打仗勇猛，人家叫他“小老虎”。他说话很有威力，连营长都要听他的。他的腿中过美国兵的枪弹，见人就撩起裤腿亮出枪伤，小腿上有一块鲜红色的圆疤。他还教我朝鲜话“阿爸基、阿妈妮、阿吉妈（大嫂）”。讲到战争的残酷，有一个故事让我深感恐怖。他说美国鬼子抓了志愿军或朝鲜人竟然活活剥皮。在俘虏的头顶用刺刀画一个十字，然后从刀口往下剥皮，鲜血淋淋，白骨花花。被剥皮的人开时还在破口大骂，剥到嘴部就没声了。他说这是他亲眼所见（他在什么场合可以亲见这种场面？）我听了吓得浑身打战，加上那时社会上盛传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而且是原子战，担心战争爆发成为幼小心灵中唯一的一片阴云。



二哥是个性格不羁的人，并没见到他正经去找工作，倒是经常带我出去玩，逛前门大栅栏、天桥。跟着他我首次接触了真正的老北京。我们在天桥一逛就是一天，看耍猴儿的，打把式的，卖狗皮膏药的，还有披着长袍一打滚就捧出一碗面条、一缸金鱼，甚至一口大缸的变戏法的。然后在一些肮脏的小铺里，坐在摇摇欲坠的长凳上，在油腻腻的桌子前吃碗牛肉面。吃完饭又到一个充斥着烟味，满地垃圾的小戏院看几出折子戏。那是我第一次看京剧，我记得戏园子里空荡荡的，我们选了一个座位，看的是《拾玉镯》《柜中缘》一类的东西。至今我还记得那戏子关门轰鸡的做派。后来二哥还带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

二哥抽烟很厉害，他的手指头被烟熏得棕黄，牙齿也是棕黑色，身上一股烟味。那时苏联展览馆刚开放，爸爸在那儿买了很多苏联香烟。烟盒是方形带盖的盒子，我记得其中一种牌子的烟盒上面画的是三个古代勇士骑在马上。烟卷不短，但是真正有烟丝的部分只有一寸。二哥在每个盒子的盖子里都用毛笔写上“戒烟”二字，打开烟盒对着“戒烟”二字照抽不误。

除了逛街抽烟，二哥的当务之急是找对象。不知是谁给介绍的，他见了不少女人。有一次他还带我去见一个女人，那人长得不好看，也不大方。之后他问我怎么样，我说一点也不好看，他似乎很失望。他有好多女人的照片，摊在桌子上，让我挑一张好看的，我选了一张，他一撇嘴说难看死了。有一次大娘悄悄对我说：“你二哥犯法，他把人家女的带回来，谈得老晚，就关上灯没声了。”我很是吃惊，知道了一个道理：男的女的在一个屋里关上灯没声是犯法的。有一次玉海又领了一个女友来过夜，终于事发，街道代表，妇女主任都来干涉，把爸爸也叫去了，直闹到夜里两三点钟。玉海声言要回沈阳，当时打点行李就离开了。过了两天“女朋友”的姥姥来找她的外孙女，说是她已有四天没回家了。大家猜想一定是玉海把她带走了。爸妈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不知此事怎样了结的，反正玉海后来的妻子不是这个女友。

妈妈不喜欢玉海，觉得他是个混混儿，不务正业。生怕他把我“带坏”了。爸爸对他则是有求必应，因为刘家男丁在大陆就剩他和他哥哥两个后人了。

二哥后来在沈阳当了工人，结了婚，生了三女一男。文革中他当了一个造反派的头头，造反派失势后，遭到对立派的毒打，身体受到极大损害，一日头痛暴病身亡。

住在西院西屋的林家，离我家最近，我的印象最深。住着五口人，林先生、林太太、他们的儿子，还有林先生的妹妹和她的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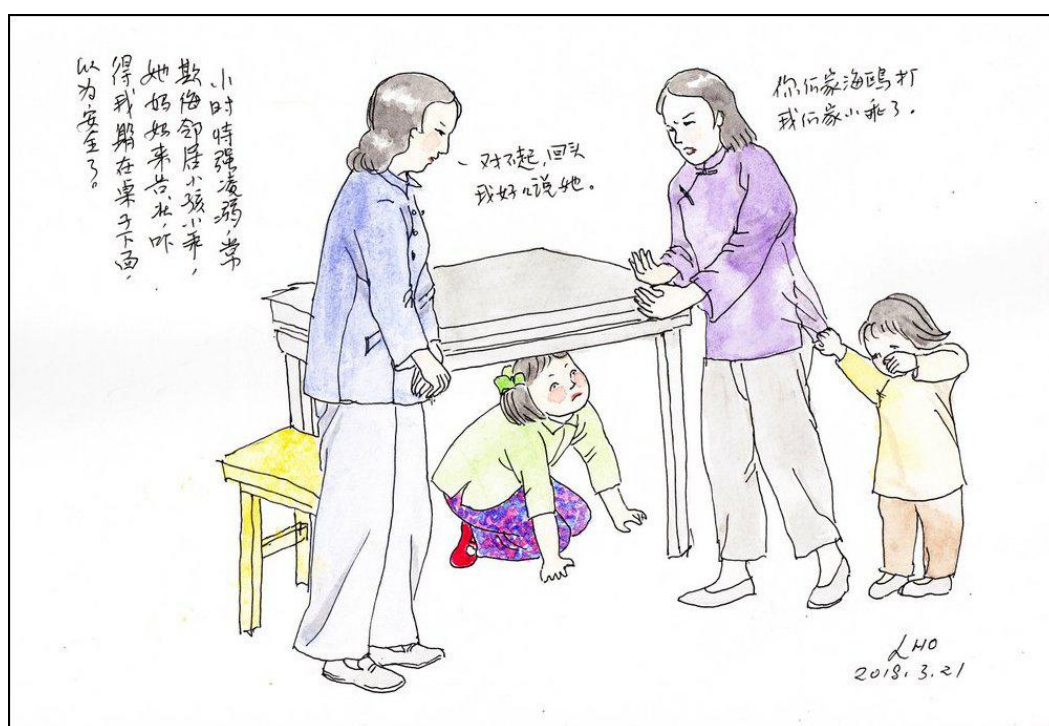
在我的眼里林先生是个老头，现在想想也不过四十多岁。他高额秃顶，留着两撇小胡子，嘴角下垂，两眼放着冷峻的光，他从不跟人打招呼，也极少听见他说话。那副样子始终让我想起国民党的大官（人们总以为小孩什么也不懂，其实小孩有着自己的判断力）。他似乎不工作，每天早上站在自家门前做八段锦。给我印象最深的动作是两臂垂直，手心向地，脚跟反复起落。做操时眼睛闭着，一副与世隔绝的样子。然后搬出一张小桌子，坐在院子里练习书法，他的腰板挺直，神态威严，如入无人之境。他写的字究竟怎样永远没人知道，因为他在一个折叠的册子上反复在同一个地方书写，每页纸上都是整整齐齐的八团墨迹，他可以几小时地在那些黑疙瘩上写下去。

林太太梳着旧时女人的那种发式，头发从额头向后梳去时先高高耸起一个大波浪，再一路下去，别在耳后。面相就不和善，和人说话时，总是露出虚假的笑容。他们的儿子大海双腿瘫痪，永远斜依在堂屋的一个角落。大娘说林太太特狠心，大海小时候不管他，总是让他睡在地上泡在屎尿里，得了风湿症，两腿僵直，不能打弯。大海那时大概十五六岁，看见我去他家总是很高兴，对我的态度很友好，他在家没有人可以说话，但是我不喜欢靠近他跟前，嫌他脏，嫌他身上有味。我发觉欺负弱者是人与生俱有的本性，对于大海，我虽然谈不上欺负，但是歧视他，至少是缺少同情心。

小乖妈没有丈夫，听大人风言风语地说，男的是国民党，不知下落。小乖妈很年轻，也漂亮，瓜子脸，眉眼秀气，样子有些苦相，低眉顺眼的，偶尔抬起眼来，便发现眼中藏着淡淡的哀怨。她的身体单薄，似乎弱不禁风，说话柔声和气或说低声下气，但是很少开口。林太太是家中主事的，小乖妈只是听着指挥，只做事不说话。小乖妈和林先生从长相到身板到气质没有一点相像，我一直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

由于小乖妈在家中的地位以及传说的国民党丈夫的背景，院里的人似乎都看低了她一头。孩子们敏感地捕捉到这种气氛，院子里十几个孩子，最受歧视的当然是小乖。小乖比我小两三岁，小眉小眼，瘦小伶仃。玩游戏时，如果我们缺了一个玩伴，就把她叫上，她便兴高采烈，受宠若惊。如果多了一个合适的玩伴，

立刻就让她“下蛆”（玩游戏中失败者离场的意思）。她可怜巴巴地站在一旁，看着大家玩。和我们一起玩时她永远不会赢，即使她能赢，也被我们用欺骗手段，“讹矫”耍赖，让她输掉。她倒从来不计较输赢，只要能和大孩子们一起玩，就是她的快乐。我有许多小玩具，现在看来都是些不堪入目的东西，如小石头、花籽、盒盖、小药水瓶等。高兴时，我会送给小乖一些，她如获至宝捧回家去。待我不高兴就一一要回来，或跑到她家乱翻一气，看见我给她的东西，就说这是我的，然后拿走。小乖和她妈从来不说什么，只是看着我乱翻，最多说一句：“这是你送给咱们小乖的。”



有一次我欺负小乖厉害了，大概是打了她，小乖妈终于忍无可忍上门告状来了。我迅速钻到八仙桌底下，像狗一样蹲着，虽无遮拦，却以为这样就可以逃脱罪责。小乖妈两手谦恭地放在胸前，说话非常客气，声音也好听。她一边说一边用一只手背轻轻拍打着另一只手心。父母道了歉，答应要好好地管教我，她很感激地离开了。

1955年我们搬家后，西院被总后收购，拆了盖将军楼，小乖一家不知去了哪里。只是听大娘说小乖上学后一直是三好学生，还是少年宫友谊合唱团的小歌手。我听了心里很不是味，在我眼里那么一个弱小的，不值一提的女孩竟是这么要强的优秀孩子，比我强得多。我的愚蠢的优越感第一次受到挑战，同时人的尊严问

题对我有了一点点触动。我对小乖至今还有不能排解的惭愧。

2001年我去“旧家”看房东四叔，问起小乖。四叔说小乖后来是一个小学教师，这会儿也应该退休了。又问大海，四叔说，在后门见过大海，坐在残疾车上。我说下次再见他替我带个好。又过了两年，再去看四叔，四叔说，一天还真的又碰见了大海，带去了我的问候。大海特感动，说“想不到海鸥还记得我。”

我一辈子都在后悔曾经欺负过小乖。总是想如果我见到她一定要向她道歉。



院子里不够折腾，就折腾到胡同里。胡同里最大的乐趣在于来来往往的小贩。

秋后，心里美萝卜下来了，一听到“萝卜赛过梨”吆喝，大娘就会带着我出门招呼“来个心儿里美！”小贩挑个大肚细尾巴的，“大妈，不甜不要钱，您呐。”刷刷刷几刀，递过来一个开了紫花的萝卜。

还有一个做米糕的，用一小团蒸熟的米粉，捏成窝窝，上面放一点糖水，再合上口，放在一个模子里按扁，倒出来就是一个面上有图案，周围有花边的小点心，酒盅口大小，二百元一个。吸引人的是吃完了还可以抽签，抽中了还可以得到一个免费的。他手攥两根粗钢针，其中一个后面拴了一根红线，抽到这一根，是你的幸运。经过细心观察，我尖细的小眼睛发现带红线的签子似乎比较粗，于是每次抽签时，抓住第一眼感觉比较粗的签子，总能得到一个免费的艾窝窝。

老尹每天都来，推着一辆车卖冰盏。冬天，他的车上装着一瓶瓶的红果酪、蜜渍椋梔、海棠蜜饯，红的粉的橘黄的，色彩诱人。老尹用两个指头夹着两个小铜盏，撞击出叮叮的声音，这声音如士兵征战的号角，立刻把各家的孩子集中到老尹的身边。孩子们围着小车，闪亮着眼睛，吞咽着口水。山楂海棠做的糖水很贵，一千元（一角）一碗，买不起，但是老尹为孩子们带来了“糊涂糕”，那是煮红果剩下的渣滓，烂兮兮的红果肉已经变成棕色，掺杂着大量的果核、皮、柄。递上二百元（二分），老尹从一本又黄又旧的书上撕下一页纸，舀两勺抹在纸上。捧着糊涂糕，心情不亚于现在的孩子捧着大蛋糕。嘬一口，将清凉的甜酸的黏稠的果渣吞下，舌头牙齿利索地滤出核、柄和一些麦秸一样的杂质。吃到最后，把那张纸舔了又舔，连同旧书页的陈腐味道一起吞咽，纸舔净后，往墙上一粘，便心满意足地回家了。

妈妈最恨我吃糊涂糕，她说那都是用烂的和有虫子的红果做的，最脏的是那张纸，不知是从哪里捡来的书，不知道多少人看过摸过，手指蘸着唾沫翻过，而且铅字是有毒的。也许妈妈说的都对，但这不是我关心的，只要好吃，顾不得其他。有时吃得正高兴，见妈妈下班回来，忙躲在胡同的墙角，匆匆吃完把嘴抹净才回家。

夏天，老尹的冰车上装的是冰激凌和冰棍。冰激凌是自制的，以冰碴为主。其实每星期天妈妈都要带我们去东安市场的荣华斋楼上的吉士林吃冰激凌——上好正宗的冰激凌，但在日常生活中，老尹的冰激凌给了我更大的享受。小号的



冰激凌只卖二百元，装在一个用米纸做成的指头大小的圆锥体小杯里，也就冒出半个指头肚那么高，这点东西够我们美美地嘬上半天。

有一个吹糖人的，挑着一锅熬化了的麦芽糖稀，用空心

麦秆挑起一坨，口含麦秆另一头吹气，糖稀便如气球一般鼓胀起来，他边吹边捏，几下子就捏出一只

猪、老鼠、公鸡，肚子鼓鼓的，爪子尖尖的，翅膀扇乎扇乎的。这些糖稀杰作对我们来说都是极端的奢侈品，我每天两百元的零花钱是买不起这些东西的，只能呆呆地张嘴看着。吹糖人的也有为小孩子准备的经济食品——用麦秆挑起一点糖稀，鼓起腮帮子一吹，吹出一个糖气球，孩子的拳头大小，比纸还薄，两百元一个，能买到一个糖气球我们就非常高兴了。妈妈严禁我买这种东西吃，她说麦秆上粘着小贩的唾沫，球里面都是他哈出来的湿气，吃了会染上肺病，但是只要吹糖人的来，总能从我这里赚上两百元。



胡同里经常穿梭来往的除了卖吃的还有工匠，磨刀的甩动一串钢片，吆喝“磨剪子 啷戥菜刀”，立时就有大妈大婶拿着菜刀赶出门来。有

一次我拿了一把小刀去磨，磨刀人认认真真地磨好，收了五百元，告诉我千万不要碰刀刃，特别快。我不相信，凡是大人叮嘱的事，我总是不相信，何况我觉得磨刀人也许会骗小孩的钱。我用手指一抹刀口，立时一个大口子，鲜血冒出来。我捂着手指，转身跑回家去，不让磨刀人看见，免得他说你瞧怎么样告诉你别碰你不听……

每天“修理雨旱伞……”“铜锅铜碗铜大缸……”“焊洋铁壶喔……”“有破烂我买，有小旧衣裳我买……”的吆喝此起彼伏。理发的则不吆喝，用一根铁棍把一个钢叉拨出颤悠悠的长音。无论是什么人做什么生意，他们的身边看热闹的小孩里肯定少不了我，一定从头看到尾。

胡同里玩不够时就“野”到街上。胡同南口沿着东街是一溜高墙整齐大门气派的大宅院，里面是绿色掩映的二层小楼。父母说这里住的都是党的高级领导人，比如任弼时什么的。平时偶见一两个女孩子穿着白衬衣草绿色背带裙如苏联电影中的小学生，眼睛朝天地出入那些两层小楼，一看就是与我们这一群胡同串子有天壤之别，我第一次隐约感到社会上的等级差别。

再往前走的胡同叫吉安所。这是一个让我感到最神秘的地方，它的名字让我想到派出所、公安局之类的机构，再加上胡同里院墙高筑，只有稀疏几家大铁门，且永远紧闭，从不见人出入，给人一种威慑力。更特殊的是这条胡同是柏油路，下雨时在柏油路上淌水，小脚丫觉得特别舒服。而所有的胡同都是泥土地，一下雨一脚泥。

七十年代后期，刘元在景山街道办事处工作，去吉安所检查过卫生，她可以历数什么大人物住在哪家，院子里有多么大，房子有多气派，总之，都是些开国将领的宅邸，文革后依然是高官的福地。



景山东街有个小人书铺，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租一本小人书，和一群男孩子（没有小女孩在那看书）席地而坐，享受阅读的快乐。一天我正在迷一本小人书，一个阴影遮挡过来。我抬头望去，一个老头向我走来。老头身穿蓝灰不分的长袍，油腻腻

的，头戴吕宋帽，下巴留山羊胡子，手持拐杖。“拍花子！”我脑中立即判断。大人们曾千叮万嘱，小孩子不要单独出门，拍花子一拍脑袋你就会糊里糊涂地被他拐跑。这老头子的样子和大人所描述的拍花子形象一模一样。他一步一步走近我，笑咪咪的。我惊恐地睁大眼睛，用手撑着地，屁股一点一点向后蹭去，直到贴到墙角一动不能动。老头说话了，是有口音的：“小朋友，你很爱学习呀，我常常看见你在这里看书。”说着向我伸出一只手，眼看手掌就要落在我的头顶上，我在墙角缩成一团绝望地闭上眼睛，心想：“完了，这下完了，要跟拍花子走了，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头拍过了，我睁开眼睛，还坐在墙角，老人还在跟前。

他看到我如此恐惧，说：“小朋友，不要怕，你知道毛主席吗？”我点点头。老头说：“我是毛主席的老师，毛主席是我的学生。”我不相信，尽管我才六七岁，我已经会思考很多问题：如果他是毛主席的老师，为什么破衣烂衫？如果他是骗子，他骗我有什么意义？唯一的可能，他是个疯子。我匆匆还了书，落荒而逃。后来想起，也许他真的就是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呢？



院子里有十几个孩子，大娘家的通哥、襄姐、达子，漂亮的小村姑秀兰、总是被大孩子欺负又总想和大孩子一起玩的小乖、调皮捣蛋的小牛兄弟、房东家的两个姑娘，还有从来把孔子和墨子带进名字的孔嘉、墨嘉两兄弟。

南院的尽西头是个厕所，有两个蹲坑。那时每个院子都有一个全院公用的厕所，不分男女。北京人上厕所不兴问里面有人没人，而是先远远地咳嗽一声，如果里面也是一声咳嗽，就是“回话”：有人了。我是很怕那个蹲坑的，一是太宽太大，害怕掉下去。一是看着红红绿绿的屎尿和爬来爬去的蛆，又恶心又胆战。最令人恐怖的是里面一摊摊的血和染满鲜血的长条手纸，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问大人，则是支支吾吾，只好自己生出无尽的猜测和遐想。一天在坑里我还看到一摊血上有一些血肉模糊的块块，吓得我跑到大娘家。大娘说那是一个小孩。我更加惊奇，那块肉样的血块怎么会是小孩，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扔到厕所里？大娘和其他的女人窃窃私语，谈论的是这块东西，从她们鄙夷和幸灾乐祸的神态中，

我判定她们是知道这东西的来历的。我觉得在人们中，在院子里有一个关于男女关系的可怕的秘密在成人中保守着。这个秘密始终没有揭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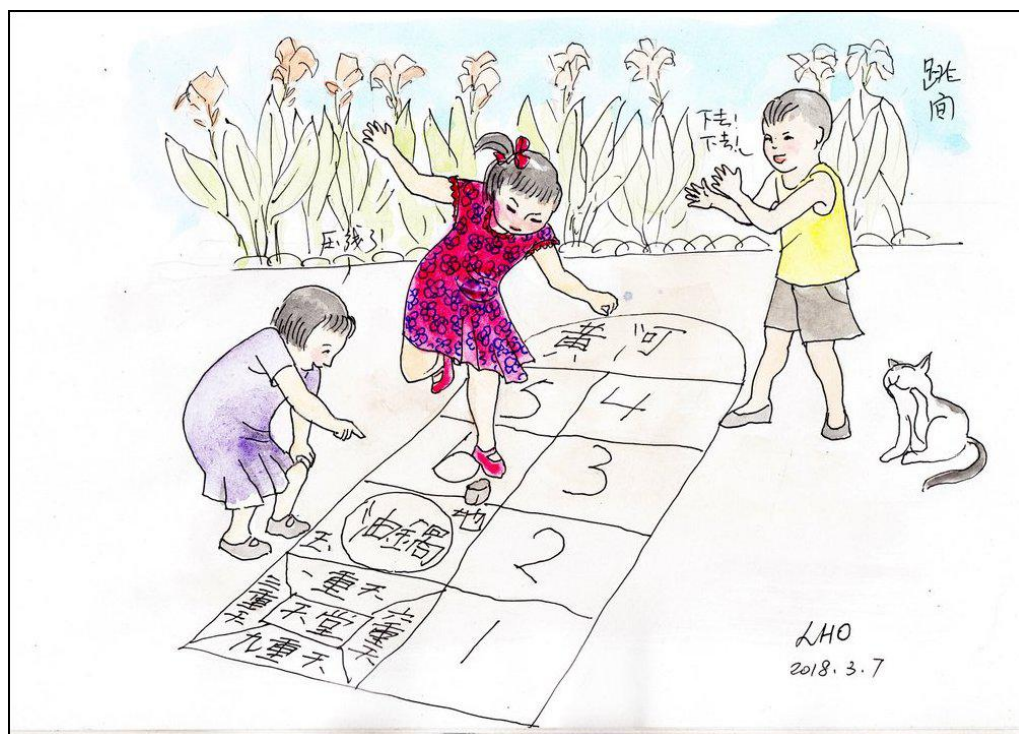


一年冬天，大娘和胡同里的女人坐在炕上聊天，我在旁边听着，说胡同里某家一对年轻夫妇双双中煤气而死。那女人低声神秘地说：“你知道吗，那两口子抬出来时抱得死死的，分都分不开。男的那玩意儿还插在女的身子里。”我立刻感到这是事情的关键，忙问什么东西插进去，我想象中是一把刀子，是一个可怖的谋杀案。大娘说：“去，去，小孩子别问大人的事。”这么一说，我更加不依不饶，大娘终于说：“男人的……插在女人的……里。”

我震惊得无法说话，世界上竟有这等无耻下流的事情！半天，我问：“他们是坏人吗？”得到的答复是“嗯”。我对男女性关系的最初认识就在这种极端的否定中建立了。

四、谁跟我玩儿，打火嫌（1951-1955）

我童年最愉快的时光就是和院子里的小伙伴无忧无虑地疯玩。我们的游戏无穷无尽，石头剪子布、拽包、跳间、歙羊拐、抓包（七个粽子形的小沙包，在手心手背颠来抓去）、捉迷藏、跳皮筋、踢毽子、抡大绳、挑竹签、官打捉贼……这些游戏还都配有拖着奇怪韵律的歌谣。游戏开始时决定谁先玩时说：“手心手背，狼心狗肺。”或者“淬丁壳”。



“跳间”的规则很复杂，跨过“黄河”，越过“地狱”，躲过“油锅”，到达“天堂”就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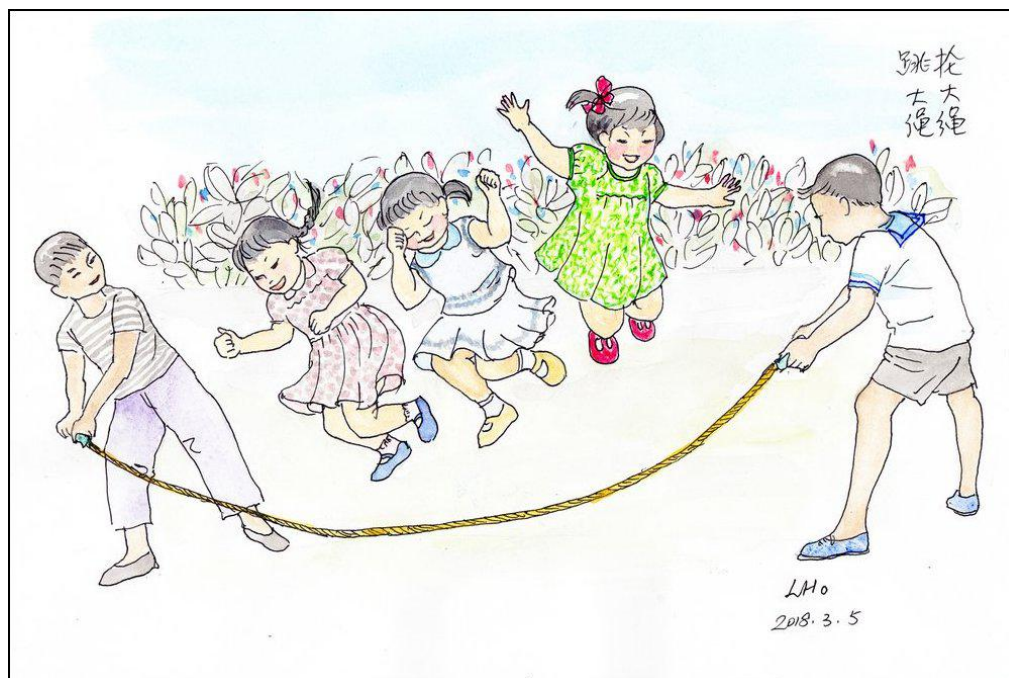


大娘有四个孩子。大女儿已经工作。大儿子通哥正在上中学，是院子里唯一的大男孩，小孩们都很崇拜他。他高高大大的，是个孩子王。有一回他让院子里的孩子们一人出二百元（二毛钱）开个夏日晚会。他用“集资”买了几张手工图片，上面画着一些小红帽大灰狼之类卡通人物和动物，图片上还画着一些一指宽的长条条，把人和动物剪下来插在长条上，两手一拉它们就动起来。晚上全院的孩子端着小板凳聚集在南院，通哥搭起了一个简单的“舞台”——两把椅子，中间拉了一块白布，白布后面点了蜡烛。通哥蹲在布后面，举着那些小纸人和动物，在烛光的照射下，就有了皮影戏的效果。他一边拉动着那些剪纸，一边讲故事，声音一会儿粗一会儿细，一会儿急一会儿慢地变换着纸人的角色。故事是他自己编的，他可能没有听过小红帽或其他著名童话故事，但他讲得更奇妙更有想象力。孩子们跟着大叫大笑，后来幕布上的剪影又跑又追打成一团，夏日晚会以椅子翻倒幕布坍塌为结束，孩子们玩得心满意足。

通哥是孩子们心目中的明星。可是在大娘和老爷老奶的眼里，他是个不争气的孩子，大娘想让儿子像他父亲一样读个大学，做个体面的工作，可是通哥就是不爱学习，初中毕业后他离开北京到大同煤矿当了挖煤工人。从通哥走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似乎他从大娘的家庭里消失了。



跳皮筋的口诀也加进了政治内容, “猴皮筋, 我会跳, 三反运动我知道, 反贪污, 反浪费, 官僚主义我也反对。”



跳大绳是我们喜欢的集体游戏之一。男孩子自愿给我们当劳动力——抡大绳。



踢毽很难，我胖胖墩墩的，从来没踢过十个以上，可是口诀很好听：“一个毽，踢两半，打花鼓，绕花线。里踢外拐，八仙过海。九十九，一百。”轻而易举就数到了一百。



拍球也有口诀：“小皮球，香蕉梨，马莲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嫁姑娘”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游戏。两个个更大的孩子当轿子及轿夫外加乐队，用右手握住左手腕，左手握住对方的右手腕，四只手编成一个座子。“新娘”耳朵上别两朵茉莉花，两腿跨进轿夫双臂环成的空档，坐在“轿夫”的手上，就算坐上了轿子。然后轿夫抬起“新娘”，满院行走，嘴里唱着：“呜哩哇——咚咚！呜哩哇——咚咚！”其他孩子跟着满院跑，嘴里唱着“塔塔滴，滴滴塔，有谁把信儿捎回家，一脚踏进牛皮花！”“新娘”坐在“轿子”上乐翻了天。



听到谁放了屁，就轮流指着每个人，边点边念：“叮叮当当，海螺烧香，粗米细米，放屁不是别人就是你。”最后一个字落到谁身上，谁就得担当放屁的责任，结果总是一场笑闹。



景山后街沿街都是槐树，丰丰茂茂的枝子垂得很低，一举手就可以够着一支槐叶。所谓一支槐叶，是一支细茎，两侧对生两排椭圆叶片。这一支叶子，也可以玩出“春夏秋冬”的游戏来。叶子的自然状态是“春”；从茎底部两指捏住往上一推，叶片都被挤到顶部，如一朵花，这是“夏”；一松手，叶片落下，是“秋”；最后手中只剩一枝茎，为“冬”。孩子们拿着槐叶，给更小的孩子演示春夏秋冬。我觉得这真是一个聪明深刻的游戏。



或者拣一根羽毛，把它贴着墙，一手按着它的杆，一手捋着它的毛，唱道：“鸡毛鸡毛你看家，我到南山采黄花，卖了钱给你花，我花一个你花仨。”松开手，鸡毛如果贴在了墙上，我们便相信鸡毛为了得到卖黄花的钱，乖乖地看家了。



一进大门洞的那间，住的是一家军属，家里有秀兰和她妈妈奶奶。秀兰和我一样大，怯生生的，说着一口很俚的话。她的穿着与城市小孩也不入流，绣花鞋，红绿搭配的衣裤，我们叫作“怯”。她长得却是俊俏，白白净净的椭圆脸，

丹凤眼，小嘴。那时的语言把农村女孩叫作村姑，秀兰就是一个漂亮的小村姑，我相信她长大了一定是那种典型的东方美女

我特别喜欢秀兰，我是无拘无束一身野性的孩子，单单偏爱腼腆羞怯的女孩。院里的孩子玩游戏时，我总是拉着她“加拨”（参加游戏），但她只是笑眯眯地站在一旁看一会儿，就遁回自己的屋子。冬天我经常到她家里，屋里暖暖和和的，有一点奶腥和臊气，她还有一个在襁褓中的小弟弟。炉边烤着尿裤子，炉上坐着开水。秀兰不言不语和我翻花绳，安静得像一只小白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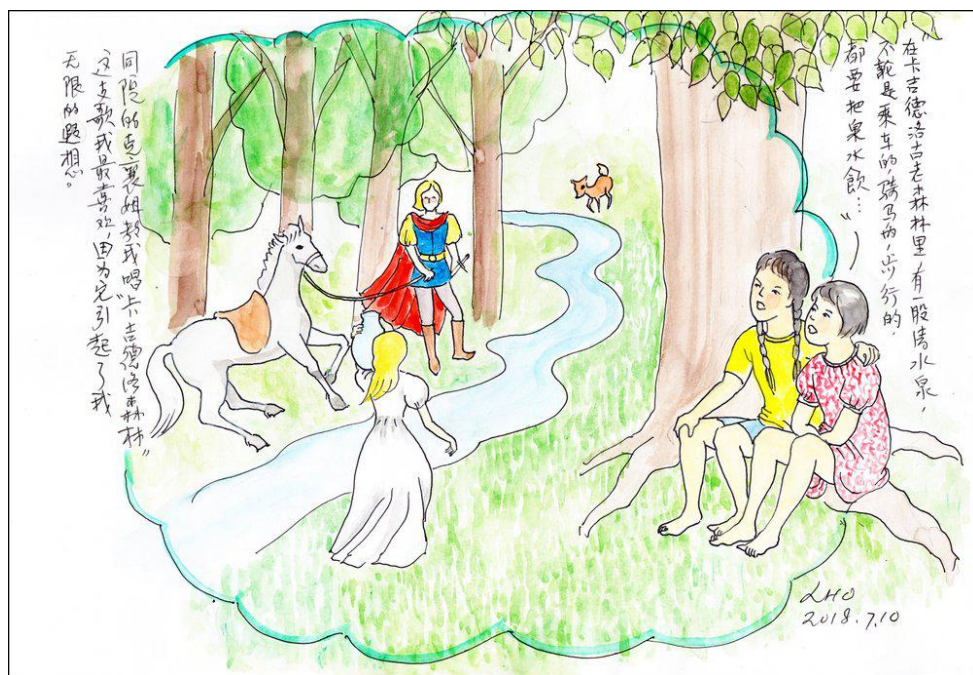
要不然我们两个就玩“打花巴掌”——“打花巴掌吹，正月正，老太太出门看花灯……”“谁跟我玩，打火爓，火爓花，卖甜瓜，甜瓜苦，卖豆腐，豆腐烂，摊鸡蛋……”童年无忧无虑，尽管儿童世

界以外的变化也渗入了我们的娱乐，比如跳皮筋时我们也唱：“猴皮筋，我会跳，三反运动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也反对。”打花巴掌时我们也唱：“噼噼拍，噼噼拍，大家来打麦，麦子好，麦子多，磨面做馍馍，馍馍甜，馍馍香，从前地主吃，现在自己尝，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但是我们要的只是它们的韵律，并不关心其内容。



我最好的朋友是大娘的二女儿襄，比我大三岁，我一放学就和她一起玩，所有女孩子玩的游戏都是从她那里学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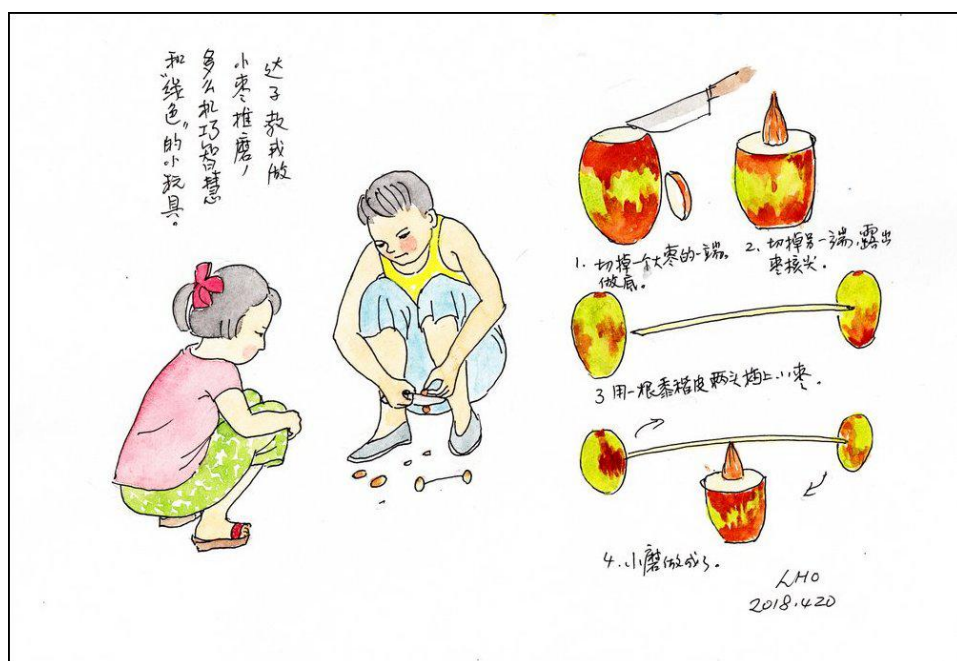
玩得晚了，我的功课没有做，妈妈回来就大发雷霆。即使是做了作业，也是浮皮潦草，错误百出，妈妈毫不留情，“嚓嚓”几下把作业撕掉，重做！我只好点灯熬油又困又累地写到老晚。为了对付妈妈的检查，我索性让襄替我写作业，她的字秀气工整，而我的字也像我一样四脚八叉放任不羁，不知为什么妈妈没有发现，每次检查，襄写的作业总能通过。老师倒是怀疑地问过我：“这是你自己写的作业吗？”我心虚地回答：“是。”老师并不说穿，因为凡考试我总是满分。



襄会唱很多歌曲，可能是在学校学的，回到家就教我唱，我最喜欢的歌是《在卡吉德洛森林里》，不仅那个跳跃的音阶“又清凉，又干净，又凉快，又甜美”朗朗上口，特别是歌曲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美丽的画面：白衣飘飘的汲水姑娘，王子装扮的猎人，在森林中的泉水边相遇，这一定有一个神秘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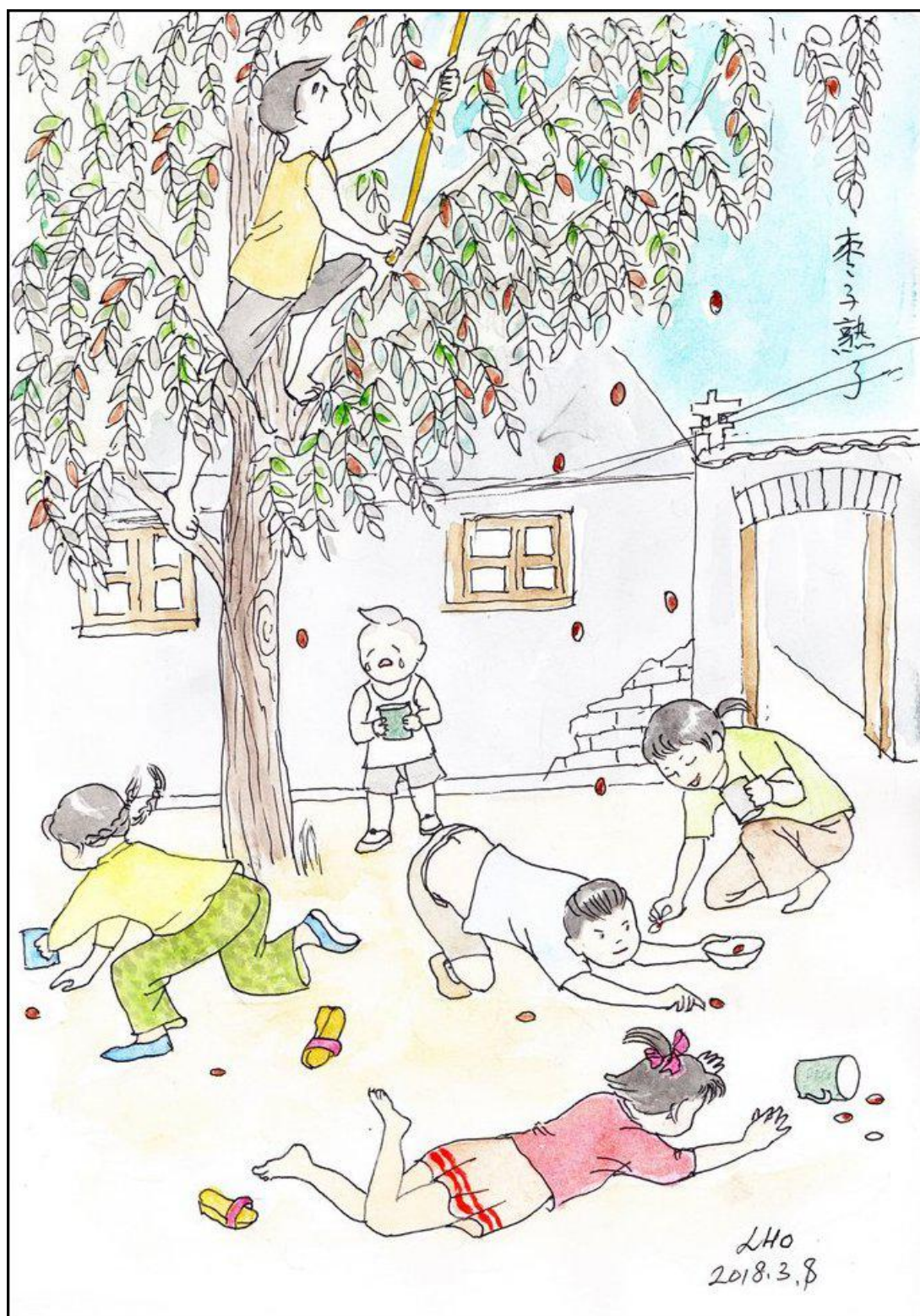
裹为人厚道，我们多数时候玩得很好。裹的手脚灵活，个高腿长，玩什么总是占上风，我们常常因为互相指责“讹矫”（玩游戏时耍小心眼或耍赖皮，女孩子称“讹矫”），争辩起来，裹就两手抬到胸前，手指捏着，向下作猴状，两眼上翻，嘴里念着“气猴猴，气猴猴”。这是女孩子成心气人的标准样子，让人鼓气。我就一捂耳朵说：“不听不听，王八念经。”女孩吵架也就如此了。不出五分钟，就又和好如初。倒是常常联合起来对付里院房东家的两个女孩。



我最喜欢的玩伴儿是大娘的小儿子达子。达子和我同岁，和他一起玩可以无拘无束，没有女孩子的斗小心眼。我们一块儿玩拍洋画儿、摔三角、弹球、剃刀子这类男孩子的游戏。

此外我和达子还可以在院子里找到无穷无尽的乐趣。

西院有一棵枣树，树干高高的，夏天常有一些青色的小枣掉在地上。达子教我用三个枣子做小推磨，先把一个大一点的枣一头削平，以便能站立在地上，另一头削去一小半露出尖尖的枣核，找一条两三寸长的秫秸皮（那时街上满地都可以捡到），两头插上大小一样的小枣，然后用大枣的核尖顶住秫秸皮的中间，一个小磨就制成了，轻轻推动小枣，它们就出溜溜转动起来。我觉得这个小发明极为机巧，后来我也教我的孩子们做，可惜，那时北京院子里的枣树已经很难寻到了。



院子里有两棵枣树，枣子熟了的季节是全院小孩的节日。通哥爬到树上打枣，孩子们拿着杯碗口袋在树下严阵以待，一阵“枣雨”落下，一阵孩子疯抢。我也

拿了一个漱口杯，东奔西跑，胖胖的笨笨的，还没捡两颗，摔了一个大马趴，枣子也都丢掉了，后来大娘给我送来一大碗。



院子里的大楸树下是儿童们的乐园，如果不玩集体游戏，孩子们就坐在大树下，看书，画画，刺绣，编织，下棋，玩玩具。



院子里和胡同里的孩子都爱来我家，在大楸树下看书。📖

【述往】

1973—1977：我的“二外”记忆（2）

李红云

二、来到二外

1973年9月14日，是我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这天，我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报到，正式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在这里我开启了为期三年半的学习与生活。

初到二外，每一个幸运地获得了上大学机会的我们，仿佛笼罩在耀眼的光环下。那个时候，我们被称为“光荣的工农兵学员”。真的是“时代的宠儿”，也是“天之骄子”。

这是因为我们不仅仅是来上大学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发挥“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上、管、改”。这一口号最早是由清华大学试招的工人班学员自发提出的：“我们上大学，还要管大学，像工宣队那样改造大学。”这个所谓的“上、管、改”口号后来得以广泛传播，并在中共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确定下来，简称为“上、管、改”。⁹³这意味着：大学以前是“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而今天，我们——工农兵学员是“教育革命的生力军”，我们就是要夺回这块被资产阶级占领的阵地。

1973年第四期《教育革命通讯》有一个栏目就是：“充分发挥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作用”。

那时候，我真的以为自己肩负着“上、管、改”的使命，大学的未来是我们的。每每想到这些，心里就充满了希望，油然升起一种莫名的自豪感。

当时的心情就像后来的那首《工农兵学员之歌》⁹⁴里唱的：

“迎着灿烂的阳光，肩负党和人民的希望，我们工农兵学员，来自祖国四面八

⁹³ 参见刘慧：“中国高等教育的怪胎——工农兵学员探析”，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4月，第36页。

⁹⁴ “工农兵学员之歌”载于国务院文化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编：《战地新歌》（第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5月，第180页。

方。带着工人阶级的嘱托,带着贫下中农的期望,带着革命部队的传统,走向教育革命的战场。壮志凌云,红心朝阳,……我们工农兵学员,青春似火,意志如钢。努力攀登科学的高峰,要为无产阶级争光,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面向三大革命的课堂……。”

至于我们来到二外是从事外国语言专业学习的,专业培养的目标是什么,入学教育中没有提过,我也根本没想过。

其实,当时全国的高校只有一个共同的培养目标,即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⁹⁵

当时我也没注意过这个培养目标。该目标中的“劳动者”,实际指的是体力劳动者。如果仔细想过,也许我就不那么兴奋了。

现在想起来,当年的“壮志凌云”包含了多少盲目与狂热。

1.二外的校园

二外是一所年轻的高校,建于1964年10月。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提议,在原新华社外文干部学校基础上建立的。周总理亲自选定二外校址,亲自确定校名。现在二外的英文校名虽然已经修改,但中文校名仍然沿用至今。⁹⁶

如今二外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周恩来总理的塑像。塑像底座的背面刻着这样一段文字:“1964年春,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深感外事渐多而人才匮乏,遂提议新建一所外语学院。此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之肇始。”⁹⁷寥寥数语,勾

⁹⁵ 李贵连等编:《百年法学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1904-200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54页。

⁹⁶ 1973年至1976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使用的英文校名是:Second Peki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或Peking No.2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参见当时的教材。而现在二外的英文校名是: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⁹⁷ 冉茂瑜:“应急办学 一气呵成——二外创建的历史回顾”,载于《二外四十年》编辑委员会编:《二外四十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163页。

勒出了二外建校的初衷。

二外位于北京的东郊，原址为北京矿业学院的东郊分院。她所在的地方有一个颇为吉祥的名字——“定福庄”，但那时二外所处的环境却是名副其实的“荒郊野外”，很难与这个好听的名字搭上关系。学校离市中心较远，来学校需出朝阳门到东大桥换乘郊区42路公交车，到定福庄下车，进学校北门。北门外是京通公路，窄得只有七米，两边都是沟，长满杂草。因为都是郊区的线路，公交车要每隔半小时一趟。交通极不方便，车上拥挤不堪。

我们入学时学校的南门还没建好，南面是一大片庄稼地，走好长一段路才能到公路上。天一黑走那段路会很害怕，总担心从庄稼地里会突然窜出个坏人来。后来南门建好了，门外的公路也修好了，才有了另一条通往学校的路线：乘坐大一路公交车到大北窑，换乘开往通县的郊区公交车，下车进学校南门。

那时我还没去过北大、清华，唯一去过的高校是北京师范大学。在我的印象中，大学有教室、图书馆、操场、宿舍、食堂，这就足够了。二外虽不是名校，校园也不大，但她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她在我心中已足够美丽。

报到那天我是从北门进的学校，进门后看到的是一号楼和二号楼。

这两座楼是教学楼，我们年级的教室在一号楼的三层。每个班的教室是固定的，每个人的课桌和座位也是固定的，不用每天背着书包到处找座位上自习。我们班的教室窗户朝南，宽敞而明亮，窗外的梧桐树枝繁叶茂。四层的404是个大的阶梯教室，是全年级开会的地方。404教室旁边的台阶可直通楼顶上宽敞的天台。

图书馆和阅览室在二号楼一层东面，是一个大教室。从教室出来，沿着那条“两边都是梧桐树”的小路走过，东面是男生宿舍楼。再往前走一点就是学校的办公楼，女生宿舍就在办公楼的楼上。办公楼南面是大操场。

校园里有个所谓的“大礼堂”，遗憾的是里面没有椅子。开会、听报告都要每个人扛着教室里自己的椅子过去。校园里偶尔会放映露天电影，也是要集体排队扛着椅子去看。

我们每天活动就在这几个点之间进行，中间距离不大，不用骑自行车。

2. 英语系 73 级概况

二外在 1966 年中断招生后，1972 年恢复招生。当时全校有四个系，分别是：英语系、西欧语系（法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东欧语系（德语、俄语、捷克语、阿尔巴尼亚语）、亚非语系（日语、阿拉伯语、朝鲜语、越南语）。其中只有英语系人数最多，而且是全校唯一一个单一语种的系。因为人多势众，被学生们戏称为“大英帝国”。

英语系在 1972 年已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其中有部分学生是为新华社和国家体委代培的。⁹⁸后来担任过中国足协副主席、亚洲足球联合会副主席的张吉龙就出自英语系 72 级。另外，英语系 72 年还从北京市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了几名学生。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

英语系 73 级共招收的学生为 168 人，其中党员有 40 人，约占学生总数的 24%，团员占绝大多数，非党非团（这部分人当时称为“群众”）的是个别的，全年级不超过 10 人，约占总数的 0.5%。

我所在的 7 班一共有 17 人。女生 7 人，男生 10 人。其中党员 4 人，团员 12 人，只有一名同学是群众。这名同学很快也被发展成为团员。

学生来源

我们年级同学绝大部分来自部队、工厂和农村。其中来自部队的有 19 人（女生 9 人，男生 10 人），他们中来自炮兵 12 人，新疆部队 3 人，兰州部队 2 人，河南部队 2 人。因为在校园中他们穿军装，所以格外显眼。从他们穿的军装中可以辨别出有 3 人是干部，其余的都是战士。因为干部的上衣有四个兜，战士的只有两个兜。

来自农村的同学多为 1966-1971 届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中学毕业到农村插队或到东北、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其中北京到山西插队的就有二十多人。来自工厂的也主要是 1968-1971 届中学毕业到工厂的青年工人。除了来自工农兵以外，还有的同学是从其他单位来的，如：酒店、医院、广播电台、外贸单位等。

在生源方面，北京生源占了多数。其他地方的生源还有天津、河北、内蒙古、

⁹⁸ 1972 年，国家体委从军队系统选调了 20 多人到二外学习。参见张吉龙：“情系母校，冀望未来”，载于《二外四十年》编辑委员会编：《二外四十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年 10 月版，第 491 页。

上海等地。

学生年龄

入学时，我们年级大部分同学的年龄在20岁左右。除个别同学外（有1949年出生的），大部分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即“50后”。当时年龄最小的17岁（1956年出生），最大的24岁（1949年出生）。这符合当时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条件，即25岁以下。

由于学习外语的特殊性，年龄不宜过大，二外要求不得超过22岁。所以超过22岁的同学是少数。

文化程度

据1972年5月8日国务院教科组转发的《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中反映，北京市11所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中，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初中以上程度的占20%。⁹⁹但英语系73级的情况与此报告却大相径庭。

据我的了解，我们年级绝大多数同学的文化程度为初中，极个别同学为高中，没有应届的高中毕业生。保守的估计，我们年级同学中，初中文化程度的所占比例为95%以上。

即使是初中程度或高中程度的，毕业没毕业也很难说。以我自己为例，我是67届中学毕业生，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只读到初中二年级，严格说起来并没有完成初中的全部学业。多数同学与我的情况类似，个别上过高中的同学也只在高中读过一年，完整上完初中的同学也是少数。还有的同学在“文革”开始时还是小学生，后来的中学教育并不正规。

男女生比例

我们年级男生大约98人，女生70人，男生略多于女生。男女生比例为1.4:1。这与现在外语院校男女生比例悬殊的情况相去甚远。

⁹⁹ 高奇著：《新中国教育历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0页。另可参见程晋宽著：《“教教育革命”的历史考察：1966-1976》，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429页。

英语基础

入学后，我们168名学生分成了10个班，每个班16-17人。其中的10班称为“快班”，是由英语基础较好的同学组成。他们都曾在北京或外地的外国语学校或外国语学院附中学习过。大部分同学的英语基础仅停留在中学学的那点英语上，还有的同学从未学过英语——零基础，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

我好歹跟着英语广播讲座学了几个月，认全了26个字母。

家庭背景

那时能上大学，家庭出身还是很重要的。1978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大体说来，可以称之为“出身”和“成分”的社会。¹⁰⁰自1949年以后，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向工农开门的同时，对剥削阶级子弟和历史不清白的家庭子女实行了限制的政策。¹⁰¹

在1973年的《国务院批转国务院教科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在保证‘工农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的前提下，注意适当招收确实表现好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¹⁰²这一意见在家庭出身问题上稍稍做了点松动，但仍以“工农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为前提，实际上仍把出身不好的人屏蔽在了大学之外。

据我的了解，我们班17人中出身于干部家庭的有3人，知识分子家庭的2人，工人家庭的9人，贫下中农家庭的3人。来自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同学约占29%。但各班的情况并不一样，后来全年级调整为8个班，我去了另外一个班，这个班共18人¹⁰³，来自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同学有13人，比例高达72%。若把这两个班的人合并计算，来自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同学约占了51%。全年级

¹⁰⁰ 见谢泳：“‘出身’和‘成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载于林贤治主编：《烙印》，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年4月，第302页。

¹⁰¹ 董美英：“教育机会均等视阈下重点高校大学生来源的历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9届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3月，第50页。

¹⁰² 董美英：“教育机会均等视阈下重点高校大学生来源的历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9届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3月，第85页。

¹⁰³ 这个班的实际人数为22人，因有另外2人是跟我一起从原来的班调过去的，还有1人为72级延长学习的，为了不作重复计算，认定为18人。

的情况我了解得并不全面，但据我的估计，50%或以上应该是来自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同学所占的比例。其中有的同学来自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至于谁是“走后门”进来的，这属于个人的秘密，别人是不知道的。¹⁰⁴

另外，全年级没有来自“剥削阶级家庭”或“历史不清白的家庭”的同学。

组织机构

我们入学时，二外的领导机构是“革命委员会”，设主任和副主任，履行校长和书记的职责。当时工宣队还常驻在校¹⁰⁵，其成员来自北京国棉二厂。英语系有党总支，73级设党支部。年级党支部书记由教师担任，副书记二人由一名教师和一名学生担任。支委由学生和教师共同担任。刚入学时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位姓王的女老师，副书记有一位是从部队转业到二外的程老师。

全年级共10个班，每班设党小组长一人，班长一人，副班长一人。这三人组成班里的“领导班子”。

由于团员众多，全年级设团支部5个，每两个班的团员组成一个团支部。团支部由三名委员组成，分别担任书记和支委。每班的团员组成一个团小组，由团支委担任团小组长。这些干部的产生并非选举，而是开学后由党支部直接任命的，依据可能是每个人的档案材料。我们7班和8班组成第4团支部，我担任支部的

¹⁰⁴ 由于高校招生“推荐制”所带来的“走后门”现象，中共中央于1972年5月1日发布了“中发【1972】19号文”《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该通知中说：“当前值得认真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 and 单位情况比较严重。据反映，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工作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这种‘走后门’不正之风，严重干扰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破坏教育革命的成果，败坏党的优良作风，损害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对于这些‘走后门’进学校的青年的学习和进步，也是不利的。”转引自董美英：“教育机会均等视阈下重点高校大学生来源的历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9届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3月，第91页。

¹⁰⁵ 工宣队进驻高校源于1968年7月27日，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来称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在人民解放军战士配合下进驻清华大学。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向全国推广这一办法。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在其批示中指出：“现在从学校撤出工宣队，已不影响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批示精神，各地进驻大、中、小学的工宣队随即全部撤出学校。参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1页。

宣传委员，兼任班里的团小组长，主要工作就是收缴团费，组织学习。由于大部分同学都没有工资，团费每个月每人缴5分钱。

回到阔别的校园，一切熟悉又陌生。突然从每天工作8小时的工厂来到学校，我忽然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兴奋了几天之后，跟同学们一样，我开始尝试着适应学校的生活。

3.食、住两样事

食、住两样事是高校里躲不开的话题。

先来说说“住”。

在二外报到后就分配了宿舍。我们的宿舍既简朴又简陋，每间宿舍住6-7人，除了放在房间四角的双层床外，没有其他的家具。没有桌子，没有椅子，连个小方凳也没有。属于个人的空间只有一张床，好在个人也没很多物品，一张床足矣。两张床之间拴个绳，晾上毛巾和洗的衣服，也觉得挺好。我喜欢睡在上铺，为的是干净。因为室内没有椅子，进房间就会坐在下铺的床上。

二外和其他高校一样，对工农兵学员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的管理模式。日常作息是半军事化的，每天早上六点半铃声一响就要起床，后来有段时间铃声还改成了部队的起床号。起床后要迅速下楼，全年级排队集合出早操。先是围着操场跑一圈（400米），然后跟着大喇叭做上一套广播体操，这才回来洗漱，再到食堂吃早饭，八点钟准时到教室上课。

午饭后可以回宿舍休息会儿，下午又接着上课，直到晚上再回宿舍。晚上十点熄灯，铃一响就关灯睡觉。

对这样严格的作息時間，大家都自觉遵守。几乎没有人逃课、逃早操，晚上熄灯也不需要拉电闸。

熄灯后有同学会用半导体收音机听广播。但当时半导体收音机还是比较昂贵的“奢侈品”，并非所有的同学都有，特别是可以收听短波的那种。我有一台不错的收音机，经常戴上耳机听听“Radio Peking”（北京广播电台）¹⁰⁶的对外英

¹⁰⁶ Radio Peking（北京广播电台），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前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沿革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50年4月1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开始使用“北京广播电台”（Radio Peking）呼号。1978年4月18日，正式更名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并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离出来。参见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419/13/26620346_746891728.shtml，访问时间2021年5月5日。

语广播。虽然可以听到“Radio Pyongyang”（平壤广播电台），但该广播的英语发音太过生硬，我很少听。

有同学会偷偷地听BBC（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的英文简称）或美国之音的英语节目，但听这些台还是要小心，弄不好会被扣上“偷听敌台”的帽子，那可就得得不偿失了。熄灯后大家还是忍不住会聊几句，但基本上都很自觉，不会长时间聊天。

当时实行的是每周6天工作制，每周六下午一般没课，可以自由活动。北京的同学一般会回家，但按要求每周日晚上7点前需返校，7点还要到404教室点名。缺席的要受到批评。

再来说说“食”。

说到二外的食堂，不同年代的二外人应该拥有不一样的记忆和就餐体验。

当时全校学生只有一个食堂，位于校园的东侧。全校学生都在那里吃饭。食堂不提供任何餐具，餐具要自己准备。几乎每人餐具的标配就是两个搪瓷的饭盆和一把铝制的饭勺，因为不锈钢勺当时基本没有。食堂里专门有放置这些餐具的碗架，吃饭时自取，吃完后放回。因餐具的样子都差不多，拿错的概率非常高。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票证年代，粮食（大米、白面、玉米面）、食用油、鸡蛋、肉都是定量的。一日三餐变换的花样很少，每顿饭食堂向所有就餐的学生（不管男生还是女生）提供相同的饭菜，而且没有其他的选择。主食基本以大米和白面为主，偶尔也会有粗粮，即玉米面。那时每人一天的粮食定量是一斤左右，男生要多一些。如果想多吃，可以额外买饭票加馒头或窝头。

到了饭点，食堂的各个窗口前都会排起长队。

早餐一般是一个馒头（大约二两）、一碗稀粥（一两），大米的或玉米面的“面粥”，外加一点咸菜。偶尔吃一次油饼，大家会非常兴奋。

午饭的主食是四两，米饭、馒头或面条，一份菜，基本是蔬菜，看不到油星。在冬季，北京的蔬菜就是“老三样”——白菜、土豆、萝卜。如果在菜里面发现一片肉，哪怕有一块豆腐，都会让你心头一喜。鸡蛋很少见到，只有凭医务室的证明可以到后厨打一份病号饭：一碗看得见鸡蛋花的面条汤。如果有肉包子，那就像是过年了。肉包子每个二两，每人两个，一口咬下去会有带着点油的汁水流出来，顿时久违的肉香留在了唇齿。三口两口吞下去，味蕾和胃都得到了满足。

有的女生饭量小，往往吃不下两个大包子，经常是她们一个包子还没吃完，就有男生在旁边等着“捡剩儿”。

晚餐跟早餐差不多，也是三两粮食，有时咸菜换成豆腐乳。

吃饭时，每个班有两张固定的饭桌，四四方方的那种。通常男生围一桌，女生围一桌。没有椅子，大家都是站着吃，吃完饭自己洗碗。那会儿的碗很好洗，因为没有油，不用洗洁精，也没有洗碗布，清水一冲即可。洗完后把自己的餐具往碗架上一放，准备下顿饭再用。当时并不懂什么是“环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物质匮乏。

以吃饱为第一需要的我们，能填饱肚子的都是美食，不管是馒头窝头还是熬白菜。但让我不能忘怀的还是那能流出油的肉包子。

那时也用不着疾呼节俭，反对浪费，因为粮食是定量的，谁也舍不得把白花花馒头扔掉。

学校的伙食油水太少，学校周边也没有可以改善伙食的地方，即使想改善也没有经济条件。北京同学会在周末回家补充些营养，回校时带点简单的零食。

那时虽然饭菜简单、清淡，没有油水，蛋白质尤其不足，但大家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4. 生活其他事

当时二外的生活条件很差，像洗澡、打开水这种事情都很不方便。

全校学生仅有一个浴室。浴室开放时间有限，空间狭小，人又多，经常是拥挤不堪。

教学楼里没有饮水机，也没有可以打开水的地方，更没有现在的瓶装水或桶装水。喝的水全靠自己在食堂附近的开水房打，且供开水的时间也有限。我们通常是吃饭的时候带上暖水瓶，吃完饭打壶水带到教室。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做，于是有打水的，也有不打水专门喝水的。尤其是晚上，我吃完晚饭打壶水带到教室，准备晚上回宿舍洗漱用，经常是被人喝得一滴不剩。

学校西边的小门外有一个小商店，平时可以在那买点简单的日常生活和学习用品，但很少能有水果，零食也少得可怜。

回想起来，那时的生活条件确实艰苦，但在精神上仍然很快乐。

5.工农兵学员的待遇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工农兵学员的待遇。

从1970年到1976年，由于高校招生采取的是“推荐制”入学，学生入学前已经是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按照国家的规定，这期间入学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待遇为：“10年工龄(1971年8月起改为5年)以上的国家职工，由原单位照发工资；其余学员普遍发给伙食费和津贴费(以北京六类工资地区计，每人每月发给19.5元)；解放军学员由部队负责供给”。¹⁰⁷

我们入学后，5年以上工龄的同学由原单位继续发工资；部队来的同学的伙食费和津贴都转到了学校，军装由北京军区发，在学校领；其余的同学每人每月在学校领19.5元。其中伙食费15.5元，发饭票，另发津贴4元钱。

从上述规定来看，工农兵学员在校学习期间是享受人民助学金的。只不过这期间的人民助学金制度是以另一种津贴或者生活补贴的形式出现的。¹⁰⁸

我当时的工龄是四年半，没有带工资，但根据规定上学时间仍计入工龄。即便没有工资，每个月发的饭票再加上4元钱的津贴，基本够吃饭和日常开销的。

这是因为，工农兵学员在校期间，几乎所有的费用是全免的，包括：学费、书本费、住宿费、电费、水费等。学校内设有医务室，学生享有公费医疗。平常有一般的疾病，可以在医务室处理。花5分钱挂个号，打针拿药都可以，还有简单的治疗。如有稍微严重点的疾病，可以转到朝阳医院就诊。

那时的伙食费并非直接发现金，而是发饭票。在粮食供应定量的那个年代，我们的定量要高于普通市民。当时北京市成年女性市民的粮食定量每月是28斤，而我们女生每月是32斤以上，男生还要高于女生。在很多物品都要票证的年代，我们的布票、购货券都是按照北京市的标准发放。布票用来买衣服，像肥皂这样的生活用品需要用购货券。

可以说，在当时中国人还没有解决温饱的情况下，政府尽了最大努力给工农兵学员提供了较好的待遇。

¹⁰⁷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第101页。

¹⁰⁸ 参见刘华：“我国高校助学金制度的产生与变迁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19页。

虽然伙食油水很少，但吃饱还是可以的。每到月底班长就到校部把全班下个月的饭票领回来，发给每个同学。所谓“饭票”，其实是一张薄薄的纸，白色、黄色、绿色或粉红色，每个月的颜色不一样以示区分。纸上印了一个个小格子，麻将牌大小，分别印着早、午、晚。每次拿到这些饭票，我要把它们裁成合适的纸条，小心翼翼地放在自制的饭票夹里，吃饭时按早餐、午餐和晚餐，吃一顿饭交一张小格子。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每餐对应的价值是不同的。一个月按30天计算，每天的伙食费不到5角2分钱，早餐最便宜，午饭和晚饭要多点钱。一个月没有吃完的饭票会由班长按人头收齐到学校退钱和粮票，再退给同学。

听男生说，有同学在饭盆底部沾点水，打饭时故意把饭盆往打饭窗口里面放，用饭盆底“粘”已经交了的饭票。运气好可以“粘”到几张，这样可以拿去再打一份饭菜，或退点钱和粮票。有些家庭生活困难的同学还要靠退的钱维持自己的日常开销。生活特别有困难的同学可以向学校申请额外的补助，记得我们班的一位同学因要配眼镜而申请了补助。

很快，刚入学的新鲜感一过，真正的校园生活开始了。每天的活动范围就是教室——食堂——宿舍——操场，四点一线。

入学时的万丈豪情很快就融化在这四点一线中。❷

【述往】

红色时代的历史缩影

——五六十年代山西翼城上学记

安希孟

我于一九四五年金秋时节生于山西翼城县东南一隅一破窑洞中。父亲安受祐是乡村小学教员、乡政府文书、生产大队会计，精于珠算，为人谦和有礼，处事机智周到。母亲黄桂兰为文盲，乃一朴实、敏捷、勤劳、聪慧、善良的农家妇女。但懂得“敬惜字纸”的道理，亦鼓励子女向学。父母宵衣旰食，哺育子女。一家基本生存状态是粗茶淡饭，补破遮寒。

我的家在太行山麓。儿时听说抗战时磨盘山驻扎国民党陈子文部队。陈子文率部每到鄙村，都毕恭毕敬拜访乡塾名师秦孔思，执弟子礼甚恭。秦孔思先生也

每每送至门外揖别而还。我听后常常犯嘀咕，国民党军队还懂礼节？为什么不烧杀掳掠呀？

幼年乡村村民自治。旧时“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在中华民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中国虽无地方自治之名，然确有地方自治之实。上世纪50年代，突飞猛进。古老山乡也可以嗅出时代风云变幻。

上世纪50年代，家乡男女还实行绑腿，不论春夏秋冬，把裤腿绑成灯笼状。绑腿的腿带一寸半宽，应该是一尺余长，多为黑色，为的是防蚊虫灰尘进入裤腿。高档绑腿是绸布做的。系裤子的红裤带三尺长，叫腰带，有穗，穗带吊在衣襟下面，不算丢人。上厕所（茅子）时，裤带搭在厕所矮墙上，以为警示。旧时代人自杀，有用裤带悬梁的，足见裤带很结实。

幼时直到青年，茅厕是埋在地下的大缸，上铺两条石板，蹲坑，里面有一根圆木，防止大便时尿尿溅屁股，叫搅茅棍搅屎棍。进厕所时，听见里面的人咳嗽一声，表明厕所有人。农村旧时，门轴户枢，吱扭作响，如今被合页取代。门闩，从外面用钢条锯片可拨开。后来换撞锁，如今防盗门窗，推拉自如，都是接受域外文明。门脑，门楣，光耀门楣，如今不需光宗耀祖了。门楣，就是正门上方门框上部的横梁，一般都是粗重实木制就。按照建制，朝廷官吏所居府邸才能在正门之上标示门楣，一般平民百姓是不准有门楣的——不能僭越。门槛，threshold；sill，门框下端的横木条。

农民是专制主义的土壤和基础，打倒皇帝做皇帝，千百年来循环往复，原地踏步。农民革命，造就新王朝，但谈不上革故鼎新。甚至还会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农村、农民、农业三农最适合农业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做梦想不出，中国最先迈入社会主义的，却是农民伯伯。那个工人国际协会可没农民的份儿。巴黎公社不是农村人民公社。伯伯们享受开放成果，却又思慕回大集体生产队当会计。

早年我受教育，说小生产者眼光狭小，应改造农民“自发资本主义”。让农民穷，城乡二元户口制，限制农民进城，统购统销，不让农民离乡离土，更别让他们知道欧罗巴，阿美利加，就好。这效果就是痴民喜欢封建主义。没皇帝，农

民会拥出一个蜂王。如鲁迅言，救亡还是启蒙？启蒙，启发愚民，是第一要务。但可惜，愚痴之民，虽富却愚。赤膊打领带。

我早听说中国农民是极“左”温床。那分田单干是邓小平万里赵紫阳在上有权者想出来的。农民，吃饱之后晒太阳，还乐滋滋喜上眉梢，吃饱饭又思念大集体大锅饭，就老糊涂了一一也许精明过余？怀念大集体时特权？

端碗吃肉，放箸骂娘，轮到愚痴农民了。拜鬼烧香供果拥立皇上，是千百年农民拿手好戏。居然丫鬟命操小姐心，关心姓社姓资，向往南街村。如果南街村好，全国全球就学它了。可惜只此一家，也是当地政府巨资扶持。

五十年代极左始自农村，源于农民，杀人放火抢财打砸烧，瓜分土地又收拢田亩集体化，均由懒汉带头。农民最左，又最快穷起来。窝儿里斗，最常见于农村。但按毛泽东，农民具有愚昧迷信文盲不卫生的特征。西方近代是工业化城市化，“消灭”了农民。可笑1958年强行推进共产主义，提出消灭城乡级差，但又固化城乡二元结构，限制农转非，封闭的乡村更形封闭，反对弃农经商围湖造田毁林开荒，越成泱泱农业大国。

二

小学课本第一课是“开学了”（繁体字：“開學了”）。第二课是“工人做工，农（農）民种（種）地”。农民种地我见过，但什么叫做工，阿拉不知道。

小学老师严厉批评的措辞通常是：如果全国人民都像你一样，每人迟到一分钟，那加起来是多少呢。于是每人感到罪孽深重。对此，我几十年间无法反驳，以至于浪费一粒米，就觉得罪重如山。后来学哲学知道，一般和个别，共性与个性，普遍与偶然，对立统一。一般和普遍，寓于个别与特殊之中。但个别不能无条件成为一般。否则，迟到一分钟就都该梟首示众，五马分尸。个别与特殊不能无条件成为一般与普遍。他们的转化需要一定条件，相斗争而发展嘛。不能把蚂蚁说成大象。可能性和现实性，相距甚远。可能造成的结果，不是现实的罪。推理的可能性，并不就是实际罪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得有条件。况且人人迟到，责任自负，不能由我承担。

任文煜老师书教得好，人也长得帅，对学生友善。教我们修辞语法章句之学，递进转折排比比喻借代拟人，都有些超前、超限。这对我一生影响巨大。修辞立

其诚，就是我作文的基本原则。他是我爸爸的学生，所以偏爱我。他血气方刚，俊俏，我从小的操行评语常常是“聪明，活泼，学习成绩优秀”，紧接着就是“希望严格要求自己，遵守纪律”。其中包含的批评是不言而喻。我绝不是温室的花朵儿，也不是修苗儿，自幼推磨碾米，三天两头请假不上课，箩面摘花间苗锄地刨红薯捡羊粪蛋儿拾牛粪收西瓜皮，中学大学也不间断劳动。

杨文智老师带领我们拾羊粪蛋儿，一斤给五分到一毛钱。大概挣过几毛钱外快。李义章叔叔带领我们除四害，走街串户挨家挨户打苍蝇，用纸包起来数数，怪恶心的。扫除文盲，县里给我们颁发委任状，就是诏书，义务扫盲教员，我高兴得屁颠屁颠。邻居王家嫂子是我的学生，每天晚饭后教她识字。她那时有襁褓里的婴儿，应付着，不用心，也不敢说不想学。运动嘛，游戏规则得遵守。实践证明我们对文化建设还有点外行。大轰大嗡似乎解决不了多少问题。

我的初中是在离家五里之遥的南梁中学度过的。南梁中学，今翼城二中，校址在清流村，故亦俗称清流中学。清流村有一泓碗口粗涌泉，半亩方塘。上学时收麦摘棉，植树挖土，也是寻常事，等闲视之。1960年到东尹村抗旱，小锄头挖个坑，浇一口水，扔进一两粒种子，把土埋上，干结的土壤冒起一片灰烟。那年吃不饱饭，舅姥姥在东尹生产队食堂做饭，本能地说，过一会儿我（偷偷）给你一块馍馍，但到了儿也不见真格的。饿，是那时的基本生存样态。困难时期每日中午一碗汤面条，一碗甘薯。在南梁村东植树，名曰青年林。但后来我回故乡，也未见一木半枝。到翔山前山植树，荒坡野岭，植被不保，成活率不高。那时代学农劳动是必修课。自己原本就在不能再“乡下”的乡下，却还要“下乡”劳动？学工学农批判资产阶级，但也还是“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如今取而代之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的娃娃挑粪担土十字路口查禁骑车带人，如今已消失。

在南梁中学第一次作文，我是坐在床被上写的（没有教室桌椅板凳）。题目是《开学第一天》。常老师在全年级念了一篇范文，得分85。常老师念这篇范文时故意卖关子不报作者姓名，我听到半截忽觉脸热耳酣心跳。念完后他才说：“这是安希孟同学写的”。其中精彩的句段是：“接到录取通知，我的血液沸腾了，但一到南中，我的心就凉了！”多么夸张，这孩子真会整词！

由于受到两位老师的青睐，我初中就尝试给山西文学刊物《火花》杂志写小说，收到退稿信，我受宠若惊，比发表小说还得意。文艺为那时的政治服务，这，

我懂得。但那绝对够不上文艺。我把这骄傲的资本——编辑部退稿复函——当作宝贝夹在书页间。1961年纪念五四，南梁中学在南梁镇上出墙报，我附庸风雅，学习马雅可夫斯基写什么“阶梯诗”，就是把一个长句子分成几行说。句段错落开，参差不齐。就是不让好好说话。不过中国格律诗，词曲，应该是束缚人的思想的。长短句，自由体，现代文明。

三

大概是61年初二升初三，政治考试题目是关于全国人代会纲领性决议，正确答案是号召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办农业争取农业有个好的收成”。那个时代人们喜昂扬，很容易想到“争取农业取得大好收成”才过瘾。我注意到《时事手册》（当时最流行的政教书刊）上这段话的微言大义，毅然在试卷上写成“争取农业有个好的收成”，喜获全年级唯一满分拔了头筹。

1964年，同班一同学受阶级斗争观念影响，写作文用阶级观念批判王定一老师平时授课时的修正主义观念，说他“讲授屈原《离骚》乃传播封建观念和奇装异服”（《离骚》：“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我据理予以反驳，维护该师，自以为敢想敢说敢斗。一天晚上，学校书记段定波，团委书记王长权召见我，询问此事，我情知闯下大祸，准备接受组织处理（可我连团也没得入，没有组织），谁知一阵狂风把书记的罩子灯吹灭，书记又不慎把灯罩碰掉，煤油泼洒一地，一片漆黑。书记挥挥手，不耐烦地说，“你去吧”（文革翼中果有大字报批王定一师）。那晚的风，必是妖风。寒假父亲看到我的文章，勃怒曰：“卷铺盖回来！”吾则少不更事，犊不惧虎。览此文，诸君应知1964，1965年阶级恶斗情景。我觉得1965政审没有屏蔽我，就不错了。我相信如果抓王老师平时言论的小辫子，一定是一大把。要人们说话写作书信日记处处提防，谨小慎微，小媳妇怕挨打，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然而这个故事并没有到此戛然而止。王定一老师是被政治运动整怕了的。在他，很自觉接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冠冕且自觉自愿改造世界观的。他不会为自己辩白洗冤。宁肯承认自己有修正主义观念。尽管如此，文革浩劫他依旧在劫难逃。

顺便也说说那时的阶级斗争风云。1962年秋冬第一学期，高一年级八班发生过一次“反右”斗争。那是一次班会，民主生活会。有点儿突然袭击。事先团员

们先进分子先下点毛毛雨透点儿风（几十年的老套路）。第一个遭到事先安排的揭发批判对象是张介生，一介书生，出言随便，不拘小节。揭发他的言论尚记得的有：中国人若登月球，人家赫鲁晓夫还不用石刀（锅铲）把你铲下去？别的不记得了。会前有预备，有动员，有组织，会中有引导，有主题指领，有声势，有条不紊，斗争很有点章法节奏。我们经历了一次成人“战斗演练”。大势所趋，我也起来揭发批判张介生，不料遭到主持会议的班长当头一棒：“你自己尚且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因为按议程，下个斗争目标就是我了。轮到揭发批判我时，好友李一白、张杰俊、乔作良挺身为我辩护，主持者不好收场，遂作罢。成一则趣事。生活中，人们有时说几句调侃话，一则日记，一通议论，俏皮话，反讽，图一时嘴上快乐，并无恶意，应该宽容。对于人们的自由交谈、散文议论，不可以无限上纲发挥引申。

那些年月，我们也有过激辩，唾沫星子喷珠溅玉，那争鸣的表象，遮掩了思维的贫乏——语言贫乏单调是思想哲学贫困的表征。有一点我们人人心里清楚：那个时代，其实我们队伍里没有思想右倾的人。大家都是同志，都慷慨激昂，大家都是按照社论文件精神思考问题的，都是赶时髦紧跟形势。如果有争论，有派别，有憋气，有指责，有攻讦，有恶斗，几乎毋庸置疑，都是大水龙王庙。争论的问题是鸡毛蒜皮，有时是鸡蛋里骨头，绝不是道路之争、阶级之分，不是敌我关系，也几乎不是先进落后之争，不是对错之争，而乃无谓之举。这种争论没有些许意义，自己也觉着乏味。敢想敢说，有时其实是不敢说，不敢想。这是一个历史真实。每一个人都觉着对方“右”。大家较着劲儿争取比对方更激进、更激烈、更过火。斗争哲学、窝里斗，最有问题的人，其实并未质疑教条式的流行说教。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1964年元旦，我们似乎成熟了，我和陈天宝自编“三句半”（当时流行的一种文艺表演，类似对口快板山东柳琴，四个人表演），内容不外反帝反修批赫嘲笑，壮志凌云，竭尽才智，罗列使用当时所可知的辞藻如“内外交困”“焦头烂额”“四海翻腾”“放眼世界”“日薄西山、气息奄奄”。通常的动作是扬起胳膊肘子、攥紧拳头，或是指头下指，怒目斥责。当时每逢刊登反修九评的《山西日报》一到，人人争抢先睹为快，学了不少马恩语录，学了些论辩术，也学了古诗词不少，如“上穷碧落下黄泉”“落花流水春去也”。

我本来喜欢写风花雪月花虫鸟兽的散文，什么秋啦夏啦风啦花啦，后来就写阶级斗争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政论文。文娱表演编写快板书三句半，我是内行。报纸上批判赫鲁晓夫的革命用语，我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我写文章论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糊的老虎。论证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竭尽堆砌辞藻之能事。高唱国际歌，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可我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international，还要解放受苦受难的世界人民。自己成天摸牛屁股推磨碾米担水劈柴，还文绉绉地说自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蜜罐里长大的精神贵族。

我顺应时局写的另外一篇作文是自由命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大而无当的题目，究竟能提高多少语文水平，自然大可置疑。一介小生，居然论证如此宏大主题。怪只怪那个蹉跎岁月。假大空，那时就开始了。我相信这个时代永远告終了。现在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有神论者，无神主义，老板和工人、雇主和打工仔，各种不同信念的人应该和衷共济团契友爱。

我还牵强附会勉为其难地写作论证“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的时政文章。文革发展为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偏执。我们自己把一个理论推演至极端，似乎很雄辩。怎么说，似乎都不为错误。可是世界上敌我之间并非壁垒分明，势同水火，而是永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普世标准、共同价值、阶级合作、利益均沾、合作共赢，还是有的。那时我们无须严密的逻辑论证和事实根据。这不是归纳推理，也不是演绎推理。内容无非是“敌人越反对，越证明我们自己做对了”。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证明我们错啦。这好像是抬杠打别扭。小孩儿玩过家家。这好像就是真理的阶级性，把实践性抛至九天之上。我觉得这不是毛泽东本意，似乎反正自己总是有理。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体系，对毛泽东的文章一知半解，曲加解读，脱离当时当地时代背景，随心所欲、狡辩逞才、遁词借口、强词夺理。似乎这世道无一定是非标准。

当年我在翼城中学连团也入不了，但很积极，追求进步。反修九评，他们哪一个也没有我学得好。必然王国自由王国的语录，我把握了。马列经典名句，一直伴随我一辈子。我能把人民日报社论短评加边框的楷体字杂文短论背下来。荆轲刺秦王“穷途匕首现”，在我，就是“阶级敌人穷途匕首现”。

我个人的履历自传，就是一部近现代史，记忆中的语文教学是厚今薄古，加大现代文学或者政论文。从小娃儿到大学生，再到中学教师批判三字经批林批孔，

古文压缩到最低。如今诗词大赛，引经据典，蔚成风气。天地翻覆。那时节，语文历史教材也多为颂扬农民反抗起义暴动。起义斗争是历史变迁的动力。而今电视则是帝王至尊，武力征战，和平盛世，“乃置挈壶，是惟熙载”，爱情故事，卿卿我我，丫鬟小姐。把历史颠倒过来，再颠倒过去。

四

在翼城中学读高中，我学俄语格外好奇刻苦投入。我能熟读背诵奥斯特洛夫斯基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刘德裕师用俄语表扬：“МОЛОДЕЦ!!好样的！”奇迹的是：到曲沃中学高考口试，抽签抽到的题目竟然也是诵读这一段，于是感觉轻车熟路。这样子就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

郭天杰老师带政治。有一次开卷考试（也是顺天应人，赶潮流），我试图学习报上北京某中学生用阶级观念分析所见所闻所触所及所爱所憎所感所想。我选择的话题是批判培根“知识就是力量”（Bacon, knowledge is power），自觉敏锐先锋派，颇为得意。当然我并非打内心仇恨培根，我其实并不了解这句话深刻含义。“知识就是力量”针对的是愚民政策。1977年，我在《宁夏日报》又撰文弘扬“知识就是力量”——因为那四个人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算作对自己的清理反思和总结，算是告别了那个岁月。

1965年翼中毕业高考填报志愿表，政审须由党员班主任负责。这是历史实录，秉笔直书，不带偏见与臆断。当时政治条件最好者，可报绝密保密专业，政审一般者，如吾人，可报重点或一般院校普通专业学科。当然还有政治审查不合格者，不会被录取或只能上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根据我个人的条件，我第一志愿填报北师大外语系。不幸科举及第。我政审不宜报考北外，想报北二外，又觉着门槛太低。后来才知，这所学校64年成立，校园是在农田里盖座大楼。幸亏没报。以我的成绩，兰州大学或南开、武大，应该可以。但到毛主席身边上大学，心里有底气，脸上有光泽。我当初选报外语专业，是出于支持世界革命的目的。

进校后入学教育周。端正入学动机，防止思想跑偏。因为中学教师地位低呀。那是比谁的调门高的时代，紧跟高举发言表态，人人争取别出心裁，与众不同。我在大学入学教育时，每次发言，娇涩羞怯，惴惴不安，不敢也不善发言，不会编造活思想。人家都高谈阔论，编造自己光怪陆离的资产阶级自私思想和活学活

说心得体会，我却觉着自个儿没奇思妙想。别人说贫下中农把他送到村口。可我怎么就没有贫下中农礼送出境呀。我也想编一点个人主义坏思想，但编不出。总之人家都会变花样想词儿。北师大入学后，倒是入团申请书思想汇报连篇累牍，亮私斗私不怕羞不害臊。我和常新华同学这一辈子尽谈心，先是我为入团频繁向她汇报活思想，编造离奇的思想活动，不明真相者，还以为我们谈恋爱。后来就是倒了个个儿，我是她的上司。所以我感谢文化大革命提高了我的社会地位。📖

【怀人】

纪念著名翻译家范希衡

115 周年诞辰暨逝世 50 周年

范 琅

父亲从文城龙眠山河孕育的古老文明的村庄来到人间，闻着文城的书香成长。他曾被誉为闻名乡镇和桐城县的神童、才子；他曾以自己的艰苦努力和聪颖，考入了国内知名学府——上海震旦大学和北京大学；他曾获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进入了世界顶尖大学之一的比利时鲁汶大学；他曾教书育人桃李天下，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他曾为中法文化交流、为法国文学的翻译做出了毕生贡献，特别是填补了法国文学理论诗译这一专门领域的空缺。然而父亲的不朽译作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三年，在那特殊的年代，人不堪其苦的艰难岁月，呕心沥血完成的。他的后半生可以说是一颗冷落在河沙里的宝石，默默地放着光芒。尽管他的躯体在坎坷的历程中过早地离开了人间，最后回归到孕育他的故土，然而他的人生事业犹如星辰般地散发着永恒的光芒，他的理想追求、他的人格精神，将彪炳千秋，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为了纪念父亲的养育之恩，我将父亲的《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在美国华忆出版了，并被收入了全球著名的国会图书馆。我之所以选在美国华忆出版社出版是因为其出书速度之快，能符合我所需求；我之所以选用此书再次出版，是因为1932年父亲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取“最优等”的博士论文，就是以此书为主题。父亲通过研究纪君祥《赵氏孤儿》与伏尔泰《中国孤儿》精辟地阐述了中国古典

文学精粹对欧洲文学的影响。正如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贾植芳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说：“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在欧洲用欧洲文字，对中外文学影响关系做了历史性的论证和分析研究，对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和贡献作了实践性的探讨努力，为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因受到元代著名悲剧《赵氏孤儿》的启发，于1745年创作了三幕诗剧《中国孤儿》，后扩写成五幕。作者在剧文中贯穿了教人以德，使普遍的理性抑制人们的利己欲望，来建立和平与幸福社会的普世原则。中国历史上外族数度征服中原，然而征服者往往被中国固有文化所征服。1755年《中国孤儿》首次在巴黎法国大剧院公演时，就以他优美精炼的诗剧台词，悲壮动人的故事情节，正义、理性阐扬的主题思想，博得了观众的热烈反响，连演16场，还曾在宫廷作御前演出，轰动了整个巴黎城。

父亲从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曾以大量时间从事比较文学的研究。为了更系统、完善地将自己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奉献给中国读者，60年代，他又将伏尔泰的《中国孤儿》翻译成中文。在他垂暮之年，在他身处“文革”时期的逆境，在他经历了种种艰辛曲折的旅程之后，父亲仍然矢志不渝地思考着、研究着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和贡献。

他在艰苦的环境中，伏案于昏黄的灯下，用他惯用的小楷毛笔孜孜不倦地书写出伏尔泰《中国孤儿》的中文翻译稿。我曾听父亲说过，在抗日战争期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张若谷先生翻译的一本删改的散文节本，这次父亲将它全文译出，并力图保持原诗剧的风格。当时，我正跟父亲学法文，他对我说，伏尔泰是以优美的诗句来表达出剧中的主题思想，如果译成散文，则会失去原文的精神；如果译成诗，则中国新诗还没有定式。怎么能达到原文诗句那样整齐、优美与和谐呢？又如何达到翻译文章的“信”与“达”呢？父亲踟蹰着、推敲着，最后他尝试用中国传统的七言诗句，双叠着，以十四字译十二音，每句在当中布置一个停歇，韵脚努力以罗马拼音为准，两句一换，以此译出伏尔泰《中国孤儿》诗剧之风格，在章法整齐与韵法变化方面，都尽量尊重原作，在词句和节拍方面则兼采七言诗和元剧传统唱词而加以发展变化。他希望这样做能仿原作神情于万一，而同时又使读者无陌生感，较之译为散文或自由诗略胜一筹。

父亲还对我说，译诗是比作诗难得多的一项复杂的工作。中文都是单音字，

不免失之于呆板，毕竟是翻译还应以“信”、“达”为主。父亲在从事译著工作时，或伏案沉思，或徘徊吟诵，或俯视足下，或仰观遥空，沉潜于诗的意境之中，超脱于诗的语言之外。父亲是如此忠于自己的事业，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地追求更高的学术境界，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学术成果，确是难能可贵。正因为如此，他的译著博得同好者的称誉。

《中国孤儿》前面的译序——《〈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它虽作为长序出现，但却是我父亲多年来有关这方面研究的一篇比较文学的学术论文。它应该是父亲1932年在比利时鲁汶大学以最优通过的十五万字比较文学的博士论文《伏尔泰与纪君祥——对〈中国孤儿〉的研究》的进一步的精炼与升华。在父亲这篇自序最后的《余论》中，他说：“故事表现着中华民族为正义、为理想而斗争的精神。这个精神是不妥协的、不惜任何牺牲的、是有耐性、有智谋的，是充满信心而于惨痛气氛中具有乐观色彩的。……”这里虽然讨论的是赵氏孤儿的故事，实抒发的是父亲的思想、心绪。父亲在序中最后指出的“希望这篇名作，经过指明缺点后，能更好地对中国作家成为他山之助”。随着我国比较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但愿父亲宏远而善良的愿望得以实现。

“在文革之前对比较文学的理论研究与探讨，则阒然无声，一片荒漠。”而上世纪60年代“从范先生重新拈起来进行研究，必然会对它产生一个全新的认识和感情，真正通过生活实践的本身达到对历史的深入其里的思考与评价，越出书本上的抽象概念世界，做出自我的研究成果，由成熟的人生高度达到真实的学术境界。这篇《译序》是范先生对重新崛起的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事业一个崭新的高质量的贡献的用意之所在”（贾植芳语）。父亲正是在这片荒漠上开垦着，结出了一个又一个硕果。

今年正值先父115周年诞辰暨逝世50周年，我以此书呈献给全球读者，愿父亲于九泉得以欣慰。

安息吧！我亲爱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书摘】

铁幕后波兰的审查制度和旧政权的崩溃

程映红

1977 年 2 月的一天，一个叫斯特兹维斯基的波兰人在波兰一个港口登上了前往瑞典的一艘渡轮，他护照上的签证注明他是去瑞典度假两周。但这个旅游者的真实目的并不是旅游。

他是波兰克拉可夫市新闻、出版和公共表演审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他的衣服里面贴身捆着很多塑料袋，里面是大约 700 张保密文件，内容是过去两年间波兰宣传部门下达的对新闻出版和文艺娱乐界进行审查的指示和审查报告。

在当时的波兰，人人都知道在新闻出版和娱乐业的上面有严密审查制度，但政府自己不但矢口否认有这么个制度，甚至连“审查”这两个字都不准出现在任何公开出版物上。这样，报刊出版和文艺作品的审查制度成了一个无处不在无人不知但又从不现身的幽灵。这个怪现象久而久之就成了被人们默认为的社会现实的一部分，这样就达到了这个制度的目的。

在波兰以外，人们当然都知道铁幕后面的世界是被一张审查制度的严密网络所掩盖的，但对于这个制度究竟是如何运作的、究竟有哪些社会现实不能公布、有哪些只能有限度地公布、哪些又必须完全改头换面后再公布，这些具体的标准和过程是完全隐藏在黑箱中的。斯特兹维斯基就是要把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带到海外，让它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铁幕社会中的审查制度是维持政权的一个最基本的工具，它通过对信息的筛选、过滤、放大、缩小、掩盖和捏造创造出一个虚幻但又和现实有一定联系的社会图景，让人们相信这就是他们身处其中的那个社会。它的内幕和运作一直是国家的高度机密。

历史上这个制度的一些细节第一次被外界得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时德国入侵苏联，几周内占领了大片苏联领土。由于德军进展迅速，莫斯科以东的斯莫陵斯克在被占领时当地党政机构没有来得及销毁或带走很多重要文件，结果都落入德国人手中。在这些文件中有大量的对新闻出版的审查条款和规定，德

国人挑选了大约 500 份档案，共 20 万页运回德国，用于对苏联制度的研究。1945 年德国战败，这些材料又落到美国人手里。美国哈佛大学的冯索德教授接受美国兰德公司的委托对这些材料作了阅读和分析，出版了《苏维埃制度下的斯莫陵斯克》一书，用翔实的材料解剖了苏联社会的审查制度在维持政权上的作用，成为苏联研究的经典著作。斯特兹维斯基带出的这 700 页文件，是《苏维埃制度下的斯莫陵斯克》之后对铁幕阵营中的审查制度的又一次重要披露。由于它反映了冷战时期波兰的情况，可以和斯莫陵斯克档案在不同的历史和国家背景下对照阅读。美国的兰德公司委托对苏联东欧制度有深度了解的克里教授对这些文件做了翻译和编辑，并撰写了前言，出版了《波兰审查制度的黑皮书》。

波兰当局当时对历史的控制和操纵可以说是无所不至。一个具体事例是对卡廷事件的处理。1939 年 8 月，苏联为了避免和法西斯德国冲突，和它瓜分了波兰，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德国占领西部。波兰军队在和德国作战时背后被插了一刀，大批军官在被俘后押往苏联，后来大约有 8000 人在苏联的卡廷森林被集体屠杀，时间大约是在 1940 年。

这些集体墓坑后来被入侵苏联的德国军队发现，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但苏联说这是德国人干的。尽管国际上和波兰国内很多人都知道这是苏联人干的，但由于波兰是苏联的卫星国，波兰政府在二次大战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里都不准提这件事。“卡廷”这两个字眼在 50 和 60 年代从报刊上消失了。后来因为事件牵涉面太大，国际上尽人皆知，波兰国内实际上也是家喻户晓，所以波兰政府内部规定用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的“卡廷事件”词条作为标准，以起草了有关这段历史的叙述，把事件的发生从 1940 年改为 1941 年，因为 1940 年屠杀发生时苏德战争还没有爆发，因此无法嫁祸于德国。

1975 年 1 月 14 日，波兰华沙的报刊出版和公共表演控制办公室下达了一份列为“机密”的“二号文件”，由这个办公室的副主任签发，下达到名单上的所有有关部门，但文件本身没有明确究竟是哪些部门，估计发送人员都知道。文件是对原来一份叫作“21 号规定”的文件作补充。那份文件已经规定用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词条作为卡廷事件的唯一表述，但这份文件再对很多具体细节做了强调。

例如，一定要说屠杀是在 1941 年 8 月发生的，具体执行屠杀的是德国军

队的第 537 工人营；1943 年德国为了挽回战局、诋毁苏联，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说这些波兰军官是被苏联人杀掉的，并向国际红十字会报告。纳粹的这个阴谋导致了当时流亡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和苏联断绝关系。1943 年秋天苏联收复了卡廷一带的领土后立即组成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这个事件，结果说明纳粹德国是真正的凶手。这起事件的前因后果早已很明确了。

这份文件说，过去对卡廷事件的审查规定是所有与“卡廷”相关的字眼都不得出现在报刊上。但新的审查规定是，卡廷事件可以提了，但必须严格限制在这份文件所提供的信息和规定的范围内。现在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细节。任何与卡廷事件有关的额外信息都必须事先上报报刊出版和公共表演控制办公室审查。

文件最后说，虽然对卡廷事件有了新的说法，但一般来说，这个事件仍然以不提或少提为妥，尤其在公共报刊上。

这样一份有关历史真相的文件被列为国家机密是有道理的，因为它详细告诉了人们这个审查办公室是如何掩盖和篡改历史以迎合当局的政治需要的。文件最后要求以不提或少提为妥，还是反映了当局的心虚。

如果说卡廷事件是一个直接牵涉到苏联老大哥的当代历史问题因此不得不严格审查的话，那么，有些被严格审查和规定的题材其实和当代政治没有直接关系，但在这个制度下也成了大问题。

例如波兰 19 世纪著名作家和诗人密支凯维奇的作品就是如此。波兰 19 世纪丧失了独立，东部被俄国吞并。密支凯维奇是著名爱国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号召反抗沙俄帝国主义、主张波兰民族独立，受到沙俄的迫害，被迫出国流亡。对于这样一个 19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人物，波兰当局的态度也是一切以苏联为准。

1968 年，波兰文艺界上演了密支凯维奇的话剧《先人祭》，受到观众欢迎。但苏联驻波兰大使提出抗议，认为这出戏以歌颂波兰人民反抗沙皇统治的斗争为名，影射当今的苏联和波兰关系，是一个反苏作品。当时正好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掀起反抗苏联霸权主义的布拉格之春运动，整个东欧动荡不安，波兰当局马上就下达指示，将这出戏禁演，并追究审查机构的责任。

对历史题材的审查甚至包括很多和政治或者爱国主义无关的题材。1976 年华沙一个剧院要上演一出戏，说的是 19 世纪一个天主教教士的谋杀案。审查机构觉得这个题材没有太多政治色彩，可以放行，但又对报刊将要发表的评论做了

严格规定。波兰当时虽然没有完全禁止宗教，但对它的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非常谨慎，处处设限。审查机构担心这出戏涉及的是宗教，谋杀犯是某一个天主教教派的成员，可能会引起这个教派和其他教派成员之间的争议，从而扩大宗教的社会影响。此外，这出戏的背景也是在俄国统治下，当时俄国东正教会成了波兰天主教会内部纠纷的裁判，所以当局又担心对这出戏的讨论会引出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这样，一个以 19 世纪的刑事案为题材的戏剧成了审查机构的重点对象。华沙报刊出版和公共表演审查办公室在这出戏上演之前就下达了 154 号文件，对报刊对它的评论作出规定，任何可能引起争论从而在社会上扩大宗教影响的问题都不得出现在评论中。只有以下的话才被允许出现，例如“作家根据某个教士在某个修道院犯下的杀人罪创作了这出戏”。此外，考虑到当时俄国东正教会在波兰的地位，任何“企图从民族主义和当代社会现实的角度来解释这出戏的评论都不能发表。”

但是，在这出戏上演后，有些报刊的评论还是隐晦地超越了审查机构的界限。于是在两个星期之后，同一个审查办公室又下达了一个 156 号文件，干脆禁止任何评论。文件说“除非有新的规定”，任何有关这出戏的“评论、讨论和争议”都不得在任何报刊上发表。

再如，在国际新闻方面，当时的规定是有关中国的新闻只能采用官方波兰通讯社的通稿。

其他报刊有关中国的稿子都必须事先送交党中央报刊、电台和电视部审查。对和波兰有贸易往来的第三世界独裁国家不能像国际新闻媒体那样使用“军事政权”这样的字眼。对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只能按照波通社和中央宣传部门的指令报道光明面和与波兰的友好往来，任何涉及波兰和东德、苏联之间历史上的领土和民族纠纷问题都不得提及。

当时波兰领导人是党的总书记盖莱克，他对党中央领导的形象非常注意。波兰党中央报刊、电台和电视部 70 年代的规定是任何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领导人活动的照片如要见报，事先都必须上报这个部过关。

波兰每天最重要的新闻都是在晚上七点由波兰央视播出。这个电视台有大量人员在播送前对节目仔细审查，但实际上，电视台的审查人员已经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党中央总书记盖莱克身边的秘书和其他亲信，他们每天下午都对电视

台送来的当晚的新闻节目做审查，然后向盖莱克报告。等到电视新闻节目回到电视台的时候，已经被审查得干干净净了。

在这个制度下，新闻人员和节目制作人员一方面战战兢兢，另一方面又很盼望自己的节目能受到最上层的欣赏，他们的说法是全波兰只有中央委员会的 200 个家庭说了算。

盖莱克统治的年代是波兰经济和社会全面走下坡路的时期，但打开电视，翻开报章杂志，除了官方新闻和宣传材料，根本见不到任何政治问题的讨论。整个社会一片太平盛世。但就在波兰的报刊出版部门把波兰描绘成一个共产主义天堂的时候，波兰的经济每况愈下，供应越来越紧张，物价也上涨，但是工资长期没有跟上，老百姓怨声载道。有些地方爆发了工人骚动。有些记者在采访后写出一些真实情况，但却被审查部门拒绝发表。

1976 年 7 月华沙报刊、出版和公共表演审查办公室就一篇描绘工人生活的稿件专门发了内部文件，把这篇稿子从头到尾一一分析，指出它的种种问题，然后把它提供给其他记者作为采写报道时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的样本。例如它说，报道中把一再提到的前任领导人贝鲁特和哥穆尔卡时期的生活做标准，拿它来和现状作对比，无疑助长了对现状的不满，这样的对比不能出现。此外，任何对家庭经济状况的详细描绘，对多年来工资增长的缓慢，对物价暗中上涨，甚至儿女在饭桌上对父母抱怨食品供应的单一和粗糙，这些细节都要在审查中删掉。

由于历史的原因，波兰在海外有很多知识分子。波兰的体育水平很高，有些运动员在海外比赛时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在西方居留。波兰党中央报刊、电台和电视部 每年都要下达文件和指令，对有关这些人在海外的生活和活动的报道严加限制，基本上从来不让见诸报刊。这些人回国探亲时更是不允许采访和报道。

这种新闻和报刊审查制度固然使波兰人民深受其害，但实际上统治集团又何尝不是如此？生活在审查制度建立起来的虚构的盛世中，统治集团完全没有想到，不出几年，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罢工，开始了团结工会运动，揭开了苏联东欧集团垮台的历史性序幕。❏

【书摘】

国民党政府对出版品的查禁取缔

1. 中统局关于昆明当局决定查禁进步报刊的情报

(1946年1月30日)

中央调查统计局情报

昆明一月二十六日电

昆明共党及民主同盟连日向各大学加紧宣传攻势，并在《中国周报》、《学生报》、《昆明新报》及《时事评论》等刊物以向政治协商会议建议及控诉等名义，公开撰文攻击政府及本党，其中以张奚若之演讲词尤为露骨，大骂蒋主席为独裁者，本党为党匪及贪污反动等等。各该反动刊物大登特登，影响社会，动摇民心，百姓已觉无法无天。此种演讲会且系定期，每星期于联大举行一次。本党刊物《正论周报》（本局同志主办）除为文批评外，并设法策动各方注意。

元月二十二日晚八时半党政军首长及法院院长党报社长等二十余人即在省府大客厅举行会议，由卢汉主席报告后即由霍代总司令撰章、高院院长鲁□□及市长警务处长等分别发表意见，至十二时散会，当经决定：

（一）由市政府查明未经登记之新闻及反对刊物，即日通知省会警察局□□依法查封；代印各该刊物之经委会印刷所等，由省府勒令停□□□□未依法报刊刊物，由印刷业工会通知禁印；

（二）司法处分由高、施两院长及首席检察官将各该登载张奚若反动言论之刊物，即经汇集研究后，于最近依法对张奚若及各刊物提起公诉或控告。

讨论时有关人员多引学生或将为虑，卢主席及霍总司令均表示依法办理，力持镇静，学生不足虑。卢更表示如果学生违法，亦可押办，即军队持枪叛乱亦有办法。

(国民党中统局档案)

选自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化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三编（文化）第245页，江苏，凤凰出版社，1999年。

2. 内政部等为查禁《时代日报》与行政院往来函件

(1947年12月—1948年4月)

警备司令部军令

查该报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本市为戒严地区，应予取缔，依照戒严法规定着令该报于明日起停刊，毋得违误。此令。

附警备司令部发言人的谈话

警备司令部发言人昨晚为依据戒严法命令本市文汇报、联合日报晚报，及新民晚报即日停刊事，发表谈话云：“最近中共因军事失败，为图挽救颓势，特发出所谓地下工作路线纲领，动员潜伏于政府区域之中共及其外围份子，积极煽动所谓三罢一惨运动，除已在全国各地策动罢课游行风潮外，并已公然宣布煽动全国于六月二日实行总罢课、罢工罢市，冀以破坏社会秩序颠覆政府。在此严重时期，本市文汇报、联合日报晚报及新民晚报三报，竟在言论及新闻方面，不断煽动学潮，散播军事谣言，夸张共党军事胜利，淆惑人心，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此种行为，实非任何民主与法治国家所能容许。本市早经宣布戒严令，迄未取消，近来阴谋分子多方煽动之结果，破坏社会秩序之事件，层出不穷，本部职司治安，为维护安宁秩序，及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起见，不得不加强执行戒严令，防遏乱萌，爰特依据戒严法之规定，予上述三报以停刊处分，借以消除淆惑人心扰乱治安之因素”云。

(行政院新闻局档案)

选自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化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三编（文化）第246页，江苏，凤凰出版社，1999年。

3. 内政部为查禁《黑色的诅咒》《什么是国民大会》等

书刊致行政院新闻局公函

(1947年11月25日)

查薛汕、李凌、沙鸥主编之《黑色的诅咒》，彭赫生著之《什么是国民大会》等书刊，立论偏颇，措辞荒谬，诋毁政府，污蔑元首，无所不用其极，显系代替奸匪宣传之反动书刊，应予依法查禁取缔。除分行各省市政府外，相应函请查照为荷。此致

行政院新闻局

部长 张厉生

（行政院新闻局档案）

选自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化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三编（文化）第250-251页，江苏，凤凰出版社，1999年。

【编读往来】

张晓良纠错：

1. 296期33页6行，情毛主席讲话，应为：请毛主席讲话
2. 35页倒数13行，这时有个女同学，应为：这时有个女同学。
3. 55页倒数3行，一起工做过，应为：一起工作过
4. 69页1行，门和的路线觉悟，应为：门合的路线觉悟
5. 张林南：《我的成长史》篇中数处表述自己是王太行，张与王是一人两名，还是两人？似应在文尾说明一下。

编者补遗：

感谢张晓良先生的提醒。关于张林南与王太行这两个名字的关系，特补充说明如下——

张林南的父亲张玺(1912-1959)原名王常珍。河北省平乡人，1931年在邢台第四师范学校加入共青团，从事学运工作，宣传抗日救亡。1932年被捕，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开展绝食斗争，1934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36年组织批准集体出狱。是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1949年任河南省委书记。1952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56年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59年患鼻咽癌病逝。其女张林南原名王太行。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1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